

尼雷尔

[英]威廉·埃杰特·史密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是一本关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传记，一九七三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威廉·埃杰特·史密斯，据称研究东非和坦桑尼亚已达十年，曾多次访问坦桑尼亚，目睹过坦桑尼亚独立后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多次受到尼雷尔的接见。

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坦噶尼喀一个部族酋长的家庭，少年时受洗为天主教徒，中学毕业后曾去乌干达上大学，一九四九年去英国留学三年。回国后，在天主教学校任教，后即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五四年参与建立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前身)，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分阶段获得独立。以后，参加英殖民当局所设立的“立法会议”竞选活动，两度当选为议员。一九六一年坦噶尼喀在英联邦内实行“内部自治”时，任总理，一九六二年任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一九六四年起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迄今。

尼雷尔执政以来,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先后将全部外国银行和一部分外国工商企业收归国有;对外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的统一。例如他曾反对苏美炮制的防止核扩散条约,谴责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等。

作者在本书中介绍了尼雷尔的生平,并以一半以上篇幅叙述了尼雷尔任总统后直至六十年代末的主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如: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的联合,《阿鲁沙宣言》的颁布,“社会主义”国有化措施,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问题上同美、英的斗争,促进非洲统一问题,等等。作者并在其中大量引用了尼雷尔的原话,因而本书对了解尼雷尔的政治思想、对内和对外政策主张以及性格、作风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不可能对尼雷尔作出全面的介绍和正确的评价。本书还有很多地方对尼雷尔的政治主张和坦桑尼亚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蓄意的歪曲。至于对尼雷尔同我国的友好态度,非但没有正确反映,相反却流露出反感的心情,充分暴露了作者敌视我国的反动立场。

本书由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及其协作单位的编译组译校，译文中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9月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2
第 三 章	41
第 四 章	60
第 五 章	92
第 六 章	114
第 七 章	139
第 八 章	169
第 九 章	189
第 十 章	213
第 十 一 章	234
第 十 二 章	249
第 十 三 章	265
第 十 四 章	284
第 十 五 章	301
第 十 六 章	319

第一章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经常提醒他的同胞说，他们不能到月球上去。他也许会大声地这样讲，就象有一次对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上种咖啡的一群查加族人那样说的：“我们的工具同穆罕默德一样古老，我们住的房屋还是摩西时代的样子。美国人正在上月球去！俄国人也要上月球去！而我们却不能上去！”或者，他会慢声地感叹道：“当美国人和俄国人正在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非洲人却在跳舞。”或者，他会恼火地叫嚷：“我们的朋友在动脑筋，而我们却在睡觉和种植蕈类作物；他们正在把火箭射到外层空间，而我们却在吃野草根。”有人会认为，未必需要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千三百万公民提醒这些事情，但是被他的同胞称为“姆瓦利穆”即“导师”的尼雷尔，还是孜孜不倦地反复对他们讲这些事。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本该做教堂讲坛上的传教师，而不该做共和国的总统。”的确，他花一半时间到内地去旅行时的

讲话，不大象政治演讲，而象严肃的誓言，甚至象激昂的讲道。他似乎从不向他的听众讲他们恰恰想听的话。有一次他以断断续续的斯瓦希利语向种植烟草的新垦区农民大声喊道：“看吧！在美国，他们每一英亩收获二千四百磅烟草。而在这里，你们只收获六百磅。可是在离这里没有几英里的乌兰博，他们每英亩已经收获一千五百磅了。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不象去月球那样。我们不能到月球上去！但这件事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尼雷尔在他的国家于一九六一年独立之前，早就念念不忘于这类的对比。那时，这个国家称为坦噶尼喀，它以这个名称作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以及后来的托管地达四十一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四月，坦噶尼喀同近海小岛桑给巴尔共和国联合，几个月以后，这个新国家就称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尼雷尔于一九六四年初的一天，即在一次几乎摧毁他的政府的陆军叛变事件之后不久说：“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我仍然正视这些问题。你们不要光讲‘独立’。独立还应该意味着许多其他事情。如果人民过于只对独立感兴趣，那是不好的。如果他们太快地看到它，问题就难办了。你知道吗？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包括马萨伊族人，那些东非平原上高高的、瘦瘦的、拿着矛的战士），现在已经是一九六四

年，他们要在一九六四年活下去的压力是极大的。人们对我说，‘马萨伊族人是十分快乐的。’我对他们说，‘问题不是他们快乐不快乐。那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并不试图使他们快乐！’但是”——突然他把话顿了一顿——“净水和污水是有区别的。我的问题是要使那个妇人能有干净的水。我的问题是要使她能有个健康的孩子。快乐！我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快乐之中。”他作了一个嘲讽的动作，把身体颤抖一下，“我不知道住在国家大厦里面的我的家属是否比马萨伊族人快乐一些。问题是，马萨伊人在一九六四年喝的是什么样的水？”

他坐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国家大厦的阳台上，向下望去，越过一片黄绿的草地，就是碧波粼粼的印度洋。他是一个瘦长而结实的人，有高高的前额和牙刷般的小胡子。在那些年代，看上去仍然象个用功的研究生，而不象一位巴巴 瓦 塔伊法——国父。他穿着卡其布便裤，颜色鲜艳的运动衫和皮凉鞋。“在十二世纪，”他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也许不那么可怕。但是今天，美国的生活水平对坦噶尼喀是有密切关系的。有时我希望我能够把坦噶尼喀放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这样，我们能够给它一百年时间来赶上去。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马萨伊族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得到的：给孩

子们吃的牛奶、干净的水、好的房屋。这些东西是人们的目标，是他们向往和需要的。可是，要马萨伊族人接受必要的纪律却不很容易。干净的水需要装管子。池塘里的水必须弄干。工作吧！但是工作需要知识和专门技能。德国实际上遭到了彻底毁坏，日本也是如此，但它们具有重建的应有态度和必要技能。所以我必须来树立这些态度。但是我不能等待，我不能等着培训马萨伊族的兽医和医生。因此我不得不借用人家的技能。但是借用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他又讲得很慢——“已经产生了某种反对的态度。就是那个想装管子把干净水通到他村里的人会说，‘嘿！为什么你叫一个英国人来做。’如果我告诉他‘因为没有有一个马萨伊族工程师，’他会问”——装作惊奇的样子——“‘为什么没有呀？’”对此尼雷尔大笑起来，显然他是对马萨伊族人的固执和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笑。“你看到了吗？”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在达累斯萨拉姆如同秋季一样，尼雷尔动身到塔波拉去作一次为期四天的旅行。塔波拉是坦桑尼亚本土十七个专区中深入腹地的一个区，它位于古代的贸易和贩卖奴隶的路线上，这条路线一度从桑给巴尔岛对岸的巴加莫约直到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他的灰色梅塞德斯-本茨牌轿车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机场，在

前面有一辆装着蓝色闪光灯的警车。尼雷尔挥着他的乌木手杖跳下车来，同一小群前来送行的政府官员握手交谈。他的头发在两三年前已变成灰色了。他穿一件无领的外套式衬衫，配上一条用日本晾干自挺衣料裁制的裤子。这种制服已被称为“坦桑尼亚服装”，因为实际上在达累斯萨拉姆每一个有地位的人都学总统的样子穿起了这种服装。在东非的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于尼雷尔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友谊已经感到不安。他们抓住提倡这种制服一事，作为尼雷尔“接近中国人”的另一个标志。坦桑尼亚人对这种说法非常敏感。他们煞费苦心指出，尼雷尔在桑给巴尔初次看到这种服装时就赞赏它的朴素；中国周恩来总理本人在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曾说过，这种服装对中国的气候来说太单薄了。

尼雷尔还戴着一种来自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便帽，叫做“科菲阿”的，这个新鲜东西得到了他的同事们的爱好。“啊，你喜欢它吗？”他对审判长说，“也许你想要一顶，不是吗？”随后他登上了政府的双引擎“空中司令”飞机，坐在英国驾驶员旁边。随行人员有国务部长博克·穆南卡、他的副官和两名年轻的安全人员。不一会这架小飞机就起飞了，顷刻间消失在翠绿的丛林地带里。从而这揭示了一个常被首都生活的欢乐和情趣所掩盖着的事实，即坦噶尼喀

的荒原在达累斯萨拉姆跑道的尽头处就开始了。

第一天 在“卡里布 巴巴 瓦 塔伊法”(欢迎国父)的标语牌中,尼雷尔被带到塔波拉的新的公共会堂,吃一顿有鸡、印度肉馅烘饼、茶和蛋糕的午餐。接着,在中午的炎日下,他颁发了一百零八张识字证书给那些在前一年已学会看书和写字的成年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接受证书和鞠躬时,把她的婴儿放在总统的脚下。她如此慌张,以致把婴儿都忘了,一直到她回至座位上才想起来。随后,尼雷尔在专区专员公署的阳台上,同坦桑尼亚大陆上的政党,即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① 在当地的老盟友闲谈。“你为什么戴这个?”一位老盟友责难他说:“这是一顶桑给巴尔的便帽呀。”“不”,尼雷尔回答说,“这是一顶坦桑尼亚的便帽,”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因为坦桑联合的概念似乎还不实在。总统的年轻新闻秘书哈欣·姆比塔说,这顶便帽很贵,至少要值八十个先令。“看来你对帽子懂得很多,”尼雷尔说,“你业余做过帽子吗?”过了一会,他们又对娶新娘需付聘礼的传统是否可取展开了争论。这种传统要求未来的新郎要把牛或其他财富付给新娘的父亲。一位老盟友为这种做法辩护,他诙谐地说:“再说,我还有四个女儿。”

^① 简称坦盟,以下同。——译者

“但是我，兄弟，”尼雷尔回击说，“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因此我必须拿东西出去。”谈话又转到了最近一阵偷牛之风。大个子和性情温和的穆南卡有时是总统的嘲笑对象，他详细谈了在牛身上非法打上烙印的各种方法。尼雷尔说：“他是个专家。”过一会儿，尼雷尔兴致勃勃地用斯瓦希利语讲了关于他幼年的长篇故事。哈欣低声说：“是讲一只山羊头上的毛吧。”但不管他讲了什么，总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

下午，一行人驱车南行四十八英里，到了锡孔盖的莫拉维安麻风病院，尼雷尔在那里为一个新诊所举行落成典礼。病人们送给他一个鼓，他买了另一个鼓来回送他们。在返回塔波拉的尘土飞扬的路上，曾在附近村庄度过幼年的哈欣，谈到了农村生活的变化。“我们通常都认为欧洲人是自私的，因为他们只顾自己，”他说道，“我们会轻蔑地说‘他的为人象个欧洲人。’我们这里如果一个人有三百或四百头羊，他会在每一个周末杀一头，欢迎大家都来吃。要是有人离开你的家时还饿着肚子，这将是莫大的侮辱。但是现在人们是这样依赖货币经济，他们只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一位客人在饭后到来，就会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了。”

第二天 当尼雷尔的车子驶过塔波拉北面去姆

万扎的公路时，有三十位妇女在路旁挥手。“这里是卡齐马，”哈欣说，“我们回来时要在这里停留。‘姆瓦利穆’（导师）常在这里停留的。”在伊锡基兹亚，尼雷尔鼓励种植烟草的农民增加他们的亩产量，他还视察了一座新的打包站，并叫随从人员把他的波拉罗伊德牌照相机（一种立刻可取相片的照相机——译者）拿来，为四个拿着水罐的妇女拍照。“这是一张第一流的照片，”他说，“嗯，作为一个业余摄影者，拍得不坏吧？”妇女们羞得话都答不上来。在恩泽加，他为一座新的牛浴池的开放剪彩，但是牛群受惊了，不肯从那里经过。“人太多了，”尼雷尔说，“给它们让路。”在以他的妻子命名的玛丽亚·尼雷尔产科医院里，有人送给尼雷尔一盘礼物，一行人坐下来喝茶。这里象在塔波拉那样，一位高大的妇女——全国妇女组织在当地的主席站在尼雷尔的桌子前面，劝他多吃些鸡和玉米面包，并挥动她的手帕当作扇子。她指指窗外一所旧式的土墙茅屋，尼雷尔笑了。“她在解释，”他告诉一位访问者说，“为什么她要我坐在这里？她是要我看看我们从大英帝国继承下来的旧医院。还有，她说她现在能够看书和写她的名字了，在殖民地时代她什么都不懂，不得不用指印代替她的姓名。”尼雷尔说，这所新医院是在我国自力更生计划下建筑起来的，村里人每星期为公家的工作义务

劳动一天；医院在材料上花了三千多英镑，但据说它的价值至少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在开始时，我们自力更生碰到的困难之一，就是当这样的建筑物完工时，可能会没有人能管理它。但是我们的五年计划将能提供一个助产士。”

在布凯内，尼雷尔对人民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但告诫他们：“斯瓦希利谚语说，‘当酿酒人酿的酒受到称赞时，有可能把酒掺淡。’不要那样做。如果那样做，会给我们带来耻辱。”接着他讲了他的主要论点：“恩泽加县的牛群比全国任何其他县都多。牛是我们的财富，你们必须利用你们的财富。每年你们必须卖掉一些牛，得到钱来为你们的孩子付学费和建造较好的房屋。看看查加族人吧。查加族人利用他们的咖啡变得富裕了。你们也必须利用你们的牛富裕起来。”

下午，正如哈欣预言的那样，尼雷尔停下来去看卡齐马的妇女。她们大半是寡妇，有几个孩子或孙子。在尼雷尔号召人民离开城镇到外面去开垦土地后，她们早在几年前就从六英里外的塔波拉移居到这片空地上来了。妇女们招待总统吃煮熟的花生和玉米，接着向他诉说她们的困难。她们说，她们的稻子由于缺少雨水而干枯了，但是她们在番茄上赚了三百先令。尼雷尔说，“如果你们种了三倍番茄，你们就

赚了九百先令了。”一个妇女回答说：“的确，‘巴布’（父亲），我们太笨了。”她强烈地抱怨向附近水坝取水所遇到的官僚作风。她说，现在去取水要凭证了。尼雷尔把车子掉转来去找地区专员，即管理塔波拉区这块地方的长官。后者带点辩解的口气回答说：“这是为了防止未经许可的人糟蹋水。”尼雷尔告诉那个妇人不要着急；他已有一个计划用管子把水从水坝引到村里来，并且不久就会把这个计划告诉她们的。当他准备离去时，妇女们为他唱起歌来：“尼雷尔号召人民到乡下去，他要看看那些掌握了土地的人们。”接着唱了本地的民歌，据哈欣翻译，歌词是这样的：“狮子的孩子是只狮子。你已结束了黑夜。现在加把火烧煮起来吧。”

第三天 “瞧着我，”尼雷尔对一群孩子说，“如果你们不是这样怕羞的话，这张照片会很美的。”结果照片模糊了。“呀，”尼雷尔假装沮丧的样子说，“照相机真使我扫兴。”随后打算为一个农民、他的妻子和吃奶的孩子拍照，可是波拉罗伊德牌照相机的胶片用完了。副官跑上去又拿出些胶片来。尼雷尔说，“我正在为一九七〇年的选举尽最大努力，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当一个农民夸口说，前一年他在烟草上赚了八万二千先令——差不多合四千三百英镑——时，尼雷尔表示惊奇。他说：“这比我的薪水

还多二万先令。我应该搬到乌兰博来。这样我的头发可以不会灰白了。”

他对一个外国访问者喊道：“看这把‘真贝’（锄头）。”他指着一把有三英尺木柄的单齿锄。这是坦桑尼亚的基本农具。“你看到了吗？用这种锄不管一个人怎样辛勤劳动，即使他每天劳动二十四小时，也不能得到很多成果。”后来，在乌兰博农民训练中心，他讨论了用牛犁来代替“真贝”。他对英国校长说：“我肯定认为牛犁是问题的答案。我是个最主张用牛犁的人。”

当尼雷尔问一个农民他在前一年种了多少烟草时，这个人耸耸肩膀说他不知道。“噢呀，”尼雷尔高兴地说，“可能你不愿意讲，怕我们会征收你的税吧。”这个人胆怯地笑着。当尼雷尔巡视最近由坦盟的当地青年团支部所种植的一小块烟草地时，议会的一个印度籍塔波拉议员批评青年团的这种工作做得不经济。尼雷尔质问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进入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塔波拉还没有计划种什么东西，但是你却批评那些已动手做了些事情的人。这是为什么？”

那天晚上在专区专员公署的阳台上，尼雷尔用他的手提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短波新闻广播，接着就罗得西亚的政治形势开了个座谈会。当

座谈会的一个成员提出，如果英国不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就可以“退出”时，尼雷尔大笑起来。“退出！”他说，“他们以为我们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吧。”

第四天 尼雷尔花了两小时主持塔波拉的市镇会议。所有涉及当地事务的问题，都被津津有味地和详尽地提出来讨论。尼雷尔缓慢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他讲清道理，但是他的音调不断改变；一会儿高昂和富有生气，接着轻声地说，一会儿说得很快和带有恳求的口气，接着放声大笑起来。

有人问他，究竟什么人应该向地方政府缴纳营业税？尼雷尔举了几个例子说：“做‘维图姆布阿’（炸米糕）并在她家里出售，以便购买肥皂和火柴的妇女，不需要付税。一个在他的篷车里出售香烟或织品的男人，情况就不同了。我要说他应当付税，不是因为他的营业是流动的，而是因为它是牟利的。”

那些卖牛奶和咖啡的人怎样呢？他们应该领执照吗？尼雷尔说：“如果处理不卫生，牛奶会有危险的。因此，应该知道哪些人卖牛奶，而如果他们有执照，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了。至于咖啡，我认为你们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应该把它归到由妇女在家里做的工作一类中去。除非大规模销售，否则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利润的。”如果牛奶商人只在自己家里出售是

否应该付税,关于这点发生了一场争论。尼雷尔说:
“我建议他们要有执照。但这是要由地方政府来决定的。”

一位穿着飘垂的白色“坎祖”(长袍)的坦盟老盟友说:“地方议会请求在塔波拉建立工业,诸如鞋厂、皮革厂和烟草厂。”尼雷尔把前两个工厂的问题交给塔波拉区的议员们去讨论,对第三个工厂作了详细的说明。“我有一次问过烟草工业的一位领导人,为什么不在烟草原料丰富的塔波拉或伊林加建立烟草厂,而莫罗戈罗却被选为建立这种工厂的地址。我要他说得使我信服。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在目前,烟草主要种植在塔波拉和伊林加这两个地区。伊林加已经有了一个小厂,不过要它接受坦桑尼亚出产的全部烟草是不够大的。我们可以扩建这个厂。但问题在于运输。烟草从塔波拉运到伊林加,在到达伊林加之前必须装卸两次。你看到吗?如果要在塔波拉建立工厂,情况将是一样。因此,莫罗戈罗被选择为厂址。塔波拉和伊林加两处的烟草,可以直接运往莫罗戈罗而无需中途卸货。其次,还有潮湿的问题。塔波拉比伊林加或莫罗戈罗更为潮湿。所以,塔波拉落选了。

“第三,还应有一个集中地点,以便我们所有的烟草都可以在那里拍卖。举个例子,在索尔兹伯里

有个地方，拍卖罗得西亚的所有烟草，世界各地的买主都到那里去买烟草。莫罗戈罗将是我们拍卖烟草的合适地点。买主可以到莫罗戈罗去买我们的烟草，然后在当天回到达累斯萨拉姆。我认为他们不会为了购买少量烟草而愿意在我们国家里跑来跑去。将来，产量增加了，我们肯定会在塔波拉建厂的，但同时也要在莫罗戈罗建厂，我们将把它扩大四倍，一直到它能够每年吸收四千万磅烟草。”

会议结束时，天气很热。尼雷尔对一个外国访问者解释说：“这就是我正想做的事。那天在乌兰博，你看到的是老方式，我在那里要讲上一两个钟点。这次会议的方式好多了。它使我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讲话。”

“塔波拉是我的第二故乡，”他继续说，“我在这里当了六年小学生，三年教师。但塔波拉是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走的是从前贩运奴隶的路。这里的人是奴隶贩子的子孙。他们太喜欢争论了。”

那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尼雷尔站在专区专员公署的阳台上，同来看他的市镇上的人闲谈。他热情地接待了其中的一个青年男子和女子。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忧愁的老妇人。当这些来访者和坦盟的老盟友开始散去后，尼雷尔坐下来，改用英语讲话。

他说：十五年前他在塔波拉就认识了这个人

和女人。“我常在晚间教他们英文。有一次在斋月期间，他们都呆在家里不来。我很恼火。我说——我不该这样恼火——我说，‘如果你们不来，那么好吧，我有别的事情要做’。”他笑起来了。至于那个老妇人呢？“她的问题是，她是一个穷苦妇女，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至少有六十岁吧。但是她的母亲还活着。她的问题是要养活她的母亲和她自己。她很想抓住我不放。昨天早上我对她说：‘晚上到专区专员的屋子里来。’可是她唯恐在慌乱中迷了路，因此她跟着我们到锡孔盖再回来。今天又跟着我们到恩泽加再回来。啊，在她的家乡布凯内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忘记处理她的问题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告诉她我们已做的事。我问过当地长官，是否可以为她找一个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他说可以，这就行了。”

有人问他是否可以用英语再说一遍他对老盟友所讲的关于山羊毛的故事。“啊，这个，”他扫兴地笑笑说，“我不认为这个故事可以用英语来讲。但是，好吧，我试试看。”

“当我十岁左右时，我的父亲有一天派我陪同他的第一个妻子——我的异母之一——到八至十英里外的一个村子去，她在那里的一个亲戚死了。当我们将要离开那个村子回来时，她的亲戚们送了她一

头羊。唉，因为我是个小孩，我的任务就是用绳牵着山羊走。但是山羊一动也不肯动。当我同它扭斗时，她的一个亲戚说：‘不要着急，我给你弄得方便一些。嘿！他从我头上拉了些头发下来，又从山羊头上拉了些毛下来，用草根把它们掺在一起，嚼烂了喂给山羊吃。他说：‘现在山羊会跟你走了’，这头山羊一路上跟着我走到家。”他大笑起来。“是的，很驯服。它象条狗一样跟着我。”

有人问他，作为一个非洲领导人，他是否觉得缩短部族生活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差距有困难。他说：“我不认为这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困难。我十二岁就离家上学。在部族社会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实际上就是个大学生了。是啊！你在十二岁时对生活已了解很多了。你了解的事情同在开放社会里了解的一样多。当然，长者们的秘密是不会让你知道的。但你了解很多。当我现在回家时，家里人对于我对部族生活了解得如此之多一直感到惊奇。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对一种生活方式感到满意，问题就来了：你怎样跳过去？这差不多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启示。如果你过着某一种生活，并且是在这种生活中成熟的，那么要从印度教跳到基督教——我想，甚至从新教跳到天主教——作这样的一次跳越将是很困难的。我对部族生活的信念从未

消除过。当我还是十二岁的小孩时，我早已有了为我所接受的信仰。在我能够接受另一种信仰，即接受对上帝的信仰之前，我已经被说服了。

“基督徒不接受部族的概念。可是他比其他很多人更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也相信一些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就是：那头山羊跟着我走了。我最多能说的是：我不理解。

“这个人的部族”，他指指哈欣·姆比塔说，“他们过去多少年代以来接种预防蛇毒的疫苗。你可以看到尼亚姆韦齐族人被蛇咬了而不倒下。如果有人对我说：‘其他部族的人被蛇咬后都倒下了，但是尼亚姆韦齐族人不倒下，’我会说：‘废话！’但那是基于无知的缘故。总之，我对我们人民的信仰是能够容忍的，对科学也是如此。”

这时天已黑了，所有人除两三位长者外都走了。尼雷尔被问到他是否可以谈谈他对中国的印象，他在前一年曾访问过这个国家。

“好吧，”他说，“我希望冷战在这里不会成为一个复杂的因素。我希望我们只谈一些明明白白的事实。如果你带我去看通用汽车公司，我会惊奇。如果你带我去伦敦，我会说，‘多美妙啊。’去年我访问了荷兰，一个小而非常先进的国家，”——他的音调在惊异中提高了——“他们正在花好几亿英镑把大

海推回去！唷！我所能讲的是‘妙极了！’但它同我们在坦桑尼亚所能做的事毫不相干。美国和欧洲的装配工厂也都不相干。嗯，这个时候会到来的——然而还没有到来。

“你今天看到的那个水，那个小水坝，它花了一千五百镑。那是我们能做到的。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各地都建造起那样的水坝，把水供给每个人，这将是一次革命。

“中国不同。中国是一个正在力图奋起的落后国家。但它已走在我们前面两步了。不——有些地方是三步，有些地方是两步，有些地方是一步。你能看到这些步子，你会说，‘孩子，为什么我们不想那样做呢？我们应该那样做！’我应该派许多人去看看这些事情。但这同冷战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我们的力量能做什么的问题。

“我一直告诉我的人民：‘我们要改变，我们必须机械化，我们必须有较好的工具。’但什么较好的工具呢？不是联合收割机。如果给我足够分配给坦桑尼亚每一个家庭那样多的联合收割机，我怎样处理它们呢？没有技工，没有零件……”一想到这些就会打颤。“这将是個很严重的问题——当然，除非我把它们卖出去换成现金。但是我们仍得给人民较好的工具，他们能够使用和买得起的工具。当美国人

讲到较好的工具时，他们讲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还在使用锄头。如果坦桑尼亚的两百万农民能够从锄头跃进到牛犁，这将是一次革命。这将使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使我们的产量提高两倍！这正是中国在做的事情。这个古老民族正在解决要养活七亿人民的困难。他们的发展阶段同我们是有关的。我希望我能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个众所注目的事实，而并无其他意思。可是当我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时，他们就说我们赤化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他慢吞吞地说，“还有个态度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讲才好。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穷国和富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让我试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有一所医科学校。有天学生罢课了，他们要求较好的条件。有的学生是读医学，有的是读卫生检查。他们都要求较好的条件。此外，读医学的学生不愿同读卫生检查的学生在一起吃饭。哦！我说——当然我是在说笑话——‘这是怎么回事，在达累斯萨拉姆有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吗？他们想取得隔离的方便条件。’

“唉，除了两个学生外，所有学生都罢课了。我们发现这两个人一个是从俄国留学回来的，另一个是从东德留学回来的。现在我认为——也可能我是错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不罢课有两个原因。首

先，他们可能把我们所提供的条件同东德和俄国的条件作了比较，断定我们的条件并不太坏。但是，我认为，还有态度上的不同。西方”——他停了一停，沉默片刻——“太个人主义了。西方国家的所有教科书都讲权利、权利、权利，而不讲义务。联合国宪章是一部权利宪章。很好。这非常好。你不能讲得比它更好了。学校、教会一直在讲权利。而义务通常被解释为只须‘遵守法律’。须知这是最低限度！很多骗子确实是遵守法律的。

“在东方国家，对这一点是有反应的。有一种反应我以为象钟摆一样，为了取得平衡，你必须两边摆动。当人类社会非常夸大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以为在达到平衡之前，必须树立对立面。东方国家具有非洲所需要的某些东西：强调义务。而西方却把义务看作是自由的丧失。他们会说，‘义务！把人民编成队伍。’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种类型的世界来说，一个人牺牲许多人而使自己过得舒服是太便当了——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现在最大的危险之一是高层人员的贪污。这是对非洲悄悄的掠夺。使自己尽快地发财！如果有人责问这点，那你们就是在责问人民的自由。

“我和西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督教。我是一

个基督徒。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却要向东方学习这些东西。基督教是个革命的教，可是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头。非洲，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们不从东方另外学些东西的话，我们也必须学会对私有财产看得轻一点。但是在非洲，为了个人富裕大肆掠夺，对事情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大陆并没有足够的财富。财富将全在高层人员手里，留下来给人民的就没有什么了。”

第二章

“那些得到受教育权利的人，有责任报答曾经为他作过牺牲的其他一些人。他们就象在遭受饥荒的村子里，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一个人，为的是使他可以有气力从远方带回供应品来。如果他拿了食物而不给他的兄弟们带来帮助，他就是个叛徒。”

“你们把我安置在那所德国人的大房子里，我在那里睡得很好。”在宣誓就任坦噶尼喀总统后不久，尼雷尔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达累斯萨拉姆对一群人说：“我吃得很好，以致我也许忘了工作。但是，你们的责任是到我这里来敦促我和你们一同工作。不要埋怨。请到这里来，提醒我要做工作。”

严格地讲，国家大厦并不是一所德国人的旧房子。德国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大厦，早在一九一四年被英国皇家海军的炮火摧毁了。目前的建筑物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造的。这是一幢舒适的、

不很整齐的二层楼房屋，粉刷得很白的摩尔式墙壁，周围都是棕榈、赤素馨花和紫茉莉花。当坦噶尼喀先后作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的时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六一年这幢房屋是英国总督府。尼雷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私底下称它是“我的监狱”。他的兄弟约瑟夫曾说：“他决不想住在那里，从来也不想。人们会说，‘那是座宏大的政府大厦，从前我们常在那里看到总督。现在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人住在那里。’他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我无需住在那里’。”但是他忍受了三年半时间，把它既当作办公室又作为住宅。现在它仍然是他的办公室和官邸，但是从一九六六年起，他住到别处去了。

一个访问国家大厦的人，常常会对它的静谧气氛感到惊奇。一头汤姆森小羚羊和一只孔雀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可以看到一艘乘着季节风从阿拉伯半岛驶来的三角帆船，沿着地平线驶向达累斯萨拉姆港的狭隘入口处。一个穿白衣服的仆人，捧着两个芒果静悄悄地从开阔的走廊上走来。

尼雷尔的二楼办公室，同样是一片寂静。在他有约会时，难得有电话铃声来打搅他。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包括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在内，多半是跑来看他而不是打电话。卡瓦瓦作为联合共和国的第二副总统，在国家大厦的缩写中，长时期来被称为

“第二 V.P. (副总统)。”从一九六四年联合时起就担任第一副总统的谢赫·阿贝德·卡鲁姆，直到他一九七二年四月在桑给巴尔被暗杀，一直是住在桑给巴尔的，但有时飞到达累斯萨拉姆来出席每周的内阁会议。

在六十年代初期，尼雷尔同其他的东非总统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和乌干达的阿·密尔顿·奥博特(他在一九七一年一月被一次陆军政变所推翻)的办公室，保持着私人电话线路，但几年前为了节约的缘故都取消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时，尼雷尔常用电话同他的朋友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商谈；但那时从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唯一联系——这使人看到非洲的弱点——要经过伦敦和罗得西亚的首府索尔兹伯里。后来才装置了直通电话线。然而就是在今天，如果尼雷尔要打电话给另一个邻国布隆迪的总统，他的电话还是要经过伦敦和布鲁塞尔。

“他对什么事情都要讲笑话”，曾担任尼雷尔的主任秘书三年的约瑟夫·纳马塔有一次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大声叫喊过，但是如果他发了火，他是会叫喊的。他会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有一次，一个专区专员把一个欧洲人关了十四天，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直到接到大使的申诉后

才知道这件事。总统叫专区专员到达累斯萨拉姆来——啊，很远，四百多英里——并下令立即释放这个欧洲人。这个专区专员也不再当专区专员了。但这发生在几个月以后——这样你们不会把这个事件同他联系起来。”

尼雷尔早上在国家大厦的时候，要阅读一大堆报告和备忘录，并在上面签上他名字的头两个字母“J. K.”。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称他“姆泽埃”，意即“老人”，虽然也有少数人称他为“姆瓦利穆”的。独立后不久，尼雷尔宣称他不愿被称为“尼雷尔博士”或“阁下”，他不时重申他的指示，提醒他的同胞们说，他的官衔——只用于“非常正式的场所”——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瓦利穆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并且决不要称他的妻子为“夫人”，也不要称她的助理人员为“侍女”。家庭的一位朋友曾说，“一个崇拜他的秘书曾开始称玛丽亚为‘尼雷尔夫人’。嘿，他一点也不要这一套。他说，‘她是第一夫人。但她是尼雷尔太太。’”

他的最著名的说教之一，是给他的同事们的一封信，要求他们帮助消灭讲究排场的毛病。这封信最初于一九六三年作为备忘录印出，后来收集在他的《自由与统一》一书中。他在一九六三年写道，“必须制止把尊严同纯粹的讲究排场混淆在一起

的日益增长的倾向，否则的话，它将破坏共和国的尊严……把我们的国歌当作流行歌曲看待，任何政府人员一出场就反复播放，对国歌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尊敬的了。我们在最合适和最不应有的场合唱它，可是，如果有些不幸的过路人正好没有注意我们，我们就生气并且叫嚷这是‘对共和国的侮辱’……。在别的国家里，不经预先通知通常是不奏国歌的，正因为有些政府官员为探望他的岳母会偶尔在一个简易机场着陆……。警察护送也同样需要预先告知。至今每当我质问所有这些非常不民主的讲究排场的价值时，总是有人向我保证说：人民喜欢它。但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总统、部长或专区专员下午驱车出游，人民真的喜欢被人吆喝着让路吗？我们应该停止欺骗自己，这种讲究排场对人民毫无好处，因为它恰恰是民主的反面。我们必须制止它！”

尼雷尔的朋友们认为，一九六四年一月的陆军叛变，增加了他对居住在国家大厦里的本能的厌恶。那时总统被迫从官邸逃出，隐藏起来。不管怎样，两年后，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北面几英里外的姆萨萨尼湾造了一所滨海的房屋。为了安全起见，房屋周围的地区清除了树木，设立了铁丝网、泛光灯系统和警卫室。有一阵，看来尼雷尔可能改变了主意，决不会

搬进去了。约瑟夫·纳马塔回忆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坚持姆萨萨尼的房屋应当有卫兵。是我们把铁丝网和泛光灯装在里面的。可是，他拒绝搬进这幢房子！他说，‘这是我的私宅，我并不害怕，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在屋子里安安静静呢？’起初他不肯住进去。最后，因为他的妻子说服了他，而不是政府里面我们这些人说服了他，他改变了主意。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他自己的。为了款待客人，象我布置国家大厦那样，我从公款里买了一架收音电唱两用机。他不肯收，因此我只好退给商店。他要这幢房屋清清白白。”

尼雷尔试图以同样态度来保护他的家庭生活的纯洁。他的妻子玛丽亚·加布里埃尔是个怕羞的、长得清秀的女人。她生了七个子女，冷静地容忍她的丈夫忙于公务。“我明白，我明白，他不属于我，”她有时向朋友们抱怨地说，“他是属于坦桑尼亚的”。她对迁居姆萨萨尼湾感到高兴，立即说道：“我们又可过家庭生活了。”她的朋友们认为她是个有坚强意志的妇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朱利叶斯在爱丁堡大学读了三年书回来时，她推迟了筹划已久的婚礼，直到她确信他没有变心。她的朋友们还回忆起，在陆军叛变的那天早晨，是她说服她的丈夫从国家大厦逃出来的，正如后来她又说服他应当迁到姆

萨萨尼那样，即使那幢房屋并不是他所喜欢的私人避难所。

“他不愿对任何人发号施令，连对他的妻子和子女也是如此，”家庭的一位朋友发表意见说，“但是他有一定的习惯。例如，有天晚上，他的妻子——她是个影迷——带了孩子去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或克利夫·理查德或者别人主演的电影。朱利叶斯后来说：‘你知道，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时，一家电台的记者对我说，尼雷尔先生，你喜欢摇摆舞吗？我说，唔……它不完全象非洲的节奏，我想我是欣赏的，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跳。然后他问，你欣赏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吗？于是我回答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怎么样？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什么人？唉！那次访问就是这样结束的。后来这个记者对我说，你知道，由于你的那次回答，你得到了许多朋友，但也招致了许多敌人。’”

“嘿，”家庭的这个朋友继续说，“他在他妻子面前讲了这件事情，作为对她的暗示。接着他对她说，‘如果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到这里来，他可以呆在那里’——他象这样颤了一下——我不要他跟我太接近，我想我没有太多的话同他谈。”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尼雷尔去塔波拉巡视后几个月，有四百个大部分来自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

的学生，到国家大厦来游行。他们对一项规定他们要在“国民服务”中工作的新法令表示抗议。按照这个制度，坦桑尼亚的青年人必须专门用两年时间参加各种“国家建设活动”。在这期间，大学毕业生只能得到他们做公务人员所得薪金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学生们对第二副总统卡瓦瓦这位“国民服务”计划的执行者特别感到愤怒，并且举着这样的标语牌，如：“卡瓦瓦和他的计划见鬼去吧”和——带有极大侮辱性的——“殖民地时代的生活还好些”。

他们在国家大厦的台阶上会见了尼雷尔、卡瓦瓦和内阁的大部分成员。一位学生代表上前用带有浓重鼻音的英语发出了他们的“最后通牒”。他宣称，政府试图“把这个广泛计划的经济担子放在年青的和自顾不暇的学生肩上”，并且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或者按照我们应得的全部权利付给薪金，或者让那些高薪阶层也列入这个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牺牲形式而不是剥削形式的一类。”换句话说，如果指望大学毕业生以两年时间从事“国民服务”，而只能得到公务人员薪给的百分之四十，那么，政府官员也应作出牺牲。“因此，阁下，除非有关条件和我们领导人对学生的态度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在精神上不能接受‘国民服务’。我们的身躯可以去，但我们的心灵将留在计划之外”——暴风雨般的鼓掌——“政界

的领袖同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之间的战斗将永远继续下去。谢谢你们。”

尼雷尔开始用平静的、差不多是敷衍的态度讲话：“我来回答，我了解你们的抗议。这其实不是对第二副总统讲的，而是对政府讲的，我们已收到了你们的信件。我了解它，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稍为解释一下。我想彻底弄清楚，我们对你们领导人所说的话，你们是否已经晓得。

“这个问题并不是从昨天开始的。政府的意图是，‘国民服务’不应该只适用于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初中毕业生）或失业者；这是国民的服务。它应当包括中等学校（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所有其他人。我们曾探讨过，在青年人的一生中哪个时期，哪个特定时期，我们要他投入‘国民服务’？我们在他完成学业之前还是之后接受他呢？

“所以我们决定不——他的声音现在有点爆裂的样子——‘你不要中断他的学业，你不要去干涉他，你等他完成学业’。我们作了这个决定。我认为这是政府方面极为慎重的决定，考虑得很周到，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它牵涉到一定的问题。如果你等一个学生完成他的学业，比如说他是培训当教师的，那么他就有某种期望了。如果他是培训当教师，他的薪金将是……多少呢？七百十六镑一年？呀，七

百十六加七十六。这就是他的薪金，七百九十二镑。这个教师心里就在想：‘在我毕业时，我会拿到七百九十二镑’。这是他的期望。因此，如果你等他完成了教师的训练，你就容许他去想：‘七百九十二镑是我的权利’。正如你们的代表所说，‘我的全部权利’。”他把“权”字（英语“权利”的第一个字母为 r——译者）发卷舌音，读成“我的全部权权权利”。

“我们犯了别的一些错误。我们说过：区别对待他们。把他们所做的教师、医生、或工程师的工作，都算作‘国民服务’。一个学生已经被培训为教师；很好，让他到课堂里去。如果他是医生，让他到病房里去，让他到穆欣比利医院去，把这些都算‘国民服务’。

“很明显，如果我们接纳你们这些人，并且说：‘好，可是不要让他们完成学业，首先让他们完成国民服务’，那么你们就不会同我们谈话，或者同副总统谈话并要他辞职了。你们也不会谈到百分之四十了。什么东西的百分之四十呢？你们又没有薪金。我的意思是，取消这个该死的百分之四十的废话的真正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要你们在上大学之前从事‘国民服务’。这就是全部情况。

“我好久以前就解释过这百分之四十的事情了。从那以后，我们已经作了改变。我们已经改变了这

件该死的事情。我们说过，我们保证最低工资——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政府最低工资；一个‘国民服务’人员不会得到少于一百零八镑的年工资。拿教师来说：从七百九十二镑减去一百零八镑，然后把余数打百分之四十的折扣，再把它们加在一起，人家告诉我说这有三百八十一镑。你们不是还说，副总统先生，‘要住房免费’吗？你们不是还说，‘不交直接税’吗？你们真的这样讲过吗？对一个有三百八十一镑收入的人不交税吗？当我们谈论‘国民服务’时，这些就是废话。国家对它的青年人说：‘我们需要你们服务’。青年人不是掉转头来问国家：‘给多少钱？’而只是问：‘去哪里？做什么？’这才是国民服务的意义。”

他又平静下来，说：“现在，我接受你们的最后通牒。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将不强迫人。你们是对的，你们的身躯去那里，而你们的精神不去那里，你们是对的。谁要是精神不去那里，我便不要他参加国民服务！这样的人谁也不要！谁也绝对不要去！”迟疑了一会，响起了掌声。

“你们知道，国民服务不是监狱。要是谁以为这是监狱，我不会把任何人送去，一个都不送去！可是尽管如此，对于每个打算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来说，这仍是强制性的。因此，你们自己作出选择吧。我不

会花费公款来教育那些说‘国民服务是个集中营’的人。不——”现在他很平静。“——我不会做这种事。我接受你们的最后通牒。”

歇了好久之后，他又开始讲话。每个字都是在愤怒中讲出来的。“当你们谈到薪金时，你们是对的。我们的薪金是太高了。你们要我削减吗？”鼓掌声十分强烈。“两年吗？我没有说两年。我不是用两年来建设这个国家。我愿意减薪。你们要我先从我的薪金减起吗？可以！我将减少我的薪金。”可以听到“不要减”的喊声。“我要削减这个国家该死的薪金。我的薪金，从现在起，减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我减我的薪金。这个该死的国家！薪金是太高了！对坦桑尼亚来说太高了！”

“我的薪金！你们知道我的薪金是多少吗？一个月五千个该死的先令！在一个穷国家里，五千个该死的先令！穷人一个月只拿二百先令——你们知道他要多久才能挣得我这个该死的薪金吗？二十五年！在这个国家里，拿二百先令的穷人，要二十五年才能得到我一年所得的钱。

“这个该死的薪金！就是这些薪金在受过教育的人里，在他们所有的人里造成了这种态度！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和你们！我们是属于剥削阶级！我是属于你们的阶级！在那里，我认为三百八十镑

一年是集中营！是强迫劳动！我们是属于高高在上的这个该死的剥削阶级。这就是这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吗？这就是我们为之工作的吗？是为了维持这个高高在上的剥削阶级吗？

“我同意你们！我们拿得太多了！除了贫农外，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拿得太多了。我要减薪！我同意你们！你们对国家这样关心，我很高兴！强迫劳动？我们从哪里搞来的这个语言？如果有朝一日我能给坦桑尼亚每个工人三百八十镑，我们就得搞一次在非洲任何地方都没有搞过的革命。有朝一日我能成功地给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所有的人三百镑，我们就得搞一次可怕的革命。我们所有的人就可以站在乞力马扎罗山顶上，宣告这次坦桑尼亚的革命！”

“强迫劳动！去，到课堂里去，去了不要教书。我们将把它算作‘国民服务’，给三百八十镑一年。你们是对的，薪金是太高了。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在要求一磅肉^①。这每一个人不包括贫农。他怎么能要求一磅肉呢？他不懂这个语言。就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他也不能说是强迫劳动。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什

① 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要割借债人身上的一磅肉来还债。——译者

么样的国家啊？”他讲这句话完全是叫喊了。

“我已经接受了你们所说的话。而且我准备不断地修改薪金制度。至于你们，我要求你们回家去。我要求你们全都回家去。拉希迪！你要负责检查他们回家去。”

有轻微的鼓掌声，大概来自那些还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学生们。他已经把他们开除了，共三百九十三人，并把他们送回家去。

坦噶尼喀的最后一任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说：“你知道，他有点甘地的气味。他并不缺乏勇气，但是他从不去和困难搏斗。他很慢才懂得：在你统治的时候，你会伤害人民的感情；每一个行动将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他非常坚持原则。正象萧〔伯纳〕在他的《序言》中所说，那个会‘卖掉一切来追随我’的人，将造成无限的混乱。啊，朱利叶斯也会卖掉一切，把它分给穷人，而宁愿接受随之而来的混乱。他有一点舍己的愿望。他很想按照原则来达到合理的目的，而不是达到现实的目的。但是，他是一个比大人物还要伟大的人物。他有一次对我说，为了避免争吵，他会走无穷无尽的路程。他说，只有一两次他让争吵发生了；他担心大喊大叫和脸红颈赤有损于尊严，而且事后他感到多么惭愧。朱利叶斯伟大的地方是：他并不想从领导职务中营私

自肥；他就是不在乎财产。我记得，有一个时候，他一天吸一百支烟；当他发现这影响他的工作时，他戒了烟，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一个助理人员说：“使人吃惊的是他改变得多么少啊。在姆万扎，有一条尼雷尔街。他说，‘这是为我的父亲而命名的’。达累斯萨拉姆市议会想拆下阿斯卡里纪念碑，放上总统的铸像。他说，不要。他不喜欢个人崇拜。他不相信一人政府，他相信意见一致的政府。他的方法是说服人民，象在坦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那样。他们辩论着，辩论着，辩论着。他通常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辩论着。他们这里正象其他地方一样，很容易会有一个独裁者。这里的民主政治比较强大，因为总统在鼓吹它。”

他的一个部长说：“他一开始先信任人。然后他让你来证明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证明相反。他一开始就对人感兴趣。他是从无限信任人出发的。随后他或许发现你是个蠢人或恶棍；或许发现你是能够相处的人。有些人说，‘他喜欢对人放长线’。”

他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神父说：“朱利叶斯·尼雷尔最不信任的是官僚，他非常信赖人民固有的善良。我常常对他说，‘在非洲只有一个尼雷尔’，而他并不总是相信这一点。”

《观察家报》采访英联邦事务的记者科林·利格姆说：“在他认为是正确的事业中，他从来不怕失去领导权。在重要的事业上他是准备拿他的领导权来打赌的。在种族和尊严问题上，他的直接反应经常是情绪激动——尖锐和刺人的。这给那些在事后必须立即同他打交道的外交人员造成了困难，因为他已深深地陷入了情绪激动的境地。然后，总有第二个阶段：有理性的人占了上风。他实质上是个有理性的人。”

他以前的同事奥斯卡·坎博纳（在他同尼雷尔决裂并于一九六七年流亡之前几个月）说：“他有两种性格，现在他仍有这些性格。我相信如果他保持这些性格，他会成为非洲非常伟大的领袖。一个是他的平易近人，他理解别人的观点。另外一个是他对财富的淡漠。他一点也不想财富。他第一次到联合国去的时候，提了一只破旧的手提皮箱。他从不为衣着而烦恼。”

奥斯卡·坎博纳在逃出坦桑尼亚几个月之后说：“我可以谴责总统并证实他是藏在民主的外表后面，而暗中却在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裁者。这是一个陷入邪恶之网中的人的心理。”

一个西方外交官（以前派驻肯尼亚大使馆工作）说：“他应该在大学里工作。由于他长期以来是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宠儿，他必须证明他是不结盟的。至于乔莫·肯雅塔，如果你指责他亲英，他会说：‘在被英国人监禁九年之后，我能够对自己作出评价。’但是对朱利叶斯来说，这样讲就比较困难了。”

一个西方外交官（以前派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工作）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打桥牌的人能拿到一副好牌，并且得到好成绩。但很少有象他拿到这样坏牌的。”

朱利叶斯·尼雷尔（一九六五年由于英国的罗得西亚政策，他同英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不久）说：“我并没有变，过去我被认为是一个温和派，因为我坚持某些原则——特别是两个原则。一个是我们赢得独立的方法。我心里很清楚，由于在英国统治下的托管地的性质，有可能不用暴力赢得独立。我坚持这一点。我并不是甘地那样的非暴力者。但是我覺得暴力是一种邪恶，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人们不应支持它。因此，在西方世界，他们说：‘朱利叶斯很好’。我不以为共产党人认为我是很好的。我想，他们指责我是英国人的应声虫。第二，我说过，种族主义决不能成为我们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我站定我的脚跟。我的同事中有些人对这种‘纯洁’感到不高兴。但是我坚持了这一点，西方说‘朱利叶斯很好’。所以我得到了好名声——一直到独立，都很好。”

但是，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罗得西亚。我要哈罗德·威尔逊说出下面这句话：独立应建立在‘多数人统治的基础上’。而我突然成为一个坚持我的非种族主义的极端派了。现在，我在罗得西亚问题是英国的绊脚石，于是我成为一个坏人。现在我在西方的名声非常坏。但坚持原则不是错误。他们不是要我现在说‘种族主义是好的；让我们的人民反对住在这里的印度人’吗？不行！”

尼雷尔在空闲的时间，曾把两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朱利叶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译成斯瓦希利文。他在出版《恺撒》的译文后，收到朋友们和斯瓦希利语学者们的许多建议和更正，后来他又重加修订。有时，按照斯瓦希利的习惯，他和当地的作家以诗相酬答。听说大部分诗具有爱国的主题，但尼雷尔很少谈到它们。有一次他说，“经过仔细的思考”，他认为把它们公开发表出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他的大部分著作专门谈论坦桑尼亚的事务，包括从一九六七年的《阿鲁沙宣言》到他私下发给坦桑尼亚外交官员题为《辩论，不要叫嚷》的备忘录；这是使外交辩论的语气变得温和的一部精心之作。他的演讲和论文已出版了两卷。在为第二卷《自由与社会主义》收集材料时，他决定删去一九六六年向控诉的学生们所作即席演讲中的所有段落。他说：“我是

过于激怒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他要求被开除学生的家长写信给他们的专区专员，声明“如果学生恢复学业，他应对国家有所裨益”。他们如对上述声明感到满意，尼雷尔准许他们大部分人回到大学。他说，他觉得他们终于相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信念”，才能建设坦桑尼亚。

第三章

“当基督教传教士们试图感化我父亲的时候，他会倾听他们，并且在他们讲完之后，他会向他们讲道，于是他们就一去不返了。当他们对这位老人说‘爱你的弟兄’的时候，他会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英国人反对他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他有二十二个妻子。”

尼雷尔在谈到他的部族的时候说过：“我们桑纳基族人在我们邻近的部族中有两个名声。一个是狡猾。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名声是不可信任。人们会说：‘一个桑纳基族朋友是会把你杀掉的’。这并不是事实。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那种名声。但肯定的是，我们是有真正独立自主的精神的。正如在这么小的共同体中所常见的那样，人们对自己是非常自觉和非常自豪的。”

桑纳基族是坦桑尼亚一百二十六个部族中最小

的部族之一，在全国一千三百万人口中不过占三万五千人至四万人。他们的家园位于维多利亚湖东南和塞仑格提平原西面的山区。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有着花岗岩的断层、沉静的天空和热带非洲的绚丽色彩。桑纳基族人种植木薯、小米、玉米、棉花，饲养小鸡，并且到处都养一些牛。土壤是贫瘠的，雨水也不调和。但是正如尼雷尔所说的，“桑纳基族人不知道饥荒。”

阿瑟·威尔神父说：“他们远比大多数部族富于侵略性，并以搬弄是非著称。”威尔是美国纽约州马里诺尔的一个神父，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布塞格韦建立了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团体。布塞格韦附近的布蒂阿马村，就是尼雷尔在大约三十年前出生的地方。威尔神父说：“他们喜欢打官司。桑纳基（或称桑纳基地方，指这个部族的地区）的凶杀事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木索马（包括桑纳基在内的几个部族聚居地区的首府）的警察局经常有一张地图，钉上别针来标明凶杀、盗窃和其他严重的犯罪案件。桑纳基总是钉着一簇凶杀的别针。”桑纳基族人通过对基督教义的抵制，表现出他们对天主教神父的顽强反抗精神。经过十五年以上的传教活动之后，只有三、四百名桑纳基族人信奉基督教。对英国殖民当局来说，桑纳基族人用来证明自己是凶

猛的，就是他们同邻近部族频繁的争吵。特别是一九五二年，英国人打算废黜他们的酋长和求雨巫师伊洪约，而他们为了支持伊洪约却发动了一次暴动。威尔神父说：“我相信另外许多部族在那时候决不敢这样做，甚至不敢这样想。”

和大多数非洲的部族不同，桑纳基族人在十九世纪后期德国人来到之前，从未有过一个酋长。不过，他们有一个“姆瓦米”，或者叫“富人”，他的职责是求雨。部分地由于这个求雨的传统，使一些部族的历史学家把桑纳基族人的起源追溯到维多利亚湖之西的布哈亚。那里的求雨巫师在部族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的确，布哈亚有一个关于求雨巫师的传说，说他在很久以前由于求雨失败而被逐。在关于桑纳基的资料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有个求雨巫师来自西方。或者不过是桑纳基族人大约在一千年左右以前为了寻找食物而东迁的。巴桑纳基(前面加上了部族的字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那些人带了什么东西来”。故事是讲很久以前，有个陌生人漂泊到布蒂阿马西南马吉塔湾的一个村庄。当地的族长问：“巴扎 纳 基？”(“他带了些什么来？”)在得知这个陌生人是空手而来以后，族长就硬不收留他，他继续向前在后来成了桑纳基的地方定居下来。

某些权威认为，桑纳基的“姆瓦米”除了求雨巫

师的职务以外，还担任一定的世俗职务。例如，在发生战争时，他可以命令战士保卫部族；而在胜利时，他可以得一份战利品。按照传统，任何人杀了人，在审讯以前如果逃到求雨巫师的村庄，他就可以找到避难所。但是“姆瓦米”的行政权力不是很大的。威尔神父说过：“那里并没有酋长，政府是掌握在战士阶级，即‘埃里库拉’的手里。这个集团管理部族。在这个集团中有发言人，即‘阿巴甘比’，直译是‘那些讲话的人’。当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就举行‘埃里库拉’的会议。各个发言人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些人有特殊的地位，但是他们除了说服别人外，没有其他权力。一个发言人在进行辩护之后，仍然回复到‘埃里库拉’的一个普通成员的地位。”

当德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来到这个地区，进行殖民，建立殖民地并称它为德属东非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桑纳基地区，德国人需要由酋长去管理部族和控制部族成员。他们不是在整个桑纳基任命一个酋长，而是指派了八个酋长去管理桑纳基各村的事务。威尔神父说：“当然候选人是‘奥穆甘比’”，^①即当地的发言人。在布蒂阿马村，德国人挑选了一个名叫布霍罗的人当酋长，但是他很快被

① 阿巴甘比的单数。

表兄弟尼雷尔·布里托所接替。这个人就是后来朱利叶斯·尼雷尔的父亲。尼雷尔这个桑纳基部族语的意思是“毛虫”。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在尼雷尔·布里托出生的那一年，即一八六〇年，毛虫灾害袭击桑纳基地方。尼雷尔这个名字，桑纳基族人和大多数其他坦桑尼亚人把它读作牛-雷-雷，而今天在坦桑尼亚的大多数外国人则读作牛-雷-里。

桑纳基传统统治的巧妙手段，在对付德国人时完全失效了。当德国人最初来到桑纳基地方的时候，当时的“姆瓦米”，即一个名叫蒙盖的求雨巫师，派了一名使者去欢迎他们。使者名叫丰迪·凯尼卡，为人狡猾，又是布塞格韦村的“奥穆甘比”。凯尼卡终于设法使德国人相信，他的儿子基塔拉是整个桑纳基的首长。于是基塔拉就成了酋长。尽管他被桑纳基族人看作是冒牌货，但是他保持着这个职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被逐出坦噶尼喀之后。在天主教传道会的图书馆里，有一份没有署名、没有注明日期的文件。但它显然是在许多年后由一个桑纳基的知识青年写的。它描述了在英国人到达时这个部族的困境。“这一切都发生在蒙盖还活着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一九一八年才去世的。我的长辈们解释说，他们还亲自记得这些事情，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叫苦，即使是蒙盖本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了解新主

人，每个人都感到恐惧。”

阴谋仍在继续。基塔拉的兄弟伊松巴当上了酋长，而蒙盖的儿子伊洪约则成了“姆瓦米”。两个人冲突起来了。伊洪约由于被指控试图用一个活人作为祭品去求雨而被判有罪，从而在维多利亚湖中的库鲁库巴岛上过了六年的流放生活。一九二六年，他获准回到布塞格韦。两年后，随着伊松巴的垮台，伊洪约当了酋长。一九三〇年，这个职位被撤销，伊洪约回复到仅仅担任布塞格韦的“奥穆甘比”。他的政治地位同布蒂阿马村的尼雷尔·布里托和桑纳基的其他“阿巴甘比”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有伊洪约还担任着求雨巫师。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整个时期，木索马法院受理的继承案件中，最多而又最复杂的都是来自桑纳基族人。从上述那份没有署名的文件的摘录，可以看出木索马的英国籍县专员所时常面临的情况。

“(死者的) 年龄是重要的。如果死者的年龄还没有超过‘尼安吉’（这使他成为一个有资格携带‘基拉布鲁’——即黑牛的尾巴——的长老) 的第一阶段，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父亲。但是有一个在桑纳基并不罕见的例外，即如果父亲已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或许是因为儿子变成了偷牛贼，父亲必须代他出钱赎罪)，儿子转而依靠他的‘瓦琼巴’(即

他的舅父或叔父们),而他们也帮助他(尤其是如果他们替他买了一个妻子的话),那么他们就成为他的可能继承人。但是一旦死者的年龄超过了‘尼安吉’,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他的舅父成了第一继承人,他的同母兄弟成了第二继承人。同母兄弟的年龄如果恰巧比舅父大,那他就成了第一继承人……”

按照现在的行市,一个桑纳基新娘的代价纵然因地点和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平均约为二十头母牛。威尔神父说过:“在某些地方,代价高达三十五头到四十头母牛;而如果你说的是已经有许多妻子的老头儿,那么代价将高达四十头以上。”一个男子为了要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而预付聘礼,这是并不少见的,那时大概是预付五头母牛。她到九、十岁时,可以迁到她丈夫的村庄,而到十五、六岁时,就正式结婚。一个久住木索马的居民说:“一夫多妻是桑纳基男子的理想。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做到,他总是指望这样。”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异母哥哥爱德华·万扎吉有十一个妻子。一个朋友回忆说:“朱利叶斯为他有这许多妻子而常常取笑他。爱德华会说:‘但是我需要她们干活。’朱利叶斯会说:‘那么买一台拖拉机好了。’不过爱德华待她们是颇有感情的。对其中的一个,他还允许她离了婚。”

威尔神父说:“有一次,有家电视公司的人员来

到这里，他们站在爱德华的一排房子前面，爱德华的每一个妻子在这里都有她自己的小屋。一个记者问朱利叶斯，他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房子。朱利叶斯说：‘哎呀，这些房子是给我的嫂子们住的。我哥哥有十一个妻子，是吧。’电视公司人员问他，他以为多妻制如何，他大致讲了这样的话：‘哦，这是桑纳基流行的一种风俗。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它将会消逝。’”

一九四二年，尼雷尔·布里托酋长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死后，由他的长子爱德华·万扎吉继任酋长。朱利叶斯·尼雷尔说：“如果我的父亲按照传统行事，应当由一个外甥接替他。这应当是姊妹的一个儿子，如果他有的话。因为他没有，所以应当由一个侄子（他堂兄弟的儿子，我们也称为侄子）来接替他。但是他在继承这个问题上，决定不按传统办事。他在去世之前实际上就已经不管事了。他委派我的哥哥爱德华在一切场合代表他。他还打算把他的财产留一些给他的儿子们，但是遭到了部族的反对。”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英国人决定使桑纳基统一于一个酋长之下。尼雷尔曾说：“多少年来，部族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倡导过桑纳基的合并，因为我们仍然有八个所谓的酋长。真是可笑！即使现

在，桑纳基族人也不过四万人，因此当时的人数可能还要少些。我争论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酋长，那对部族会好一些。但是问题在于人选。明摆着的人选是我的哥哥爱德华，但是他们不喜欢他。可是，我不能强迫我的哥哥。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自己不担任这个职务？’我说：‘不，不，我不能当酋长。’”

但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朱利叶斯·尼雷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桑纳基族人举行了一次部族会议，实现了合并。“我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挑选了一位不会得罪人的酋长——伊洪约，据信他是求雨巫师。这是他的一项资格，为所有桑纳基族人所公认。既然如此，那很好。同时他们指定其他两个人当他的助理：我的哥哥当他的行政助理，另一个青年人当他的司法助理。

“可是，酋长的实际工作是由我哥哥做的。我的哥哥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在推动进步。酋长是个无用的人。我是说——一个求雨巫师！”不仅如此，伊洪约还有受贿的嫌疑；因此在一九五二年，英国地方当局决定撤掉他，并使爱德华·万扎吉成为酋长。

英国籍的县专员和他的助手在靠近布塞格韦（伊洪约的村子）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一次会议。威尔神父回忆说：“他们接到警告，那里可能会发生麻烦，于是他们带了几个警察随身陪同。果然，一群拥护

伊洪约的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大部分人携带棍棒。还有一小群来自布蒂阿马和布亨巴的人，他们是支持爱德华·万扎吉的。英国专员看出这群人怀有敌意——他们在挥舞着棍棒——于是他要伊洪约讲：‘我要等到你们都把棍棒放在桌子前面之后才开会。’但是，伊洪约却用专员听不懂的桑纳基语说：‘让我们动手！’于是他们就进攻了。

“警察朝天开枪，但是并没有制止住他们。专员和他的随行人员设法登上他们的汽车走了。万扎吉挨了一顿痛打。专员从木索马打电报给驻在姆万扎的警察机动部队，而副专员和爱德华整夜协助警察围捕布塞格韦的领导人。大约有一百人后来被判了罪，伊洪约本人则死于狱中。令人吃惊的是，竟有许多领导人死于狱中。他们实在不能忍受监禁的折磨。”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在朱利叶斯·尼雷尔在爱丁堡大学读了三年并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到桑纳基的两天之前。朱利叶斯在归途中，在达累斯萨拉姆逗留了几天。然后他坐了三十六小时的火车到姆万扎。当他在姆万扎等待乘维多利亚湖的汽轮去木索马的时候，暴动发生了。尼雷尔回忆说：“这完全是一个部族冲突事件。它发生在星期五，而我是星期天到达的。我的哥哥和我们的朋友到轮船上来接我的时候，他们都缚着绷带。就这样，酋长

被废黜了。在此之前，我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选出来的酋长。我们不能要这个求雨巫师废物。这是我第一次从事选举运动，我们就有了第一个选出来的酋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酋长。”伊洪约是不是由于贪污而被黜的呢？尼雷尔流露出桑纳基年轻改革家的热情，断然地说：“这是由于他无能。他既无能，又贪污。”

这样，爱德华·万扎吉在一九五二年成了桑纳基的酋长。他的这个职位一直保持到坦噶尼喀宣告独立的几个月之后，那时所有部族酋长都被解除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但是允许他们保留头衔，有些还安排在地方上工作。爱德华酋长当了桑纳基的一名地方官员，并且在此以后继续执行了他的许多旧的杂七杂八的工作，诸如征税，实施开发计划，以及督促顽固的桑纳基族人为进步而工作。

在爱德华·万扎吉以前，桑纳基族人是世代用弓箭从事打猎和作战的。他们把象针一样锋利的箭头，浸在用一种树皮制成的稠粘的黑色毒液里。现在桑纳基族人传统猎食的平原大动物，如羚羊、斑马、角马，正在这一地区濒于绝迹；爱德华酋长鼓励并诱导他的部族人民也要种植经济作物诸如棉花、剑麻和花生之类，而他们原来是一直只种植供自己消费的木薯、小米和玉米的。几年以前，他根据政府

举办的重建家园计划，参加了附近的一项自力更生的水坝建筑工程。爱德华酋长过去从未跨出过东非一步，竟在几年前去中国作了两个星期的旅行，考察那里搞农业的方法。这是当代坦桑尼亚人生活中的一个奇迹。有个朋友说：“爱德华是一个拚命工作的人。他会说，‘每个人都在吃，但没有人在工作，这样我们最后都将挨饿’。有时他感到悲观失望，说：‘我什么事都做不成’。但是他仍然照样不停地工作。他会安排好九点钟开会，但到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出席。”尽管他在桑纳基那样拚命地工作，但是他在赢得布塞格韦村（伊洪约的儿子马尔瓦求雨巫师的家乡）居民的拥护方面很少取得进展。那里的村民还是说：“万扎吉不是我们的酋长，马尔瓦才是。”

因为一九二二年三月朱利叶斯·尼雷尔出生的那天下了倾盆大雨，所以他取名为坎巴雷奇^①，这是历来相传的一个雨神的名字。朱利叶斯这个名字是在他二十岁受天主教洗礼时起的。尼雷尔·布里托六十一岁时，娶了第五个妻子——十五岁的玛加亚。她生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朱利叶斯是老二。这些子女活着的有六个。尼雷尔酋长在去世之前，娶过二十二个妻子，其中大多数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还跟他在一起，并留下了二十六个子女。尼雷尔的

^① 坎巴雷奇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是克(K)。——译者

弟弟约瑟夫说过：“本来还有很多子女，但是不少已经死了。”人们常说，尼雷尔的性格同他的异母长兄爱德华·万扎吉相似。但是，据约瑟夫说：“在我们弟兄中只有一个象朱利叶斯，那就是布里托。他的年龄比朱利叶斯稍为大一些。他们是老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里托是英国陆军的二等兵。他的家族不能确切知道他是在哪里被打死的。约瑟夫认为布里托死在缅甸，而朱利叶斯的印象是他死在非洲某地。

朱利叶斯在山腰上的一排小屋里度过童年，现在那里已成废墟，回到了原始状态。一座水泥的纪念碑，四周围着长长的野草，碑上用桑纳基文字刻着：“已故酋长尼雷尔·布里托，一九一二年起就任，一九四二年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据布里托的儿子和朋友们的绝对肯定的判断，这位老酋长对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性格的形成起了最重要的影响。朱利叶斯的童年伙伴奥斯瓦尔德·马尔瓦^①有次说过：“他的父亲在采取行动之前是非常缓慢、非常审慎的。我们认为这是尼雷尔性格的基础。”爱德华·万扎吉酋长在讲到他的父亲时说：“他总是坚持要给人民以权利。”桑纳基的八个酋长是轮流主持部族法庭的。“但是人们如果知道是别的酋长在主持，就不到

^① 和那个求雨巫师没有关系。

法庭去。而如果他们知道是布里托在主持，那就会在法庭前出现一个长队，因为他们知道从他那里会得到公正的审讯。”

朱利叶斯·尼雷尔特别喜欢回忆他的父亲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偶尔发生的对抗。“要说我能够有点仁慈之心，这是得之于我的父亲。他对传教士们讲，他从不谋求报复。他是德国人统治下的一个酋长。当英国兵从肯尼亚来到木索马的时候，他的仇人试图推翻他。有一个人带领士兵们到我父亲的屋里，几乎把我父亲打死。几年后，有个人在深夜溜进我父亲的帐篷要求避难，他就是带兵打我父亲的仇人。这个人犯了一项罪行，英国人正在追捕他。而县专员离他只有几码远！但是老人给他东西吃，把他藏起来，第二天早上又把他从帐篷送到几英里之外，然后说声‘克瓦海里’——再会。

“要说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他就是一个。”朱利叶斯带着轻快的心情说：“他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妻子和孩子就是罪恶。”

同他家庭熟悉的朋友有时说，朱利叶斯的母亲玛加亚是他父亲的宠妻。尼雷尔谨慎地说：“不，她离宠妻的地位不远。但是，不，那不是事实。她是父亲比较喜爱的妻子中间的一个。最近死去的一个显然才是他的宠妻，而我母亲也许轮到第二。

“妇女们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承认这件事。大家都承认正妻的地位，也承认宠妻的地位。嗯，当然会有磨擦。他是一个家长。不容易向来自一夫一妻制社会的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认为女人的妒忌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一个部族社会中，妇女们安于她们的地位。在我自己的部族中，争风吃醋是一种可耻的事情。如果说一个妻子怀有妒忌心，说她不願意她的丈夫有一个大家庭和许多孩子，这样说是莫大的侮辱之一。这好比说她支配她的丈夫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

在某些部族中，每个妻子习惯于带着食物进奉，在尝味之后退出去。“在我们部族中，妻子们送来食物，丈夫收下来后慢慢拣着吃。有时丈夫会同孩子们和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一起吃，而其他的妻子则另外在一起吃。她们知道他喜爱某一个妻子的食物，因为她烹调得很好。最使她们难堪的是带来的食物遭到拒绝。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

尼雷尔的父亲尽管是一个酋长，他的月薪却只有六十先令，因此他的家庭是很拮据的。尼雷尔最辛酸的回忆之一，是他母亲不断地想方设法修补他曾在里面长大的那间土房的屋顶。这所土房在下雨的夜晚常常漏雨。在后来的岁月里，呼吁要有好屋顶的好住房成了他的政治口头禅之一。他还常说：

“至少，我们经常有牛奶喝。”

他的童年完完全全是部族式的。他按照桑纳基的风俗把牙齿锉平。他在十二岁以前难得看到一个“欧洲人”或一个“亚洲人”，这是东非人对白种人和印度人的称呼。桑纳基族人有时仍然同他们毗邻的部族打仗，特别是同马萨伊族人打仗。用弓箭防御自己的桑纳基族人，几乎不是手执长矛的马萨伊族人的对手。但是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报仇的方法。一个部族成员献策说：“当他们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上空射箭，这样马萨伊族人为了保护脑袋就会高举盾牌。第二步，我们就射他们身体的下部。”这种战术证明有很大的杀伤效果。

威尔神父说：“朱利叶斯老是讲起一件事，有次，当恩古鲁米族人进攻桑纳基族人的时候，恩古鲁米族人用赭石把自己的身体涂红，手执长矛，伪装成马萨伊族人的模样。桑纳基族人被吓得逃跑了。但是后来恩古鲁米族人犯了过于夸耀的错误，于是桑纳基族人带着憎恶的口吻说：‘哦，原来不过是恩古鲁米族人，’然后把他们打败了。”

尼雷尔说过：“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打猎被认为是非法的。可是，我们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猎。有一次，我和大人们一起到现在的塞仑格提国家公园那里去打猎。一个和我

同年的男孩子和我，以及另外一两个孩子留在篷帐里看守猎获的兽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辆汽车向我们驶来。我想：‘这一定是来监视打猎的人！这下我们完了！’于是我们就冲出篷帐。原来却是一个金矿工人，他也是来偷猎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时我肯定有十一岁左右了。正如我告诉过你的那样，一个十一岁的部族孩子比一个同年的城市男孩子要成熟得多。但他毕竟只有十一岁。可是，另一个男孩和我两人走进了灌木林。然后我们开始走向回篷帐。部族的少年是很善于识别方向的，比童子军要强得多。忽然，我们听到了叫唤我名字的声音：‘坎巴雷奇，坎巴雷奇’。这个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我开口的时候，那个男孩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别回答！你的父亲是个酋长。你不知道这个人喊你，是不是要杀你。在我们没有弄清楚他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以前，让我们悄悄地走吧。’”于是，他们匍匐着走，直到他们认清那个人是朱利叶斯父亲的一个朋友。尼雷尔说：“你想想看，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

朱利叶斯十二岁时，被送到二十六英里外的木索马上学。尼雷尔曾说，“这确实是我的哥哥爱德华负责的。伊洪约自己说我应当去。有一种叫做‘宝’的班图族的游戏，我认为这是一种巧妙的游戏，部族

中最好的游戏。哎呀，伊洪约对这种游戏玩得可擅长啦。我的父亲也玩得很好，但是不及伊洪约。我的父、母亲之所以相处得那么好，原因之一就是在他的许多妻子中间，她是唯一会玩这种‘宝’的。我对这种游戏也玩得很好。好，有一次伊洪约到我家里来。我同他玩这种游戏，想不到赢了他。不过他很清楚，我是有点头脑的人。他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应该送他上学。’但是我父亲已经送大儿子和二儿子上学，他看不出再送孩子上学会有多大好处。问题是：他应当挑选谁去和留下谁。

“可是，爱德华娶了邻近一个酋长的女儿。她同我相处得很好。我还小，为我的嫂子所钟爱。因此，当爱德华从他为另一个酋长工作的地点——伊科马回家的时候，他待我也很好，比待其余的弟弟都好。后来他收养了他妻子的姊姊的儿子，名叫万布拉·万扎吉，和我同年。这个孩子已学过读和写。他打算教我，但不行，他讲的是斯瓦希利语，而我讲的是纯粹的部族语言。有一天，县专员来了，见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很聪明，不怕欧洲人。因此专员指示我哥哥送这个孩子上学。我哥哥去见我父亲说：‘我建议你也把坎巴雷奇送去。’于是我真的被选定去陪伴这个孩子。我非常高兴。没有耽搁，第二天就动身了。”后来万布拉·万扎吉的遭遇怎样？“他失

踪了，抛弃了他的妻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朱利叶斯出外上学后不久，他的老父买了一个妻子给他。这样保证了一旦酋长死后，朱利叶斯仍然能够结婚。按照桑纳基的制度，他可能得不到牛群和其他遗产，但是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新娘。“我父亲的前头的四个儿子中，两个已结婚，老三随时都能结婚，而我是老四。因此我是唯一没有作好婚事准备的。而我父亲担心自己的健康。除此以外，我母亲还有三个女儿，而我是我母亲的长子。按照部族的规定，母亲的女儿的新娘聘金，应该分给她的儿子。”否则，这笔款子象酋长的其他财产一样，会落到他的兄弟或侄子手里。尼雷尔曾说：“我会被一个侄子或叔父所收养，这样一个被收养的人要过很长时间才能结婚。他会被搁在一边。供养他的人将首先给自己的儿子娶新娘。”后来，尼雷尔并没有同他父亲为他买来的姑娘结婚。几年以后，当他同玛丽亚·加布里埃尔订婚的时候，他牺牲了他对他的童年媳妇的权利。

尼雷尔从爱丁堡回国的那一年，有一天，尼雷尔和威尔神父一同乘车前往爱德华的“香巴”^①途中，尼雷尔向路上的一个妇女大声叫喊起来。随后，他笑着向威尔神父解释道：“她是我的妻子，是我父亲用母牛买来的。”

^① 意即庄园。——译者

第四章

好多年后，尼雷尔回忆在木索马的姆维森盖学校初期的情况时说：“那里没有足够的东西好学习。”他十二岁起开始学斯瓦希利语，十五岁起学英语。他在一九三六年的地区考试中名列第一，升入塔波拉公立学校。尼雷尔有次解释说：“英国人打算设立一所公立学校。它当然不是为公众的。塔波拉公立学校本来是为酋长们的儿子设立的。这是非洲力求仿效伊顿^①——新同学要服侍老同学、爱好运动、绅士风度等一切——的一所学校。如果你能读完六年毕业，确实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当我在木索马应考的时候（那是为了升入五年级的四年级考试），那时的大湖省只有两所五年级学校。一所在姆万扎，但那是条死胡同。如果你到那里去，你就会陷在那里。另一所五年级学校在塔波拉，可以升到十年级。这不是条死胡同。”

^① 即伊顿公学，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译者

尼雷尔接受天主教徒的教育，开始于木索马，并继续在塔波拉进行。尼雷尔曾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至少是由于人事的关系。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部族孩子。但是在木索马，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就对那些愿意接受给孩子们给予宗教教育。这是很好的办法，我们现在仍然保留着。再者，有个毗邻酋长的儿子是我的朋友，他说：‘你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去听讲呢？’因此我去了。但是我常常对这种特殊教育向他提出异议。我告诉他我不能相信这个有胡子的人，我觉得我们只应当崇拜我们所知道的神。”

“但是我直到几年之后才受洗礼。教会中人认为我可能继承我的父亲担任酋长——那是最不可能的。”很明显，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一个酋长（至少不是一个一夫多妻的酋长），又是一个基督徒。因此，洗礼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尼雷尔的父亲去世后才举行。那时他才取了朱利叶斯这个名字。“当你接受洗礼时，你必须取一个非部族的名字。那是很蠢的。后来我经过研究，发现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圣徒的名字。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凡是圣徒都是有德行的，不过那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圣徒的名字。”

尼雷尔在塔波拉的同学回忆起，他是一个有志气和力求上进的孩子。就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的身

材瘦小，但体格却是强壮的。一个同班同学说：“他如果不是第一个做完作业，就会感到很不愉快。”尼雷尔自认为在塔波拉的六年中是一个反抗者。他确实是一个革新家。他对给予班长特权一事深为不满。“我受的最大的耻辱之一，是试图为我同房间的一个孩子辩护。我认为班长缚住这个孩子的双手就是虐待他。我反对这件事。我就去找校长说，这是不正当的。于是校长要我去把他们找来。班长作了解释，那个孩子也作了解释。校长偏袒了班长，也就是偏袒了那种制度。班长是不会错的。这个孩子受到了杖责四下的惩罚，并且强迫我去执行。我用棍子打了他，不过我是不太起劲的。

“我从此和班长有了疙瘩。他们决定，让我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使我也当班长。但我从未当过班长。教师们推荐我，但被校长所否决。他觉得我的心肠太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同班同学伊曼纽尔·基比拉回忆说：“我们常常谈起许多家乡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中间来自布科巴的同学告诉尼雷尔，布科巴有八个酋长。尼雷尔说，你们是幸运的。布科巴很大。有八个酋长很好。可是，我们这个小部族，论规模只需要一个酋长，却也拥有八个酋长。这就太多了。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有一次，尼雷尔所创办的辩论俱乐部举行

了一次关于新娘代价问题的讨论会。基比拉说：“尼雷尔是不赞成的，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妻子，是他父亲‘买来’的。”

一九四三年，尼雷尔在塔波拉读完了十年级后，进入乌干达的麦克勒里学院。由于进麦克勒里的学生大都是读完十二年级的，因此塔波拉的毕业生通常在开头有一段困难的时间。尼雷尔说：“塔波拉的生物学是很好的，因此我们在麦克勒里可以同任何一个同学比生物学。我很喜欢这门功课。我对英语也可以。但是我的真正兴趣恰恰不在政治方面，而在概念、思维等哲学课题方面。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论代议制政体和论妇女受压迫一类文章，给我以极大影响。我两次参加东非的写作比赛，都得到了一等奖。我在第二次写了论妇女受压迫的文章，把穆勒的思想应用到部族社会。”尼雷尔同朋友们组织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学校分会。该协会作为非洲人公务员的一个社交团体，在一九二九年建立于达累斯萨拉姆。但是尼雷尔已经注意到欧洲人在东非享受的特殊权利。他利用这个学校分会作为探讨政治问题的场所。一九四五年，他毕业于麦克勒里学院，获得教育学毕业证书。他用那年夏天的时间在桑纳基为他母亲建造了一所房屋。她在她的丈夫尼雷尔酋长于三年前去世以后，一直同一位舅父住在一起。

那年，尼雷尔接到两份教书的聘书。一份是塔波拉公立学校的；另一份是一个新办的天主教中学圣玛利亚学院的，这个中学也设在塔波拉。圣玛利亚的第一任院长理查德·沃尔什神父回忆说，公立学校校长当时对他讲：“你不会得到尼雷尔。他正在直接来到塔波拉。”几年以后沃尔什神父说：“这样，我们用了五个先令来打赌。”尼雷尔在他的朋友安德鲁·蒂班代巴盖（他已经在圣玛利亚教书）的怂恿下，接受了沃尔什神父的邀请。在沃尔什神父的记忆中，当时政府曾书面通知尼雷尔说：“在一个教会学校里，你不会得到同样的薪金和养老金，而且如果你以后转到公立学校，那末你在教会学校的年资不能列入你的养老金年资权利之内。”尼雷尔被激怒了，回答说：“如果我曾经有过犹豫的话，你们的来信促使我作出了决定。教会学校的教师为坦噶尼喀所作的贡献，同公立学校的教师一样多。”

尼雷尔在圣玛利亚学院教授生物学和历史。他的月薪是六镑五先令。他在业余时间帮助组织了一家合作商店，目的在于打破印度商人在塔波拉的垄断地位。但是这家商店经营得不好，几年后就关门了。晚上，他教市民学英语。他同蒂班代巴盖合住一幢房子。在夜里，他同一群朋友，包括哈朗·卢古沙酋长在内，无休无止地谈论坦噶尼喀的事情。约

瑟夫·尼雷尔是由他的哥哥带到塔波拉上学的，当时是十二岁。他回忆说：“我经常听到他们谈论政治问题。他们一谈就是几小时，有时一直谈到清晨四点钟。”

尼雷尔是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地方分会的书记，所以是一个有影响的青年人。政府要求他担任物价检查员。“那是在战后，商品供应不足。政府为了稳定物价，设立了一个物价管制部门。我经常走遍商店去检查；不是检查讨价过高，因为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他们，而是检查他们是否把价格合适地标出来。我的工作是把这方面的情况报告当局。但是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但是你将一事无成。’事实上，我把一项违法事件报告后，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这样，我就失去了兴趣。”那时正在访问尼雷尔的一个朋友奥斯瓦德·马尔瓦补充说：“他抓到了一个商人，但是这个案件却被政府一笔勾销。他生气得把他的制服退了回去，并说：‘如果正义不能伸张，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通过非洲人协会，尼雷尔开始对坦噶尼喀的政治发生了兴趣。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去达累斯萨拉姆第一次参加协会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部制定的一项为东非建立一个中央议会的建议。坦噶尼喀的非洲人担心这一步骤会

导致建立一个由肯尼亚的白人移民所统治的东非联邦。

后来成为尼雷尔的副手的拉希迪·卡瓦瓦，在一九四八年进入塔波拉公立学校，不久就初次见到了尼雷尔。卡瓦瓦说：“他到我们学校来参加一次辩论会。那是塔波拉和圣玛利亚两所中学之间的一场比赛。他非常有说服力，使我们全信服了，我们都站到了他的一边。辩论的题目是‘财富胜于教育’。他当然是反对这个命题的。他说：‘我选择教书的职业是为了使人民懂得道理，而一旦你懂得了道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不是因为你富有；你可以是一个富有的人，但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那天我没有同他对阵。我才十八岁。”

有好几年尼雷尔想到国外继续深造，但是由于他的母亲和弟弟们需要照应，他就不大愿意离开坦噶尼喀。同时他也是一些微妙的政治压迫的受害者。据奥斯瓦德·马尔瓦说，有个英国地方官员曾写信给总督，建议不要让尼雷尔到国外留学，因为他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回国后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一九四九年，尼雷尔的朋友沃尔什神父帮他搞到了一笔政府奖学金，并从圣玛利亚学院得到了一笔补助，以维持尼雷尔的家庭和未婚妻的生活。尼雷尔在几个月之前，同玛利亚·加布里埃尔正式订了婚。他是

在木索马同她相识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到了伦敦。有一次他回忆说：“有种想法认为我应当在生物学方面取得一个学位。我爱好生物学，而且我的圣玛利亚学院的学生们也学得很好。这是我考得最好的一门课，但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于是，我同殖民部商榷。他们很客气地让我如愿以偿。在爱丁堡大学，我的学位是历史和经济学；我最好的功课是哲学。我阅读了很多书。我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我的政治思想完全形成了。这是我本身的演变，但这是完整的演变。”

在一篇题为《东非的种族问题》^①的论文中，尼雷尔当时写道：“在今天的东非，伪善现象实在太多了。欧洲人官员和欧洲人移民主要依靠伪善来进行统治和维持他们的威信。他们的内心动机简直是经不起检验的。印度商人的谋生靠的是赤裸裸的欺骗，说得再好也不过是纯粹的狡猾，这也是伪善行径。非洲人店员和工人对履行合同中他们一方的义务往往满不在乎，甚至一个很有教养的非洲人会假装爱欧洲人，而他内心的妒忌和仇恨却几乎到了爆炸的程度。”尼雷尔回想起一件事情：在一次会上，一个东非

^① 若干年后发表在他的《自由与统一》一书中。

移民说宁愿和猪一起吃饭，也不愿和非洲人一起吃饭，一个英国部长听后随即退出会场。尼雷尔继续写道：“这个移民所讲的话，在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的白人社会中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幸；但是这个英国部长却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了他认为唯一能够做的事情，而到处受到了谴责。

“这种仇视的表现不是单方面的。我的一个非洲朋友有一次把东非的欧洲人说成‘姆布瓦哈瓦’——‘这些畜生’。就我个人来说，我欢迎这种感情的迸发，它向我们显示出病症的严重，就象一锅沸水散发出的汽泡那样……

“非洲人忍受侮辱的度量确实不是无限的……〔非洲人〕不能永远忍受侮辱。应当很好地记住，有人起来鼓动他们的日子是会到来的。煽动一个受侮辱的民族是多么容易啊！当我想到这一可怕的可能性时，真会不寒而栗，但是如果我们的白人邻居一定要坚持‘欧洲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卑劣说教的话，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人民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忍受侮辱的日子将会到来……我但愿这样的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是这个答案操在欧洲人的手里。只有欧洲人希望这个日子永远不会到来，这个日子才不会到来……非洲是属于非洲人的，其他种族不能超过受人尊重的少数种

族的地位……如果终于要在占少数的白人或印度人来永远统治或把这个少数驱逐出东非这两者之间作出严酷选择的话，每一个有头脑的非洲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很明显，尼雷尔在爱丁堡很少同他的朋友们讨论政治问题。他显然喜欢英国人。他经常提到，比起东非的英国殖民者来，他们工作得多么努力啊。他住在英国对外协会的宿舍里。他常常在晚上和周末去拜访一个叫做沃尔特·威尔逊的朋友和威尔逊的母亲。她是一个寡妇，丈夫曾经在比属刚果和安哥拉做过行医的教士。威尔逊夫人回忆起尼雷尔很喜欢《苏格兰人报》上的纵横字谜游戏，爱玩乌拉圭的纸牌和“勒克齐康”^①。她说：“英语只是他的第三种语言，但是他似乎总是要精通它。”九年后，尼雷尔邀请她参加坦噶尼喀的独立庆典。

尼雷尔曾说：“我有三年的时间在思考。我不再采取发牢骚的做法，并打算从根本上解决殖民主义问题。”现在，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他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确立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工作的思想。“不。这个思想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形成的。这不是突然的灵感，我不是突然看到光明的。这不象基督徒自个喊叫的：‘我被召唤了’。在爱丁堡，我决定要回国把自己

^① 原意是“辞典”，这里指一种语言游戏。——译者

的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我下定决心：我的一生将是政治的一生。我离开本国已有三年。现在我打算在完全投身政治之前，先以三年时间来观察自己的国家。这样我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非常清楚：必须有一个争取独立的政治方针。

“一九五三年，科林·利格姆和我到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家旅馆（我不愿提它的名字）去。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要啤酒。正当我要喝的时候，经理奔了过来，说：‘多可怕！非洲人是不许在这里喝酒的。’我非常生气！但是我很明白：再去讲什么让我们进入旅馆那将是愚蠢的。问题全然不在这里。这是殖民主义的后果。他们拒绝供应啤酒给我。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很多的非洲人关心是否会在旅馆中受到接待。这只是那些希望被殖民地的游乐场所接纳的少数人的问题。荒谬！我们必须把殖民主义问题同象我这类人希望被殖民地主子接纳的问题区分开来。难道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取得一张能够喝到欧洲人啤酒的许可证吗？难道这是我们事业的顶点吗？这样看待问题是可笑的。”

一九五二年十月，尼雷尔乘飞机回到坦噶尼喀。他在达累斯萨拉姆着陆，同未婚妻玛丽亚重新团聚，然后乘火车前往姆万扎，再乘维多利亚湖汽轮到木索马。他在那里受到家人的迎接，其中包括缚着绷

带的哥哥爱德华。然后他们一同前往桑纳基。尼雷尔的朋友奥斯瓦德·马尔瓦回忆说：“我们着手为朱利叶斯和玛丽亚造一所房子。而当他动手做土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笑起来并问道：‘他为什么要干这种活？’他说：‘我外出是去受教育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劳动。’于是我们盖上了茅草的屋顶。”

尼雷尔待在爱丁堡的那几年中，玛丽亚在乌干达的一所学校里修习了家政学的课程，后来在莫希的一所路德教派的学校里教书。随后，在沃尔什神父的劝告下，她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圣约瑟夫女修道院学习英语，因为沃尔什神父觉得她应当受到更多的教育，以便成为尼雷尔合适的伴侣。朋友们回忆起当尼雷尔从英国回国时，玛丽亚拒绝到达累斯萨拉姆的机场去接他。她说：“追求男子不符合女子的身份。”她还坚持不应当马上举行婚礼。据说她曾经告诉他：“让我们等一下。我希望更多地了解你。我在你离开之前是了解你的，不过我希望看一看你有没有变。”尼雷尔对他的朋友说：“因此，我必须首先建造我们的房子。我必须脱下爱丁堡服装和皮鞋，光着脚板搅拌沙子和水泥。直到房子盖好，我才赢得了她的尊敬。”他们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木索马的教堂结了婚，不久就回到了达累斯萨拉姆。

尼雷尔已经接受聘请在圣弗朗西斯学院教历史。学校位于离达累斯萨拉姆十二英里的普古。最初，他的年薪是三百英镑。他说：“但是经过了一阵咕哝之后，他们加到四百五十镑。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欧洲移民，这只相当于其收入的五分之三。但是我也知道，这已经超过了我在英国从事同样工作所能得到的数目。这不是坦噶尼喀所能负担得起的。而且还要外加百分之三十的‘生活费’津贴！薪水是太高了。这是殖民地政府的罪恶之一。”

不到三个月，尼雷尔当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他说：“这个协会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使它恢复活动。”大多数关于新非洲问题的观察家过去认为，坦噶尼喀的政治觉醒比加纳或尼日利亚或甚至肯尼亚还要迟。在肯尼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爆发了茅茅起义。但是自从一九五四年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以后，那里独立运动的发展速度就不同了。坦盟迅速发展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坦噶尼喀社会的协调一致和稳定。十九世纪的奴隶贸易引起了人口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沿着主要的贸易路线（从沿海的巴加莫约到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的重新定居。斯瓦希利语原来是东非沿海居民的一种语言，沿着贸易路线传到了内地。在德属东非时代，殖民地政府供养了一支受过良好

训练的非洲人公务员队伍，并在全境内对它的雇员进行调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的和近代的)，坦噶尼喀在准备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比起它的许多邻邦来具有三个明显的有利条件。它有为数众多的部族。一共有二百二十六个，其中没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这样就避免了两三个势均力敌的大部族之间的冲突。由于英国人偏重直辖殖民地肯尼亚，而对它托管的坦噶尼喀有所忽视，因此在坦噶尼喀，只有为数不多的白人移民抵制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且它还有斯瓦希利语，这是一种真正的混合语。尼雷尔常常回想到在他为争取独立而在国内各地进行巡回演说的七年中，只有两次他没有能够直接向人民讲话。

一九二九年，很有名望的英国总督唐纳德·卡梅伦爵士建立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作为非洲人公务员的一个社交组织。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该协会的几个较强的分会，包括尼雷尔协助组织的麦克勒里学院分会在内，开始探讨政治问题，或至少是谈论对政府工作的不满。一九四五年，由于很多会员调出首都，协会的领导人考虑将这个组织的总部从达累斯萨拉姆迁往内地的多多马。帕特里克·库南比酋长有一次讲到：“如果你善于讲话，而又讲得太多，英国人就会把你调到一个小地方去。因此那

时有不少会员集中在多多马。”在早期，会员们即使谈到独立问题的话，也是谈得极少的。有个会员说过：“不是谈论独立，而是谈论平等。”一九五三年尼雷尔来到达累斯萨拉姆时，协会再次成了跟社交团体差不多的一个组织。苏库马族的戴维·马克瓦伊阿酋长说：“在尼雷尔看来，一个只是为欢送即将离职回国的每一个欧洲人官员而举行茶会的组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不符合他的心意。他想，‘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组织呢？’”

尼雷尔这个初到达累斯萨拉姆的人，又是来自内地一个小部族的成员，不知怎地竟会很快取得了该协会的领导权。协会的一个老会员阿巴斯·西凯斯说：“他是这个托管地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他来得正是时候。通常，一个人到国外上大学，回来时就不会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而且会变得非常世故。但是这里有一个受过同样教育的人，却愿意同本国人民在一起。‘我愿为您服务’的这种谦逊态度，使人人都忘记了他是从内地来的，也忘记了他不是一个穆斯林。”总的来说，在坦噶尼喀，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乎一样多，但是沿海岸地区是穆斯林集中的地方。

总督爱德华·特文宁爵士所宠爱的非洲政客是戴维·马克瓦伊阿酋长；而正如科林·利格姆所说的，在特文宁的眼里，尼雷尔很快变成了“坏黑人，因

为不愿加入特文宁的一伙。”早在一九四七年，马克瓦伊阿就同尼雷尔和协会的其他年轻知识分子发生了冲突。尼雷尔后来把马克瓦伊阿叫作“我们的哈姆雷特”^①，因为在尼雷尔看来，马克瓦伊阿在是否加入民族主义者行列的问题上从来没能下定决心。阿巴斯·西凯斯说：“马克瓦伊阿是一个受过白人教育的黑人。但他太自负。他从内地乘火车来到这里，就直接前往立法会议〔殖民地政府的议会机构〕，而在会期过后，他又会直接回到他的欣扬加的家。我们去看他时，他把我们撇在一边。他会说：‘我现在该去赴首席法官的宴会了，’从而避开我们。在一次讨论中他说：‘瞧，你们这些孩子！如果你们想让别人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这帮人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好象他不属于非洲人似的。”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受过同样教育而完全两样的人，他置身于下层，同人民讨论日常的事情。”后来当尼雷尔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迫辞去教师工作的时候，朋友们对他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西凯斯说：“他表示准备作出牺牲。我们说：‘这个人是在来拯救我们的。’”此外，尼雷尔作为一个教会学校的教师，较少地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协会

^① 莎士比亚同名剧本中的主角，具有优柔寡断的性格。——译者

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都是公务员。同时，他无疑是坦噶尼喀的最好的演说家。

一个大部族的前酋长说过：“他来自一个无足轻重的部族，这个事实使他同大部族很少有关系，因此，没有一个大集团自动地同他对抗。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这个领导人平易近人，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使别人接受他和他的思想。”他的领导地位不是建立在许愿的基础之上，正如帕特里克·库南比酋长所说的：“因为朱利叶斯实际上从未对任何事情作过许愿。”但是他很快改造了这个组织。阿巴斯·西凯斯的已故兄弟阿布杜尔有次说：“殖民主义者以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公平交易。但是尼雷尔却使我们考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独立。”抱着这样一个目标，尼雷尔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把协会改组成为一个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从此以后，这个日子就成为所谓“萨巴萨巴”（即第七个月的第七天）纪念日。三十二岁的尼雷尔被一致推选为坦盟主席。

尼雷尔最早的同事中间有克莱斯特·西凯斯的三个儿子。克莱斯特本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德国信号兵下士，学过打字、速记和会计，后来成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用他儿子阿巴斯的话来说，他是“这里两三个收入最高的非洲

人之一”。别的早期坦盟成员还有多萨·阿齐兹和约翰·卢皮阿。后者比尼雷尔大十八岁，是这块领地上的第一批非洲人企业家之一。“姆泽埃”^①约翰当过政府的办事员和收税员，随后他买了一辆运货汽车，成为建筑材料的运输商。坦盟成立的时候，他是坦噶尼喀最走运的非洲人。他象任何一个西方资本家一样，滔滔不绝地大谈努力工作的好处。他说：“我希望他们都努力工作。时间就是金钱！只要人们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在世界上做出大事业。”他是坦盟的第一任司库，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没有钱。我们的口袋就是钱库。”在开始的时候，“姆泽埃”约翰本人实际上就是钱库。当尼雷尔和坦盟的组织者们早上出去开始进行政治活动时，卢皮阿总要问他们：“你们有力量吗？”于是他把手伸进口袋，把钱掏出来。

同一年，总督决定任命尼雷尔填补立法会议的一个临时空缺，以便让他得到一点议会经验。常任议员戴维·马克瓦伊阿被派往伦敦的土地和人口问题皇家委员会工作。尼雷尔的弟弟约瑟夫（他同朱利叶斯和玛丽亚在普古住在一起）回忆说：“朱利叶斯对待这项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既要把全部时间花在教书上，又要全力以赴地搞政治活动，他有时要步行十二英里到达累斯萨拉姆参加晚上的会议。”他在立

^① 意即长者。——译者

法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谈的是需要更多学校的问题。他对会议的主席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仍将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学龄儿童被排斥在学校的门外。先生，我并不认为对此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心安理得。”当肯尼亚由于“茅茅运动”而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尼雷尔使会议确信：“我坚信每一个非洲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国家和平，因为只有通过和平，他才能得到他所向往的东西，事物才会有发展。”但是，如果认为尼雷尔在原则上不赞成“茅茅运动”，那就错了。他有一次对沃尔什神父说：“你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曾在非洲人的心里燃烧过。现在你们却倒退到要把非洲人拉回教堂。你们没有从根本上把他们发动起来。你们象政府一样：你们认为我们是没有理想的人民，活着只是为填饱肚子。但是看看那里的“茅茅运动”吧！他们正在为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作出牺牲。英国人以为只要建造一些公路和学校，就可以争取我们。但光是这些东西是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几个月后，当尼雷尔让大家知道，他打算反对一项关于提高公务人员薪金的政府建议时，他在立法会议的职务突然终止了。还在辩论开始之前，马克瓦伊阿就匆匆从伦敦赶回，这样尼雷尔就当然地失去了席位。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个联合国的四人代表团访

问了坦噶尼喀，后来发表了一个报告，建议给坦噶尼喀托管地拟定一张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取得独立的时间表。托管地当局被代表团、特别是被一名美国成员梅森·西尔斯的亲非洲观点所激怒。几个月后，坦盟决定派尼雷尔前往纽约，就独立问题向联合国托管委员会陈述意见。特文宁作出的反应是派遣一个三人代表团去支持政府的立场。他还力促沃尔什神父（他那时已迁到达累斯萨拉姆）不准尼雷尔向学校请假，暗示尼雷尔的政治活动已濒临扰乱治安的边缘。沃尔什拒绝了他的意见，并质问说：“如果是扰乱治安的话，那为什么不把尼雷尔关进监狱？”

美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把尼雷尔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以联合国总部为中心、周围八个街区为半径的范围内，并把他的停留时间限制在出席托管委员会的二十四小时内。从他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向托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呼吁来看，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认为是愚蠢的。尼雷尔代表他的党说，他要驳斥“这样的荒谬论断……所谓托管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反对报告中的主要政治建议的”，即坦噶尼喀应当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获得独立。“如果托管委员会和行政当局都明确地声明，尽管坦噶尼喀有着多种族的居民，但它未来的政府应当主要是非洲人的政府，则这个声明将使我国人

民感到满意。一旦我们得到这种保证，其余的一切都将是细节问题。”

尼雷尔为筹措出席联合国托管委员会之行的旅费曾经遇到困难。他说：“我几乎去不成。”但是“姆泽埃”约翰捐助了五千先令，其他朋友也凑了五千多先令。卢皮阿回忆说，尼雷尔在启程的前一个晚上，住在达累斯萨拉姆他的家里。第二天早上，大家都紧张到记不起尼雷尔的手提箱究竟放在什么地方。大家找遍了屋子以后，终于在汽车里找到了手提箱，原来是尼雷尔隔夜放在那里的。他们急急忙忙赶到机场，尼雷尔差一点没搭上班机。

沃尔什神父为尼雷尔的纽约之行扫清了道路，并在他启程前对他说：“我认为你已经走到了路程的终点；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放弃教书工作。”圣弗朗西斯学院院长远不如沃尔什神父那样表示同情。他在尼雷尔走后对玛丽亚说：“你的丈夫使我们学校受到政府的威胁。他最好能决定一下，究竟希望当一个教师呢还是当一个政治家。”一年前，政府已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坦盟。在一九五五年尼雷尔前往纽约的时候，总督明白告诉天主教神父们，他认为他们雇用的任何一个教师都不应从事政治鼓动工作。特文宁六十八岁时死于英国。在他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六六年，在解释他的行动时说：“尼雷尔是领取政府薪

金的人。我说：‘我们不会容许公务员这样做。尼雷尔必须在政治领袖和由政府付给薪金的教师之间作出选择。我不能让一个即使是间接领取政府薪金的人去作一个政治领袖。’”

尼雷尔一回国就辞去教师职务，部分原因是他不愿使传教士们为难。他说：“那时我已经明白，继续教书无论如何是荒唐的。我从联合国回来后确实准备对院长说，我将在六月份去麦克勒里找一个有经验的坦噶尼喀教师来接替我的位子。但就在这以前，院长要我作出选择。”

一九五五年四月，尼雷尔携带家属回到家乡桑纳基，回到他在三年前为玛丽亚建造的房屋。他分别接到一家报馆和一家石油公司要他担任工作的邀请，但都予以回绝了。他说：“我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在木索马，他从马里诺尔神父们那里接到了一个翻译兼私人教师的工作，每月七百个先令。这些神父正筹备在桑纳基建立一个传教团体。威尔神父将领导这个新的传教团体，他说：“我问他(尼雷尔)能否在桑纳基的部族语言方面帮助我一下？就这样他搬到了木索马，同奥斯瓦德·马尔瓦住在一起，每天教我桑纳基语。他翻译了一些教义问答和一本教义问答的牧师手册。他建议把《新约全书》试译成桑纳基语。这不行，到现在还没有一本桑纳基语的译

本。他所翻译的是一本选自福音的读本，供一年中每星期日宣读。哦！他同时教我桑纳基语，从九点到十二点半，从一点到五点。他经常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他却有惊人的智力。我们用斯瓦希利语的自学读本作为学习桑纳基语语法的基础。我以为在斯瓦希利语中动词有七个格，他就说：‘我们的语言有十二个格，斯瓦希利语的这种格同桑纳基语中的这种格是相似的，’云云。我常常对他能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而感到惊奇，因为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离开了部族生活，而且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再回去过。他可能会说：‘我要问我的母亲，’或者要问奥斯瓦德。

“功课完毕之后，我们喝喝茶，谈谈他将要做的事情。他会说：‘取得独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要为独立做好准备。’他最大的忧虑是在独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有次说：‘那些巴干达人（邻邦乌干达中最大的部族王国的成员），我相信如果乌干达团结起来的话，英国人明天就会给他们独立。我将使他们团结起来，以后我就不再管了。’我相信如果另外有人来领导坦噶尼喀的话，朱利叶斯本来是会乐意回到他的书斋生活中去的。他内心想做个学者。他会给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读点书？’有时他会谈到马萨伊族人。他并不赞同英国人使马萨伊族人陷入空想主义的做法。他说马萨伊族人象任何人一样，应该

得到发展。‘他们将会同意的。’他会说：‘讲到我的人民——那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食物支持一天沉重的劳动，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好的食物。’他说，他懂得坦噶尼喀既要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写进宪法，但又要设法保护个人，这是一个大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新的立法会议开会了。在这个新会议中，根据特文宁的多种族“均等”的政策，“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在会议的非官方成员中大体上有相等的代表名额。尽管事实是黑非洲人占坦噶尼喀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但尼雷尔仍然认为这个新方案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但几个月后，当尼雷尔知道特文宁政府建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没收德国人财产而得的某些资金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分配，即把七十一万一千镑用作欧洲人的教育费用，并以同等数目分别用作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教育费用时，他就大为恼火了。尼雷尔在写给立法会议成员的一封信中开炮了，他指责这种分配方法说，从托管地的种族构成（二万二千名欧洲人，八万名亚洲人和八百万名非洲人）来看，是“令人费解的。”他写道：“支持种族平等的人有责任使分配原则的运用不致造成荒谬和不公正的现象。”他说，如果不分种族，把这笔款项全部用于扩充高等教育，那将会好得多。

他偶尔也穿白衬衫、卡其裤，带着手杖主持坦盟的会议。威尔神父回忆说：“他曾在布蒂阿马的一次大会上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乌胡鲁”^①后将把欧洲人和亚洲人赶出去，那是错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帕特尔先生。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威尔神父和孟诺派的教士们。我们尊敬他们，我们需要他们。’”但是，政府一直在密切注意他。某县专员的助理奥斯瓦德·马尔瓦奉命通知尼雷尔，要尼雷尔定期向他汇报。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尼雷尔同马尔瓦住在一起。有一次，驻在木索马的高级官员——省专员，要马尔瓦（他担任当地坦盟的司库）把坦盟的帐册交给他。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只提出了几点簿记上的技术问题。偶尔警察局也向尼雷尔的老友、当时担任木索马学校校长的伊曼纽尔·基比拉打听尼雷尔有多少钱。

威尔神父曾说：“我觉得，朱利叶斯在木索马的那几个月里是有些不安的。这是他重新考虑他的生活的时期。他是一个很崇拜甘地的人，他不希望流血。他完全估计到他迟早会入狱。他在爱德华酋长的村子附近为玛丽亚所盖的房子原来是茅草的屋顶，因此我借给他一笔钱——我想是一千先令——用来换成瓦楞铁皮的屋顶。他担心如果他被监禁，玛

^① 意即获得解放。——译者

丽亚会遇到困难。一个茅草屋顶需要修理。他找了奥斯瓦德（那时正在做各种建筑工作）替他进行修理。可是，我从来没有逼他还债。但他两年后第二次去美国时，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而当他回国后就给了我一张支票，并对过了这么久才归还向我道歉。他说：“神父，我实在从来没有过钱，这笔钱还是我通过上电视得来的。”

他还试图同木索马医院里的贪污现象作斗争。“他知道非洲籍的药剂师强迫人们对他们经手分发的政府药品付钱——即使是今天这种小规模贪污行为也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他叫一个小孩到医院去，并随带一张做上记号的二十先令票据。他还布置一个警官随后马上对药剂师进行检查。可是那个家伙很狡猾，坚持要孩子把票据换成硬币，所以他们没有抓住他。”

若干年后，尼雷尔在回想起这件事时大声说：“是的，我失败了。那个家伙逃脱了。”随后，他朝着身旁的秘书低声说：“要抓住贪污的人并不容易。”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个青年同事奥斯卡·坎博纳从达累斯萨拉姆的坦盟总部前来探望尼雷尔。坎博纳回忆说：“朱利叶斯是在四月间离开我们的，但是一直到八月我们还没有得到他片纸只字。没有一点消息！因此，坦盟中央委员会在八月间要我去看

看他到底怎样了，并带给他三百先令。这样，当我到木索马的时候，我发现他正坐在地板上阅读一本关于甘地的书。我告诉他我们对他的挂念，并给了他三百先令。使我吃惊的是，他把这笔钱交给他的弟弟约瑟夫去买一头母牛，以使用丰盛的筵席招待我！这给我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开始交谈，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集会，并试验一下非暴力的手段。县专员不同意我们召开会议，但是我们说非要举行不可。而在预定开会时间的两小时之前，他们同意了。”

在这次探望期间，两人谈到了坦盟在过去六个月中迅速发展情况。尼雷尔告诉坎博纳，他将在九、十月间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坎博纳离开木索马后，乘湖轮到布科巴，再到姆万扎。在姆万扎，另一个亲密同事保罗·博马尼告诉他说，尼雷尔希望他折回木索马去。但坎博纳又接到达累斯萨拉姆一个电报，告诉他说坦盟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于是他乘火车前往达累斯萨拉姆。坎博纳在若干年后讲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尼雷尔缺席期间，担任坦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卢皮阿激起了中央委员们的愤懑。“约翰经常出口伤人。他会说：‘这是废话！’因此我走访了所有委员，对他们说：‘好吧，你们可以把争执的意见全部记下来，让我们在独立之后再来解决吧！’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从布科巴带来了

钱——一万先令！——同时告诉他们朱利叶斯很快就会回来。于是他们终于忘掉了争执。”

这个怕羞、沉思、富于感情的坎博纳，一九二八年生于坦噶尼喀南部靠近莫桑比克边界的一个偏僻地方。他的部族尼扬扎族人是南非的祖鲁族人的远亲。他们曾向北方迁徙，直到被坦噶尼喀中部的赫赫族所阻遏。奥斯卡的父母都是受过教育的。这跟他的大多数同辈人不同。坎博纳说：“我的祖父是一个酋长。当传教士们要他送一个男孩去受教育时，他只送去一个奴隶。后来，当他看到这个孩子得到好处时，他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去了，这就是我父亲。我父亲后来成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我母亲也上过学，常常同我的祖父争吵。我的祖父希望孙儿们看管牛群。他埋怨学校把我们养得太驯良了。但我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学。她把布克·华盛顿^①的故事读给我们听。她把美国黑人中所有的杰出人物都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那个大酋长是德国人封的。他跟包括我祖父一派在内的各派勾心斗角，统治我们达四十年之久。他利用各派之间的斗争取得平衡。他最怕的人就是我的祖父。我祖父在晚年时也成了英国圣公

^① 美国著名的黑人教育家。——译者

会的牧师。我总认为大酋长鼓励他当牧师不是出于爱护，而是出于害怕。他唆使传教士们把我的祖父调离这一地区。

“我的祖母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她几乎取得了统治地位。当我父亲准备调往另一个岗位的时候，我的祖母会先到那个新的岗位去会见领导人，并为她的儿子的到职作好安排。有时她会出席法院的开庭，有时她会否决法院的诉讼。她是很有权力的人。她有仇人。因此她被人毒死了。是的！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是一个副酋长干的。按照当时的风俗，部族要把他活埋。但是我的父亲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所以这个人只是被撤了职。

坎博纳所讲的关于他求学的经过，好象是一连串无穷无尽的遭受挫折和被人误解的故事。他在用部族语言教课的教会学校里，因为要求使用英语词汇而受到处分。“甚至在七、八年级，我们每星期也只有两节英语课。我要求进一所用英语教课的学校，但我遭到了拒绝，原因是我已经属于部族语学生的‘一流’。主教希望我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由于我是长子，我父亲不同意。于是我只能当一个第二等的教师，一个部族语的教师。”

关于坎博纳终于转到一所用英语教课的学校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既反映了他的求学心

切，又显示了这个年轻人的机智。“我决心要进中学，但他们都拒绝接受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传教士们正在多多马建造一所新学校，他们同意接受我。但是学费很贵，我要付三百先令一年，而我父亲每月收入只有三十五先令，并且全家有六口人。因此我跑到主教那里。我说：‘主教！你瞧！我知道你是可以信任的。如果有个学校可以接纳我入学，你会不会帮助我上学？’他说他当然会，但是他认为没有一所学校会接纳我。于是我把接到的一封联合学校的信给他看！唷！他很生气，他为我祈祷。然后他说，因为他已经作了诺言，他愿意帮助我。他给了我三百先令。”

在多多马逗留两年之后，奥斯卡升入了塔波拉学校。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学校生活中最艰难、显然又是最痛苦的几年。“我有两次几乎被开除。我到塔波拉的第一天，校长布卢默先生就说：‘好，谁是奥斯卡？’他看看我说：‘我希望你在明天早晨之前剪掉你的头发，以后每两星期要理发一次。’他是我所遇到的最专制的校长之一。最初他讨厌我，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在塔波拉，我表现得不是很好。我觉得我的英语女教师是反对我的。她不了解我的英语是较差的。在多多马，我的教师中有三个生了病，因此，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她对我讲了

许多令人难堪的话。我开始对阅读杂志产生强烈的兴趣，而她却认为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太多了。”

坎博纳在塔波拉毕业后，当了多多马学校的教师，并被临时调到邻近的一所师资培训学院。但是，由于他了解到学院当局无意帮助他获得一项去英国或美国的奖学金，他辞职了。

坎博纳回到多多马学校后，和同校的一个教师坎亚马·奇乌梅相识。奇乌梅后来在流亡到坦桑尼亚之前，曾经是邻邦马拉维政府中的一员。关于这两个青年人怎样会对政治发生兴趣，坎博纳讲过这样的故事：“每星期六，我们两人跑到山上的一个岩洞里。奇乌梅站起来向听众讲话，而听众就是我。然后我们停下来进茶点。然后由我向群众发表演说，而我的听众就是奇乌梅。我们还讨论到如何组织一个青年团，如何起草一个团章。

“可是，这是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期间。有一个星期六，主教（就是在几年前送他进学校的那个主教）同县专员和校长一起来到了那个岩洞。不幸，我正在发表演说。奇乌梅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就继续讲：‘英国政府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等等，于是奇乌梅鼓起掌来。主教说：‘让我们祈祷’——为了使我们的仇恨消除。我们参加了祈祷——为了使他们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业。他们发火了，的确发火了；他

们禁止我们继续祷告。所有教师都轮流做了祷告。但主教是很有理解力的。”当他在十二年以后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坎博纳还说：“就在昨天，有人告诉我，他的墓地就在达累斯萨拉姆。这是需要照料的。”

随后，坎博纳放弃了教书生涯，迁居到达累斯萨拉姆。他是在坦盟成立以后不久到达那里的，当上了一个专职的党的组织者。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说：“我运用了许多手法。有时我会搭乘公共汽车，在停车站同人们谈话，然后再跳上公共汽车。有时我会抓住一个部族集团或者一个社会团体的领导人，把他们的成员或朋友全部争取过来。”他最后说，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坦盟的崛起多半是一出独脚戏，“但我们有了十万个盟员！”

第五章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所谓‘准备独立’的说法——就是说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管理他们自己。这好象对一个人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去生活’一样。你怎么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做人’呢？做人的部分内容就是人民应该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既然做了人，又违反我们的意志要受别人的管理，这是互相矛盾的。”

尼雷尔曾说：“我认为我仍然是更多地偏重哲学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我不会处理象种族歧视这类问题。我只是说：‘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是错误的’，而除此之外所有事情仍然维持它们原有的状况。所以他们称我为温和派。我认为我是大大的极端派——我们一定要独立！但是，这种哲学上的说法也许把运动的苦味消除了。我没有说，‘今天有一个人被拒绝供应啤酒，’而只是说，‘我们应当自己管

理自己。’可是从政治上讲，这样讲法不对。在大湖省，殖民地政府说，‘牛养得太多了。’我说，‘我们不能开展运动来反对少养牛，因为将来我们执政时也许要减少养牛的。’在伊林加，一位坦盟成员开展运动来反对浸牛^①。他把浸牛搞得很失人心。我对他很生气！但在政治上，你们当然可以利用一切不满情绪。”

一九五五年十月，尼雷尔从木索马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在以后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独立的六年中，他几乎连续不断地周游坦噶尼喀内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挂着“DSK750”牌子的坦盟“陆上游览者”牌汽车。和坦盟一起活动的一位瑞典传教士巴布罗·约翰森女士曾说：“当他来到布科巴时，他和我同坐坦盟的‘陆上游览者’牌汽车，警察则坐另一辆汽车。我们有个默契，如果我们的车胎爆破，他们就停车来帮助我们；如果他们发生同样事情，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尼雷尔第一次到姆贝亚旅行时，发现警察在准备对付一次暴动似的。尼雷尔惊奇地问他的朋友，“他们准备干什么？”他自己到警察局去，结果获准只能在坦盟成员中召开会议。于是坦盟的人员便到当

① 把牛浸在一个盛有杀灭寄生虫溶液的槽里。

地的一个传道会去借扩音器，但传教士拿不定主意，不知借给他们是否会牵涉到政治。县专员告诉他说，“这由你决定。”曾以一个研究团体身份访问坦噶尼喀的当时工党的联邦事务部助理次官琼·威肯回忆说：“为了安全起见，传教士拒绝了。结果，警察把他们自己的扩音器借给了坦盟的人。然后，出乎我意料之外，警察包括巡官在内，都向尼雷尔行了敬礼。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正在向殖民主义作斗争，不是向白人作斗争。’”

尼雷尔在巡视乌桑巴拉山区时，在倾盆大雨中赶了十八英里路去向金韦里村的人民讲话，但却发觉当地的酋长已经破坏了他的这次访问。全国妇女组织的早期领导人碧碧·蒂蒂·穆罕默德说：“人们没有来欢迎我们。那个酋长是英国人的走狗。他用‘蓬贝’（本地的一种果子酒，用玉米和香蕉酿制）把村民灌醉了。所以我们只好驱车回到科罗格韦过夜。”金韦里村的妇女对于酋长破坏会议特别是把她们的男人灌醉，极为愤怒。她们拒绝烧晚饭。她们说：“我们罢工了。你们为什么不去酋长家吃饭呢？”这样，村民们只好派一个代表团到科罗格韦去，说服了穆罕默德夫人的反对，尼雷尔同意再回去。他对她说，“听着，我们必须有耐心，如果我们被他们赶走，我们也不要太计较。”于是他们又驱车回金韦里村，

穆罕默德夫人后来说，“这一次，‘姆泰米’^①不再捣乱了。”

尼雷尔第一次认识约翰森小姐是在布科巴。当时他的一群随从偶然把她学校的篱笆和花坛踏毁了。她回忆起来，起初尼雷尔对他的突然成名而发牢骚说：“‘我们必须制止唱这种歌颂尼雷尔的歌。’”她告诉他：“你必须为了工作把这件事当作一种牺牲而加以忍受。”翌年，路上挂着大幅旗帜欢迎他。“我对他说，‘当你看到把你的名字写得象一个人那么大时，你有什么想法？’他说，‘请原谅，你说什么？’我把我的问题重复了一遍，他说，‘唉呀，我甚至没有看到这个。’”

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几年中，尼雷尔常常到马里恩（即切沙姆夫人）在伊林加的别墅里休息，她是一位英国农场主的寡妇，出生在美国。切沙姆夫人说：“我们那里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废话。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客人。我只是告知仆人，‘朱利叶斯叔叔要来了。’他在我家里阅读美国宪法。他说：‘哈！他们那时的平均年龄同我们一样——而人们却说我们太年轻了！’”在那一段时期，切沙姆夫人为尼雷尔和他的同事们执行了一件无法估价的工作；她担任他们和

① 坦噶尼喀一些部族对酋长的称呼。——译者

总督特文宁爵士之间的联系人。切沙姆夫人曾说：“因为我是英帝国的一位贵族的孀妇，总督必须来看我。”

坦盟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发展，从一九五五年的十万人发展到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万人。尼雷尔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总督虽然反对坦盟，他还是力求公平地对待它；他偶尔也对破坏当地法令的个别坦盟支部加以处罚，但他从未禁止过整个运动。因此，尼雷尔经常可以不是在这个地区就是在另一地区自由地发表讲话。有一个时期他被禁止向群众集会讲话达数月之久，但是坦盟的会议并未受到影响。

切沙姆夫人曾说：“他第一次在伊林加发表讲话时，听众只有五十人。到一九五八年就有六千人。”几年前一个英国朋友曾把尼雷尔带到伦敦去参加工党会议，那次只有四十名党员象尽义务一样地出席。当他发现尼雷尔一九五七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已吸引了多达三万人来参加自己的会议时，他简直窘住了。玛丽·汉考克小姐是一位矮小的性情暴躁的英国女人，她在一九四〇年到坦噶尼喀来“帮助黑色人民——象我们当时称呼他们的那样，”她回忆说，“呀！那个人啊，他是怎么想的！木索马的公务人员弄不懂，为什么在尼雷尔已宣布要争取‘解放’

以后，我仍然做他的朋友。你知道，我们公务人员必须谨慎小心——我们不能参加政治集会。我会说：‘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你们分不清，我是能够分得清的。’唉！当他正在赢得胜利并且这点已经变得很清楚时；你应当看到，公务人员的态度都变了。当尼雷尔访问木索马时，他们就要我邀请他们同他一起用茶点。我就说，‘我为什么要邀请你们？你们以前连话都不愿跟他讲。’”

然而，坦盟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恰逢其时，因为非洲的政治变得比当时任何人所意识到的更快。一九五四年，联合国视察委员会曾劝告英国政府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内允许坦噶尼喀独立。两年之后，尼雷尔自己在联合国要求在十年到十二年之内独立；一九五九年，他要求在五年之内独立。但无论是尼雷尔或其他任何人都还没有意识到，殖民主义强国撤退的进程会加快到何种程度。结果，过了不到两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坦噶尼喀就获得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坦噶尼喀总督访问了比属刚果。他后来回忆说：“那里的总督是个小拿破仑，他对我说：‘我们当然钦佩你们英国人在坦噶尼喀所做的事情。但你们是否太快了呢？’可是！十八个月以后……”十八个月以后，比利时人轻率地结束了自己在中非的事业，给予刚果独立，但刚果却可悲地没有

为此作好准备。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担任坦噶尼喀总督的爱德华·特文宁爵士，是位夸夸其谈的理想家。他在政府大厦里用铁腕进行统治。一位坦噶尼喀人有一次这样说：“象罗伯特·英利扮演素丹的角色那样。”他担任总督的初期，深为坦噶尼喀中部的赫赫族人所喜爱，因为他通过德国博物馆，设法把四十年前在同德国人作战时为了避免被俘而自杀的赫赫族著名战士、酋长姆克瓦瓦的头盖骨送了回来。这是既表示宽大又非常狡猾的姿态。但是亲自去把头盖骨拿回来的特文宁，显然私底下也怀疑博物馆给他的是不是真的头盖骨。当赫赫族人问他，“我们怎么能确定这是我们酋长的头盖骨呢？”特文宁回答说，“啊，你们认不出他吗？”一位老人说：“我认得出来。他的前额右边碰伤过一大块。”特文宁后来告诉他的朋友说：“那时我的心沉下去了。”这位老人拿起头盖骨来反复研究，在他手里翻来倒去的那一段时间，对特文宁来说好象无限长似的。最后他微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姆克瓦瓦”，这才使特文宁放下心来。

特文宁和尼雷尔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过，他把尼雷尔当作种族主义者而不予理会。同他们两人都是亲密朋友的沃尔什神父回忆说：“我看到过特文宁对朱利叶斯生那么大的气，连他自己的痛风病都忘记

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我和特文宁一起在他的卢肖托小屋里，他的腿搁在椅子上。哦，他生气了！他完全不听我的。他说，‘尼雷尔是没有理性的人，他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我说，‘世界上所有革命都是由易动感情的人鼓动起来的。’特文宁是吉卜林^①时代的最后一个人物，是我所遇到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但是他来自吉卜林的世界。在为吉卜林举行葬礼时，他们唱了一首吉卜林写的赞美诗，结尾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愿毋相忘，愿毋相忘。”特文宁是帝国缔造者中的最后一个人物，而朱利叶斯则是激进派中最早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们发生冲突了。两个都是老实人，两个都是理想家。特文宁说过：‘尼雷尔正在试图挖英帝国的墙脚！’‘我将摧毁这个人’——但是记住，他当然是有痛风病的。”

另外一个同特文宁和尼雷尔都接近的人是立法会议的戴维·马克瓦伊阿。马克瓦伊阿后来回忆说：“我是很为难的。一方往往被当做殖民主义者的走狗。但是特文宁有一次对我说：‘我试图在社交场合同朱利叶斯·尼雷尔见面。他答应他要露面，但却从未露面。’朱利叶斯说：‘他说得很对。如果你们今天到那里去，我就去。’于是，我在那天晚上六点钟

^① 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年，狂热鼓吹殖民主义的英国诗人。——译者

带他到政府大厦去。只有一个仆人在那里，但很快就出去了。特文宁夫人也不在。我回忆两个人开始谈话时都很勉强。于是特文宁为自己斟了杯杜松子酒，说道：‘喂，朱利叶斯，你要喝什么酒？我是喝杜松子酒，你呢？’朱利叶斯对我说：‘长官，你呢？’我说：‘我想我可以在政府大厦里破坏法令并且免受惩罚。’朱利叶斯说：‘好吧，我就喝一点啤酒。’

“我说：‘现在你们都想谈话。为什么你们又似乎很不好意思呢？’特文宁说：‘我觉得坦盟主席和总督应当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我做的任何一种事都将和朱利叶斯·尼雷尔想做的事有些关系。’”他们开始讨论“多种族主义”和“非种族主义”这两个名词。马克瓦伊阿继续说道：“于是我说：‘你说过，你正在准备让坦噶尼喀自治或独立，尼雷尔要求有一张时间表，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反对意见？’朱利叶斯说：‘戴维说得很对。如果殖民政府能够说明还有几年才能独立，我们将很高兴。’特文宁说：‘我将秘密告诉你。我说这个国家从现在起，还有十五、六年就能够获得独立。但是你不能指望我在公开场合这样说。’朱利叶斯说：‘为什么不？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并且我们将朝这个目标努力。’”

许多年以后，特文宁——现在是特文宁勋爵——在伦敦他所住的阿什利花园公寓里回忆坦噶

尼喀的政治情况。他说：“委任统治是我们政策的基础。它规定，我们应当让坦噶尼喀自治和独立，但并不作时间限制。我们拒绝提出时间表。一九五四年，最后一个视察委员会说，应当在二十五年之内。一九五八年，我说，我认为将在十二年或十四年之内。我的政策是根据英国政府认可的政策：即非种族主义，搞一个逐步把管理权移交给非洲人的纲领；对所要达到的目标仔细分清轻重缓急订出计划。现在，尼雷尔的政策是激烈的非洲民族主义。其中丝毫没有非种族主义，他想立即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我告诉尼雷尔，只要他们不破坏法令，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但是他们失去了控制；有些坦盟支部竟私设法庭！嗯，我认为尼雷尔是个好家伙。温和，稳健，明智。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他第二天就跑出去向三万人讲话，发表他的相反意见。他是个很精明的政治家，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人。但是他不贪心，不贪污；我认为他是个好人。”

独立斗争胜利后很久，尼雷尔谈到特文宁时说：“就我欣赏的殖民总督而论，他是比较伟大的总督之一。如果我要写一部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我会给特文宁一个重要的地位，还有唐纳德·卡梅伦爵士，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

“特文宁是在不适当的时刻到来的，而且他呆得

太久了。但你必须对他信任：他有理想。但他有一种缺点。他就是英国诗人波普讲到过的那种人：‘象土耳其人那样喜欢个人统治的人，难道会容忍他的兄弟接近宝座吗？’是啊，他是总督，他不喜欢任何人去吩咐他。他也做了好事。英国人在开发这个国家方面没有做什么事，但就已经进行的开发而论，那是卡梅伦和特文宁推动的。港口深水停泊处的建设是从特文宁时代开始的；达累斯萨拉姆的新飞机场也是特文宁时代修建的；通向莫罗戈罗的柏油路和伊林加的规模很大的中学校，也都是特文宁时代建造的。

“在政治上，他不愿意任何人接近他的宝座。他看到有些欧洲移民主张在这里建立象他们在肯尼亚建立的那种统治，他就加以阻止。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政府大厦的声音！只许有一个声音，不许有别的声音！我尊重他。但早在一九五四年，我们就发生冲突了。在他的模模糊糊的心目中，我是种族统治的象征，而他的党是‘多种族的’。到一九五五年，他终于认识到，他一个人是不能同我们斗争的，他试图恢复欧洲人的声音——但这已经太迟了。”

为了对付坦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益扩大的影响，特文宁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组织了“多种族的”坦噶尼喀联合党，作为坦盟的反对党。一年半后，他宣称坦噶尼喀的第一次选举将在一九五八年

第一季度举行。十个选区中的每一个选区应选出三名立法会议的议员——一名非洲人，一名亚洲人，一名欧洲人——每个选民按种族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为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非洲人议员只能占三分之一，所以坦盟的大部分领导认为党应当抵制这次选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塔波拉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尼雷尔令人信服地争辩说，坦盟应当参加这次选举。结果证明，他的那次胜利是对国家前途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胜利。

尼雷尔的兄弟约瑟夫回忆，当初支持尼雷尔的只有一个党员，即从坦噶来的代表。“所有其他一百多名代表都反对，都说应当抵制这次选举。辩论进行了两天，最后一天我没有参加会议。那天只有两个人发言——博克·穆南卡和朱利叶斯。可是，我的印象是全国都反对我们参加竞选。所以，当我回来并且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将参加选举时，我说：‘只有两个人想参加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那样做呢？怎么可以违背人民的意愿作出那样的决定呢？’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对他说：‘你这个独裁者！’

“朱利叶斯说：‘你说得不错，我知道你生气了。现在坐下来，我把事情讲给你听。如果我们今年不参加竞选，坦噶尼喀统一党就将取得胜利。它提名的所有议员都会没有反对票而当选。坦盟将来只好

在议会外面斗争。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送一份请愿书给殖民部说明我们的立场；殖民部也会派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而下次的选举要等三、四年以后再举行。到那时，坦噶尼喀统一党早已巩固了。我们可能要到一九七〇年或一九七五年才获得独立。

“‘但是如果我们参加竞选呢。每个人都说，坦盟将只选出十名议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有欧洲人和亚洲人朋友，他们会支持我们。我们将有三十名坦盟支持的议员。那时，我们既可以在立法会议内部斗争，又可以在它的外面斗争。我们将要求制定一部新宪法。几个月之内我们就可以获得自治，一九六一年我们将获得独立。’”

约瑟夫回想他哥哥的说服能力时说：“朱利叶斯是不急于作出决定的。我们将讨论讨论。然后他将说：‘好，现在让我们出去喝杯啤酒，或者用些茶点。’然后我们回来，他将说：‘好，明天再谈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他会使你信服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开始前四个月，坦盟的报纸《坦盟之声》发表了尼雷尔写的一篇社论，警告党员不要使用暴力。社论说：“为什么那些精神错乱的人老是试图挑拨人民采取暴力行动，其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保持一个守法的组织，我们实际上将处于无敌的地位，……非

洲同胞们，要警惕啊。敌人正在冷战中失败，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反对我们的事情。切勿授与敌人以把柄。不要被挑动使用暴力。要象你们往常一样的安静和保持心情舒畅。”社论然后挑出两个县专员来加以批评，责备其中一个用“捏造的理由”审讯一个酋长，另一个则试图暗中破坏坦盟。不管这些评论现在看来是多么温和，而当时殖民政府却认为应当根据这篇社论对尼雷尔以三条诽谤罪名起诉。这个案件拖了几乎三个月。最后，判决尼雷尔有罪，让他在罚款一百五十英镑或坐牢六个月之间进行选择。

许多观察家感到，当局强行制造这一案件是做得不聪明的。几年以后，连特文宁也把这个事件归罪于“一位固执的爱尔兰人检察长”，还说：“按照英国的制度，总督既不能干预检察长，也不能干预首席法官。”不管这种声明有多少真实性，在坦噶尼喀普遍认为，尼雷尔将抓住这个机会，象大多数其他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那样，成为“监狱的毕业生”。尼雷尔的朋友们的确都乐于回忆当时他是如何同这个判决进行斗争的。他栖身在切沙姆夫人的农庄里，轻描淡写地、差不多开玩笑地说：“我将进监狱去吗？其他每个总理都进过监狱啊。但是我不能进去，今年是选举年。”

这次审讯正好和另一重大事件同时发生，就是

特文宁的退休和新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的上任。特恩布尔是一个瘦长个子，学识渊博，他在肯尼亚处于“茅茅紧急状态”的高潮时期，曾任肯尼亚政府的秘书长。他于七月十五日宣誓就职，正当对尼雷尔的诽谤罪开始审讯后一星期。七月二十四日，在审讯结束前的两个多星期。特恩布尔邀请尼雷尔到政府大厦去谈话，这件事实际上使坦噶尼喀的每个人都出乎意外。特恩布尔说：“英国人把这次审讯搞糟了，引起群情愤慨。我经历过肯尼亚的四年紧急状态，我不愿再次经历。我不能坐等判决。我派人去找他来了。”

一位朋友回忆，当时尼雷尔曾说：“当我去见特恩布尔时，我认为我应当说几句客气话，于是我说：‘我对你打算为坦噶尼喀进行的工作表示感谢。’但特恩布尔对此避而不谈。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想：‘感谢上帝，这个人怕难为情。我也许能够同他共事。’”

尼雷尔几年后说：“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富有战斗性，特恩布尔可能步特文宁的后尘，而陷入真正的麻烦。我曾决定进监狱。摊牌的时刻到了，我们已作好战斗的思想准备。我预料到他会邀请我去同他谈话，但是我想他要等到审讯结束以后。但他没有等到那时候。唔，即使他们代表了我正在与之作斗

争的那种制度，我对这些人还是尊重的。而且，我们认识到，他所接下来的一堆困难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经过第一次商谈以后，我觉得为了危机而去促成危机是荒唐的。”他选择了罚款。正如特恩布尔所说：“他做了一件非常大方的事：他放弃了殉道者的荣誉。”

在那年的竞选运动中，尼雷尔在东方省同酋长帕特里克·库南比竞选一个席位。后者是早期的坦盟党员，后来退党，这次决定以独立的身份参加竞选。在一个村子里，坦盟支持者用投掷石块来破坏库南比召开的一次会议。库南比曾说：“我知道朱利叶斯为这件事很不安。不过他没有和我说起这件事。他感到谈论这类事很为难。他明白，我也明白，这就算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为坦盟的候选人开展了竞选运动，其对手是一个名叫蒂勒尔的欧洲人。那个人的竞选口号是：“你们都熟悉蒂勒尔。”尼雷尔在讲话中模仿并嘲弄这句口号，引起他的听众哄堂大笑。他说：“我们都熟悉蒂勒尔，谁不熟悉蒂勒尔呢？哦，我们对蒂勒尔太熟悉了。”正如尼雷尔所预言的那样，坦盟的和坦盟所支持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全部获胜。尼雷尔本人共获得二千六百票，库南比只获得八百票。翌年三月，总督在政府中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坦盟的作用，在十二个部长职位中给了

坦盟五个。一九五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尼雷尔眼看胜利在望，他和他的同事印度人阿米尔·贾马尔和英国人德里克·布赖森一起进行庆祝。正如布赖森有一次所描绘的：“我们绕着室内跳个不停，先用这只脚，后来换另一只脚”，沉浸在大声欢笑之中。

尼雷尔在着重强调他的主题“自由与工作”时，叫道：“我们不能走遍世界去乞讨金钱。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向往的事业而工作。这是上帝的训令，不是尼雷尔的训令。”他在痛斥用小恩小惠去贿赂酋长和长老的传统习惯时说：“人民再也不愿看到用馈赠羊和鸡的办法去收买正义了。”

一九六〇年，尼雷尔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他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建立一个东非联邦是如此重要，如有必要的话，坦噶尼喀愿意把它的独立推迟，以便同肯尼亚和乌干达同时宣布独立，并同它们立即结成联邦。一位助手无意中把这篇报告向新闻界发布了。当时马上可以看出，尼雷尔的这一声明并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构的批准。坦噶尼喀《旗帜报》的前任编辑曾说：“在达累斯萨拉姆，坦盟的每一个主要官员都打电话给我们说，尼雷尔不应该讲这种事。”但是尼雷尔对这种主张承担了责任，他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我们三国应该成为一个国家。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在

什么时候？我主张建成联邦的最好时间是在独立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能把争取自由的运动和争取统一的运动结合起来。自由很得人心，统一也会得人心。你们要求这些国家有所成就，但如果等到这些国家独立后你们又要求它们放弃主权，那就不容易了。我的意见是：不要等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天。所以我说：‘我们在坦噶尼喀愿意把我们的独立推迟到肯尼亚和乌干达都有普选的政府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朋友〔英国人〕并不这样认为。”

在一九六〇年八月的选举中，新议会的七十一个席位中坦盟候选人获得了七十席，尼雷尔被授命组织政府。他对他的追随者说：“不要让胜利冲昏我们的头脑。我们不能把头脑里的主张膨胀得象乞力马扎罗山一样大，因而忘记过去和将来。”一九六一年三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了由英国官员和坦噶尼喀领导人参加的制宪会议，解决坦噶尼喀独立后宪法的细节问题。作为对殖民大臣伊恩·麦克劳德作出的让步，尼雷尔同意在坦噶尼喀独立时——他们商定的日子是十二月九日——先成为君主制国家，由一位总督代表女王；他的许多同事后来才认识到，这意味着坦噶尼喀还要等待整整一年，才能成为英联邦的一个共和国。五月，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完全独立前的最后一步），由尼雷尔任总理。

据一位英国新闻记者约翰·科利尔的回忆，有一天他顺便到尼雷尔在达累斯萨拉姆海滨区的政府办公处去访问，这是有六个房间的平房。尼雷尔说：“不错，这里是个景色美丽的地方，但汽车还停在路上。约翰，你会开汽车吗？”尼雷尔苦笑着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开汽车；其实他周围经常有那么多人人都想为他开车，他何必为这些事操劳呢？

这时，外国新闻界经常请求尼雷尔发表他对非洲事务的看法。根据至今还在东非流传的一个故事说，那年一个英国记者有一次要求尼雷尔把他一段富于非洲语言特色的话再重复一遍。据说尼雷尔曾说：“哦，我记不起来了，你讲吧，你对这种事情是擅长的。”这位记者引用尼雷尔的话说，非洲领导人除非能够设法满足人民的愿望，“否则我们将会失败，象追逐犀牛的虱鸟那样肯定会失败。”这句话后来被人广泛引用。尼雷尔对这位记者说，“你讲得不坏。”

尼雷尔担任总理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停止向南非一些金矿提供坦噶尼喀工人。这一新政策使坦噶尼喀一年损失五十万英镑，但尼雷尔认为从道义上说这是必定要做的。他在此以前几个月写道：“在南非洲，白人的所作所为象一个人卡住睡熟的巨人的喉咙那样。他害怕巨人醒来所产生的后果，因而不敢松开他的手。这种恐惧驱使他发展到自杀般

的疯狂程度，他紧紧卡住，直到巨人感到疼痛而醒来。”尼雷尔还开始谈到不结盟是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不容许由我们的朋友来决定谁将是我们的敌人。”

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曾说：“在那个时候，朱利叶斯和坦盟都还缺乏经验。根据‘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原则，他们在卢旺达-布隆迪支持了曾同比利时人争吵的很坏的瓦图西族，事实上，瓦图西族都是移入的贵族，是哈族的领主，在卢旺达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五，而班图族农民则占百分之八十五。

“我经常考虑两件事：人们往往低估非洲的赤贫状态。人们会说：‘为什么非洲的青年人不回到农村去？’但是，他们连用来买肥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二百镑钱都没有，他们怎么能回去？他们穷得什么都没有啊。

“第二，是非洲人的家庭特点。没有老年补助金。老年人和病人是需要有照顾的。所以，当一个人有了钱，大家都来分享。当了总理的尼雷尔，有时住在他那里的人达四十人之多。奥斯卡·坎博纳有一次向我诉苦说，他的亲戚把他的衣服穿走了；他买了套新衣服，又给他父亲拿去了。是的，朱利叶斯发觉了这些可怕的需求，所有这些人都要求工作，而玛丽亚旁

边就有四十个这样的人。我们所能助一臂之力的事是经常去油漆她的房屋，以便把这些人全都赶出门外。这类事情在非洲当然到处都有；成群的食客需要照顾；有时就以此来为贪污现象开脱。朱利叶斯从未叫过苦，但我知道这对他是个负担。”

外交官和文职官员的夫人们举行使用“刀叉”的宴会招待非洲的夫人们，正如一个英国人后来解释的，这是为了使“她们将来使用刀叉时不受窘”。但自从拉希迪·卡瓦瓦责备这是“打击非洲人的风俗习惯”以后，这种做法就突然停止了。特恩布尔回忆说，他常常非正式地担任尼雷尔的教师，有时使用赫伯特·莫里森的《议会要领》一书。特恩布尔曾说：“同一个非洲人打交道，引用工党人士的语言总是比较好的。”

两年前，尼雷尔曾在立法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坦噶尼喀人很想点燃一支蜡烛，并把它放在乞力马扎罗的山顶上，让光明普照到我们的国境线以外，对感到失望的地方给予希望，对相互仇视的地方给予热爱，对只有耻辱的地方给予尊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夜里，一群登山队把这样的火炬放上非洲最高峰的山顶；同时在五百英里之外的达累斯萨拉姆，七万五千个坦噶尼喀人和他们的客人，包括爱丁堡公爵在内，聚集在国家体育场参加独立大典。时方

午夜，体育场里灯光全部熄灭。英国国旗在一片黑暗中徐徐下降，绿、黑、金三色的坦噶尼喀国旗升了起来。灯火复明时，群众高声欢呼“乌胡鲁(解放)！”然后，正如尼雷尔从坦盟初期以来就对他的同胞早已提醒过的那样，坦噶尼喀的真正问题开始了。独立后动乱的第一年即将结束时，有人问尼雷尔，他感到他的国家已经完成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他说：“我们已经懂得生活的艰巨，要实现我们的抱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第六章

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获得独立开始，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成为共和国的十二个月，当时继续担任总督的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把它称为“混乱的一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外的驱逐白人出境事件。达累斯萨拉姆棕榈海滨饭店的英籍经理，因要求四个非洲人——他后来知道其中一位是达累斯萨拉姆的市长——离开饭店的酒吧，而立刻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在达累斯萨拉姆西北一百三十英里的科罗格韦的一个小旅馆里，三个英国人和一个年轻的非洲人辩论，这位非洲人原来是议会的秘书。结果这三个英国人都被驱逐出境。靠近莫桑比克边境的沿海城市林迪，一个在坦噶尼喀住了九年的瑞士公民，也同样被驱逐出境。据政府的报告，这个人把一枚“解放”徽章挂在他的狗的项圈上，“让这只狗在人前走来走去……人家还听到他说，那些庆祝独立的人跟他的狗一样。”使英国报刊吃惊的不是坦噶尼喀政府被一些种族歧视事

件所激怒的反应，而是一般只在二十四小时前通知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人，而不给他们申诉的机会。《经济学家》周刊说，尼雷尔“这次的表现有点不对头，他没有保证公平处理问题。”《卫报》说，“可能是这样，一位非洲领导人即使不是种族主义者，有时也要做得象种族主义者；即使他是一个政治家，谈话的样子也得象个政客。可能种族主义象天花一样，只有种了牛痘才能预防。”甚至在坦噶尼喀，许多观察家也似乎相信，尼雷尔只是容许他的党有一点自我放任。特恩布尔曾说：“有一条原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避免和党争吵。法律规定〔被驱逐出境者〕可以诉诸法院。事实上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他又说：“独立以后，富有的印度商人仍坐着他们的梅塞德斯牌汽车，享有特权的欧洲人照旧在那里，而非洲人则依然如故，什么也没有改变。除掉满足了民族自尊心以外，他们还得到些什么呢？驱逐出境这种轻率行动是对民族精神有害的，但它也让人出点气。”

不幸的是，在坦噶尼喀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这种行动不仅象征非洲人已掌了权，而且也象征狂妄自大和滥用权力。（几年以后在肯尼亚，政府强迫它内阁中的一位部长在几小时内把他的美籍妻子驱逐出境，罪名是她“对肯尼亚国家不满。”）但是对这类举动，尼雷尔是绝不表示歉意

的。当时他说：“多少年来，我们非洲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受人侮辱，现在我们不再受人侮辱了。”几年后，他又说：“我认为我们肯定是对的。你们在这些殖民地国家得经过两个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是深夜来临之后，晨钟齐鸣，你们独立了。多么美好啊。但此后就开始一段改变环境和改变人的整个过程。我早就对人民讲过，告诉他们这第二段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在独立前很久就一再说过‘自由与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要使人民为第二个阶段作好准备：‘告诉他们：不要指望出现奇迹，不要指望过了一夜就有好房子住了。’”

“但是，”他气愤地咬着字儿接着说，“黑夜之后，有一件事必须改变：那就是殖民者的态度，他们把非洲人不当人的那种做法。这是在黑夜以后必须改变的。现在是殖民地人民当家作主了，这一点必须反复讲解，务使深入人心！如果过去白人在他们脸上吐唾沫，现在就不准再这样做！黑夜已经过去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能再等二十年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教训向人民着重地讲清楚。”

这种反映出新旧统治者之间的磨擦关系的事件继续发生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六三年六月，阿鲁沙的萨法里旅馆事先没有接到警告就奉命停业；住在那里的二十八位客人，大多数是白人，限一小时内另

觅住处。政府提出的理由是，这家旅馆侮辱了正在坦噶尼喀进行国事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前一天，奥斯卡·坎博纳陪同杜尔一行到旅馆共进午餐，当贵宾们经过休息室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旅馆的住客们说，他们不知道这一行人里面有什么人。阿鲁沙专区的专员、驻在当地的最高政府官员彼得·瓦尔瓦指责该旅馆忘了悬挂国旗或其他装饰，并且供应了“粗劣的饭菜。”当时已成为尼雷尔的外交和国防部长的坎博纳解释说，“当我们走进旅馆时，一种态度就显出来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惩一儆百的时候了。一个非洲人决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这种不把他当人看待的这种蔑视他个人尊严的态度。我们对于不尊重我们尊严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外国报刊不免要批评坦噶尼喀人神经过敏和傲慢；当地的白人团体往往责备坎博纳和瓦尔瓦，而且以为如果尼雷尔在场，事情就容易解决了。萨法里旅馆的经理否认有任何侮辱来访贵宾的意图，几个月后，这家旅馆获准恢复营业。

类似的事件是，六十九名政府和党的成员申请加入达累斯萨拉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殖民主义旧时霸占土地建造的遗物。俱乐部拒绝接纳他们，但暗示如果他们按照正当手续提出而又有人赞助的话，申请人可能被接纳。当时这个俱乐部的九百八

十名会员中，非洲人只占九名。到了一九六三年末，俱乐部问题成为议会里引起愤怒争论的题目。一位议员大声说，“这是一个连尼雷尔总统也不能参加的俱乐部。再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俱乐部在干些什么。为了我们的安全，现在是该把这个俱乐部封闭的时候了。”但内政部长乔伯·卢辛德向他保证，政府在盯着俱乐部的每一个行动：“我们的保安工作做得很好，即使一群人在隐蔽的地方进行颠覆活动，他们也会被搜查出来的。我们等铁烧红了才打。”结果是政府决定解散这个俱乐部，接管它的财产。卢辛德解释说，这个俱乐部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创办的，这是过去的敌产，早该没收了。一位兴高采烈的议员说，“这才是真正的非洲社会主义。”从此这个俱乐部的阳台就成为坦噶尼喀的政治家们最喜欢在那里聚会的地方。尼雷尔象对萨法里旅馆事件那样，对这场争执也置身事外，几年以后，当这个改组了的俱乐部陷于破产时，他个人答应注意把帐单付清。

坦噶尼喀独立后只有六个星期，伦敦《星期日电讯报》刊出一篇报道，说尼雷尔已辞去总理职务。据坦噶尼喀《旗帜报》说，当这份报纸送给尼雷尔过目时，他“读了最初几行，就大声地笑着说：‘好家伙！’”他读到提及奥斯卡·坎博纳是“尼雷尔的最强有力

的反对者之一”时，又笑了起来，对《旗帜报》记者说：“你可以说，我读了以后付之一笑。”

但第二天他宣布，他事实上已经辞职了。“今天，我辞去了总理的职务。我在这样做以前，我自己挑选了内阁的新班子，由拉希迪·卡瓦瓦任总理。”他解释说，他决心致力于重建党，因为他相信这是实现“我们新目标”——即创造一个国家，使人民在这个国家里发挥充分的积极的作用，向贫穷、愚昧和疾病作斗争——的最好途径。他说，这个国家除了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外，还需要“一个活跃于每个乡村的强大的政治组织，象一条双向的全天候公路那样，一方面把政府的目的、计划和各种问题传达给人民，同时又能把人民的思想、要求和争论直接传达给政府。这就是新坦盟的任务。”他说，他知道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但又说，“我们不相信有什么必要去抄袭其他国家的制度。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制订出我们自己的民主模型。”他请坦噶尼喀的国外朋友们要“了解这些变化，而不要试图或故意曲解这些变化的真实含意。”

尼雷尔虽有这种请求，大家对他的辞职还是广泛地解释为战略上的撤退。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看来尼雷尔先生好象遭遇到了和其他非洲温和派人士同样的命运。从更多

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那里掀起反对他和把他赶下台的压力，速度之快是令人不安的。”一月二十七日《经济学家》周刊作出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判断：“如果要求什么人开一张恐怖的药方，好让坦噶尼喀在全世界名誉扫地，那么他不可能找到一张比本星期在达累斯萨拉姆酝酿出来的捏造事实描写得更恐怖的了。”甚至肯尼亚的政治领导人乔莫·肯雅塔也说，他听到他的“好朋友”的辞职感到“很大的忧虑”。在达累斯萨拉姆，新闻记者解释说，一系列的驱逐出境事件证明了党内有不满情绪；他们还注意到党的斯瓦希利文周刊《解放》最近所采取的刺耳的种族主义腔调的倾向：它把这个国家的印度人说成是“蛇”，把留下来的英国官员叫做“殖民主义的鼓吹者”。这次辞职的确是一系列难以解释的事件中最初的一件，这些事件后来成为坦噶尼喀政治的奇特烙印。

如果尼雷尔在独立后的几星期内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确实有过严重的争执，他却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特恩布尔回忆说，“我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他可能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希望他不必那么悲观。”可是，毫无疑问，尼雷尔认为重建党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当他把他的这个计划告诉全国执行委员会时，他花了三天时间才得到他们的同意。他曾说，“我们故意尽量只讨论有关‘解放’的问题，别

的问题一概不谈。但是今后，全国的人民要问，‘下一步怎么办？’我不能坐在这里。我得答复这个重要问题。”

尼雷尔宣布辞职后的那天早晨，他把当时担任不管部长的拉希迪·卡瓦瓦请来。据卡瓦瓦回忆说，“尼雷尔说‘注意，拉希迪，从现在起你就是总理了。你就上任吧。’我大吃一惊！是的，前天晚上，我们已给他开了绿灯（辞职）。那天夜里他和我们辩论了四个小时；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要这样做。这一次，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你知道他的行动总是戏剧性似的。”

另一位内阁同事阿米尔·贾马尔说，“他是非常激动的。他已经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痛苦才下决心的。他说，‘我要求拉希迪担任总理，所有你们的同事都将留任。’”

当尼雷尔告诉总督，他已最后决定辞职，并将由卡瓦瓦继任总理时，特恩布尔指出，当天晚上卡瓦瓦已预定去尼日利亚旅行。“我说，他们还是不要让他辞职为好。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特恩布尔还对这一宣布将在海外引起的影响感到不安。“朱利叶斯很不会处理对外联络的问题。我对他说，‘要注意，向全世界解释时必须小心谨慎——在这里的各城市，在英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你必须稍有不同

地通知每一方面。你必须责成对外联络人员去做这个工作。’我告诉他要用电报通知本国在海外的全体官员。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驻伦敦的坦噶尼喀高级委员会，一星期内没有得到通知。他们不明白朱利叶斯是病了，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

虽然经历了一阵持续的混乱，尼雷尔对他的这个举动从不后悔。几年之后，即在他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重新执政当了共和国总统以后很久，有人问他在独立后突然辞去职务，他是否还认为是正确的。他说：“这没有问题，如果我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我又回来了。”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他是非常严肃的。“我确信我的任务是领导群众。如果有什么事情使我后悔的话，那就是现在回到群众中去有些困难了。这件事把国家的风气改变了。我不愿说因此我们和其他东非国家就有什么不同了，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和我们不那样做所可能变成的样子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这个国家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就是它有一种目的感。我认为我在一九六二年所采取的行动有助于赋予它这种目的感。我认为这是我为这个国家所做的最好事情。”

他的朋友也从来不怀疑他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阿米尔·贾马尔有一次说，“由于他那次辞职的结果，谁也不会谴责他为了权力而抱着权力不放了。他

们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

拉希迪·卡瓦瓦于一九二九年生在一个捕象者的家庭里。卡瓦瓦曾说,“我的父亲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这种职业,我的祖父又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我是向我的父亲学的。”他属于松盖阿县的恩戈尼族,但是在坦噶尼喀的几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包括基尔瓦和纳钦格瓦,因为他的父亲担任政府的猎兽侦察人,常常搬家。

卡瓦瓦在塔波拉学校听过尼雷尔辩论有关教育重于财富的问题,他从该校毕业后,在达累斯萨拉姆的社会福利部当职员,出于偶然的机会又成为电影演员。这个部从南非进口了一套摄制电影的设备,开始自己拍摄电影。“好啦,你知道,我那时是个年轻人,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所以我决定在一部影片里扮演一个角色。我被派在一部名叫《痛苦的卡萨瓦》的影片里当主角。这部影片的故事讲一个乡下孩子受城市生活的诱惑而误入歧途,最后他决心回到农村去。另一部影片名叫《船舶在航行》。它讲一个乡下姑娘如何被一个城市青年所哄骗。她到了蒙巴萨,就被那个青年遗弃了。她决心回家去,但发现她的未婚夫已另娶了别人。于是她施展妖术去害她以前未婚夫的妻子,发觉后她被关进了监狱。这就是她的命运。”

后来当肯尼亚处于“茅茅紧急状态”时期，卡瓦瓦在一个拘留了一些肯尼亚的吉库尤族人的集中营里工作。卡瓦瓦说：“吉库尤族人最初对我很怀疑，他们以为我是个间谍。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我可以帮他们忙。我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几个委员会，并把他们所受的委屈反映给该营的长官。”

当卡瓦瓦在整个坦噶尼喀旅行时，他帮助组织了坦噶尼喀非洲政府服务协会的几次集会，他的父亲在这个组织中是很活跃的。卡瓦瓦作为坦噶尼喀非洲政府服务协会的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曾帮助募集款项使尼雷尔去联合国。卡瓦瓦警告奥斯卡·坎博纳说，“当你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只要给我一张收据，不要写上‘捐给坦盟’的字样，否则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一九五五年十月，他成为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的秘书长，翌年他辞去了他的公务员职务，参加了坦盟。从那时起到独立，坦盟与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一直密切合作着。一九五八年的啤酒厂罢工是尼雷尔亲自领导的。尼雷尔对坦盟听众说，“如果你们喝啤酒，你们就是在喝你们自己人民的血。”卡瓦瓦说，“这发生了作用，我们把各处的啤酒吧都弄得瘫痪了，不到一个月，他们不得不答应我们增加工资的要求。”

从卡瓦瓦就任总理那天起，他坚持他只是暂代

尼雷尔的。卡瓦瓦说：“他是国父，他作为坦盟主席，是坦噶尼喀最有权力和最重要的人。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尼雷尔被选为总统后，他提名卡瓦瓦为副总统，卡瓦瓦以后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政治上的同盟者。

“朱利叶斯回到人民中来了，”当他辞去总理以后，《旗帜报》立即用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事实上他确实是如此——他在全国各地旅行和演说。他在大湖地区向一群村民抱怨说，他们把太多的钱埋在地下了，并讲到欣扬加的一个人给他看了一张五百英镑的钞票，一部分已被蚂蚁蛀掉了。尼雷尔宣布说：“我们将在这里开设一所银行。”他仍然主张建立东非联邦，他大声说：“如果我们要更多的地方来安排总理，那就把非洲分割成更多的小国吧。让每个部族都派人去联合国。你们没有想到如果让那种事情发生，光是我们的坦噶尼喀就会有多少个投票权呢。”很象他五年后在《阿鲁沙宣言》中所讲的那样：“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工作上。我们必须生产更多的棉花，更多的咖啡，更多的烟草，如果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帮助，人民也能够建成一座水闸、一所学校或一条公路，那末他们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而不是依靠外援。”

按照政府的自力更生规划，全国的村民每星期

都要为公共工程——一条新公路、一口井、一所学校或一个诊疗所——捐献一天的劳动。据政府的一个报告说，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人民由此建成了约值八十九万英镑的工程，其中政府拿出了约七万英镑的材料。如果要了解许多农村的劳动热情，访问者在那年只要花一天时间到达累斯萨拉姆西面十五英里的基班巴之类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两百个村民随着鼓和响板的节奏，在一条新公路上锄着和砍着。一个看来狂热兴奋的人，把鹤嘴锄象刺刀般地挥舞着在人群中来往奔跑。不可思议的是并未发生伤亡事故。到这里来准备掘几铲礼仪性泥土的卡瓦瓦总理，似乎也因这种乱烘烘的场面而略微推迟了一些时间。他说：“我想我使你们太兴奋了。”当地坦盟官员自夸说，“从总理以下，我们全都在流汗。”当村民们等待政府来为一座新建的公共活动中心盖上屋顶，或为一所新学校派一位教师来，而落空时，早期的那种兴奋情绪便逐渐消失。尼雷尔后来说，如果他象独立后最初几个月那样再一次辞职的话，“我一定试图更好地利用人民的热情——给他们以更多的指导：应当在哪里造一条公路或者是否应当建造一所学校。”

独立后六个月，政府废除了世袭酋长的职位和薪金，因为在权力和职务上，他们同政府官员有冲

突。一位从前的酋长说，“酋长们未曾被吸收参加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于他们目光短浅。他们大多数人同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在年老的酋长和年轻而受过教育的酋长之间，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当年轻酋长赞成改革时，老酋长就说，‘他们是野心勃勃的。’殖民行政机关发现酋长在推行政策方面是有用处的，如果事情搞糟，还可以把他们当替罪羊。”例如他回想起，苏库马兰（坦桑尼亚最大的部族苏库马族所住地区）的酋长被迫支持减少养牛的计划——减少他们人民所养牛的数目。“对村民来说，他的牛就是他的财富。即使他们所养的牛瘦得只是皮包骨头，他们也不会少关心些。减少他的牛的任何努力，只意味着政府要弄得他们更穷些。于是老酋长开始谴责年轻酋长。老酋长会对人们说，‘他们要把你们弄得更穷。’这简直是象马基雅维里^①那样玩弄权术，耍两面手法。许多年轻的酋长决定等着瞧，他们就落进圈套了。民族主义运动是能够把他们贴上反人民的标签的。只要酋长还有权力，他们对坦盟来说就是头痛的事情。所以取消他们的职位是对坦盟政府有利的。”

^①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善使用权术。——译者

另一位以前的酋长说，“在尼日利亚和加纳，酋长和民主选举的政府之间不和，而且还有两面效忠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坦盟决定废除酋长。坦盟的目的是使政府从中央最高机关直到农村基层一级合理化。保留酋长就会使这条直线中断。”

唯一留下来的有政治势力的酋长是阿卜杜勒·丰迪基拉。他是个保守分子和传统主义者。事实上，他有一次自称“我就是传统”。他当上了司法部长，后来又担任“坦噶尼喀开发公司”的第一任主席。由于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还由于他的世袭权力，许多坦盟领导人对他都有反感。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回忆说，“丰迪基拉是酋长队伍中的老前辈，他沉默寡言，态度尊严，暗示着在他身上有帝王的神权。我想他是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和不够庄重的年轻政治家的。当一个非洲人受窘的时候，他往往用放声大笑来规避。在内阁会议上，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经济问题时，我看到他们摇晃着脑袋嘻嘻哈哈，而丰迪基拉却在一旁望着他们。”

独立后十八个月，丰迪基拉因被指控犯贪污罪被捕；他被控的罪行是，当他担任全国农产品委员会的主席时，接受过二千五百英镑的贿赂，“运动他给某些商人购买农产品经营的权利。”丰迪基拉否认这个指控，被释放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他退出坦

盟，说他对坦盟的一些基本政策不同意。两年之后，他又重新入党，随后担任东非航空公司的主席。

一九六二年二月坦噶尼喀议会复会，前总理尼雷尔也坐在普通议员席中。政府立即宣布它赞成把土地所有权从自由保有权制度改为租借权制度的立法——几个星期后，尼雷尔把这一概念详尽地描述在一篇题为《乌贾马》（“家族”）的文章中，他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其他许多想法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说明。尼雷尔写道：“在非洲，我们一直认为土地是属于共有的。”人对土地，“只有使用的权利；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权利，也从来没有想过或要求占有一块土地……外国人引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把土地变成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可以要求占有一块土地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不管他是否打算使用它。我可以买进几平方英里的土地，称它为‘我的土地’，然后撇身到月球去了……这种制度不但对我们是不适合的，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无条件的或‘自由保有’的土地所有制，必须加以废除，因为它导致投机和不劳而获的思想。”

以后不久，政府宣布了新共和国宪法的细则，这部宪法将在独立一周年时施行。根据新宪法，总统由普选产生；然后由总统任命一位副总统，后者还将主持国民议会或议会。卡瓦瓦说，有了一位不是代表

女王的总督而是民选的总统，就能“提供新的效忠的中心，”也“更能激发人民的忠诚感。”伦敦的《每日快报》惊呼，“在坦噶尼喀出现了独裁的样板，”而且还有广泛的批评说，授予总统的强大权力可以导向极权主义，尼雷尔回顾他所受的英国教育，向议会说，“人民自由的根本保障是国家的道德。”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国家的道德，它能使政府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非坦噶尼喀的，”也可以使人民说，“我们不能容忍，这是非坦噶尼喀的。”尼雷尔说，没有这种道德，“不论如何制订的宪法，都不能保证人民不受暴政的侵害。”至于竞选运动，他对议会说，“这不是非洲的传统习惯。这有骄傲、虚荣，有时还有冥顽的味道。一个人站在公众面前自吹自擂——这是可耻的事情。”

尼雷尔必将成为坦盟的总统候选人，这是早已得出的结论。他把竞选和他对坦盟的工作结合起来，只留宿在那些承担自力更生工程项目的农村。十一月的选举中，他得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的选票。此后不久，一位美国访问者问他，他得到这么高百分比的选票是否感到出乎意外。他不客气地回答说：“为什么？如果我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也不会感到惊奇。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我对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政党也并不感到惊奇。你们会

说，‘我们必须赢得战争，把那个愚蠢的英王乔治赶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结一致！问题是，我们应当让三千英里之外的一位君主来领导我们吗？’我们坦噶尼喀人要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笑肯尼亚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独立前一年，两个大党发生冲突。“我们对肯尼亚人说，‘你们不懂得轻重缓急——应优先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团结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民主的想法是来自西方的。在我面临着坦噶尼喀的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对两党制发生过怀疑。民主政治非有两党制不可吗？我说用不着。我们用不着为了意见分歧而站在乞力马扎罗山上吵架。”

前一年，尼雷尔对民主政治中一党制的意义考虑了很久。他告诉他的同事说：“在这种基础上举行选举是多么荒谬啊，因为事实上人民并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这不是民主政治。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一位朋友回忆说：“他起了一个草稿，加以推敲，这样继续了好几个月。”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选举之后，尼雷尔宣布全国执行委员会已经通过，要求党的全国大会对非非洲人开放党籍，对一九五四年以来所有被坦盟开除的人予以“全面的政治上的大赦”。他谈到过去不吸收非黑人入党的政策时说：“那时我们不是种族主义

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都是为了争取我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坦噶尼喀的非洲人。我们的目的是组织上的种族主义，政策上的非种族主义。”他说，但是这个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造成一种困难；那一年，党决议对任何一个混血的坦噶尼喀人都是可以接纳。一九六三年初，亚洲人阿米尔·贾马尔成为坦盟的第一名非黑人党员，以前的英国人德里克·布赖森成为第二名。

尼雷尔解释说，至于其他变革，过去许多党员因为他们没有支持坦盟候选人而被开除出党，但是党认识到在一党制下，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识到在坦噶尼喀，你不可能在坦盟和另一个组织之间进行选举，而只能在坦盟党员之间进行选举。”

可是，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的普选之后，西方对坦噶尼喀一党制的批评才开始平息下来。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曾说，“那时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要统治象坦噶尼喀这样一个国家，一党制是自然而正确的途径。怎样才能有两个政党呢？如果他们发展不同的经济纲领，十年之后也许可能有。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以及提高人民的水平。”正如尼雷尔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在一本名叫《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小册子中所写的，关键问题是象坦盟这样的党，“不是为了向我们自己人中的任何统治

集团挑战而建立的；而是为了向统治我们的外国人挑战才建立的。所以他们不是政党，或派别，而是民族主义运动。”

这个国家在以后的阶段会不会发展成为两党制呢？尼雷尔在一九六四年说：“这不一定会发生。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多党制的国家，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我们否认只有两党制才成其为民主政治这种概念。自由的哲学概念不是力学问题。”他也不接受西方朋友们的看法，他们“体谅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要经过一个不民主时期”。他还说：“但是注意，兄弟，这样说是不对的。即使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容许不民主。”

一九六二年末，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位英国居民说，“我必须承认，我很不了解这种安全狂。”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写道，“那种要求达到全国团结的强烈愿望，已导致政府实行过分严厉的预防性立法措施，甚至把老鼠的叽叽叫也都看成是反抗的表示。”看来那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坦盟的反对派，充其量也不过只有几个和坦盟意见不合的工会领导人员和一两个小政党。一九六二年，政府还竭力使议会通过一项劳工法，实际上是禁止罢工；并通过了一项预防性的拘留法，凭一张紧急法令证明，政府就可以不经审讯监禁任何一个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

人。尼雷尔说：“我们觉得虽然这个国家太平无事，它的根子实在是扎得不深的。”几个月后，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知道，这项法律在一个蛮不讲理的政府手里，可以成为一种很方便的镇压工具。问题是，民主政府只在它认为是非常必需的时候，才行使这种预防措施的权力。英国在战时有过这类规定，印度也有这样的规定，而且最后还付诸实施。我们希望我们对危险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不想运用这项激烈的法令。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有五百英里长的海岸线，并同七个国家接壤。而我们的陆军只有一千一百人。一千一百人！我们的安全在全能上帝手里！我没有钱去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或庞大的警察部队。但是我可以把这条法律编进法令全书里。这是一种保护措施。我认为它已起了一些良好的作用。”

公务人员的“非洲化”已在进行中。独立以来，有好几百名英国文官都是腰包塞得满满地离开了坦噶尼喀——退職金多达每人一万英镑。到一九六三年底，约有半数的高级和中级职位已由非洲人担任，但还有很多缺额。很多非洲人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因为没有熟练的非洲人可用，便雇佣了许多欧洲人来填补高级的和技术工作的职位，这些新来的人都订的短期合同。

独立以来，工会领导人要求加速非洲化。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头头克里斯托弗·图姆博曾威胁要举行罢工；他在议会里称白人公务人员为“外国雇佣兵。”一九六二年四月，也许为了把他从国内政治舞台上调开，政府派他去伦敦担任坦噶尼喀的新的的高级专员。但是他在八月辞职了，暗示他用不着为了谋生而工作。图姆博回到坦噶尼喀后，开始组织他自己的政治集团“人民民主党”，但在十一月底，他越过国境去肯尼亚的蒙巴萨，在那里为一家水泥厂当新闻宣传员。

另一个反对党是非洲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是祖贝利·姆滕武，他于一九六二年一月指控尼雷尔阴谋“引导新殖民主义”进入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这意味着姆滕武不满尼雷尔在种族问题上采取温和政策。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宣布一项包括“冷、温、热”三个阶段的计划，要使坦噶尼喀在一年之内建成一个“纯粹非洲人的政府”。有好几个月政府禁止非洲国民大会党举行集会，但在十一月大选时取消了禁令，在大选中姆滕武是尼雷尔的主要反对派。姆滕武获得了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六票，而尼雷尔获得一百十二万七千九百七十八票。几天后，姆滕武要求重新参加坦盟。坦盟的一个声明说，“选举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我们的人民拒绝和种族主义发生任何关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庆祝共和国成立的仪式，同一年前宣布独立时很相似。在国民议会里，一位担任守卫的非洲人执着权杖，大声喊着“议长先生！”走进了会议室。他的后面跟随着戴假发的议长和审判长，最后总督在十九响礼炮声中走了进来。他向议会致告别辞，然后宣布议会闭会。午夜的仪式，有奏军乐，放焰火，学校儿童列队走向前去，把象征贫穷、愚昧、疾病的纸制的龙杀死。现在已是总统的尼雷尔搬进了国家大厦。

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全部用来解决国内问题；第二年的重点——除了到西德、美国、加拿大、阿尔及利亚、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几内亚和尼日利亚进行了一系列的国事访问外——是处理非洲事务。尼雷尔嘲笑现在的非洲边界“在人种学和地理上都是荒谬的”；“在非洲地图上随便什么地方划一条边界线，那一定是违反历史或人民的未来需要的。”一九六三年二月，他在莫希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争夺非洲’中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二次争夺非洲’的阶段……刚果发生的事件证明，一个殖民国家从前门出去了，但同样的殖民国家或另一些外来势力又可能从后门进来……”他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上对代表

们说：“真正最丢脸的事实是，非洲还没有解放；所以非洲应当采取必要的集体措施把非洲解放出来。”

六月，尼雷尔在内罗毕同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和乌干达总理密尔顿·奥博特会谈：三个人宣布他们已同意在年底前建立一个东非联邦。尼雷尔说：“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创立一个整个非洲大陆政府，但我们可以东非开始。”但那些旨在为奠定联邦基础的会谈，到了部长一级就破裂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尼雷尔把组织联邦的失败说成是这一年中使他最感失望的事。

有些观察家推测，一九六三年六月宣布成立联邦是一种别有用心企图，目的想诱使英国政府提前肯尼亚的独立日期；肯雅塔事实上有一次作过那样的暗示。一位从前的英国外交官说，“如果这是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英国渴望肯尼亚独立不亚于东非人。”但是坦噶尼喀坚持说这并不是这次会谈的目的，肯尼亚代表中至少有几个人（特别是已故的汤姆·姆博亚）也同坦噶尼喀人一样，是决心要建立联邦的。

肯尼亚和桑给巴尔都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宣布独立。

这之前的七月，尼雷尔说过：“如果你不相信人类平等，你就离开这个党。那些不相信人类皆兄弟的

原则的人，还是把他们的党证烧掉的好。”他说，非洲人化——把工作优先给予坦噶尼喀黑人的政策——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但对纠正过去的的不平等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尼雷尔在一次紧急的重要动议中宣布政府的两年非洲化政策已告结束。他说，从此以后，任何种族的坦噶尼喀公民在担任政府工作方面都具有平等资格。“除担任具体工作的品质和能力以外，用其他任何理由继续在坦噶尼喀公民中间作出区别是错误的。我们不允许产生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我们采取这种行动不是为了棕色皮肤的人或白色皮肤的人，而是为了坦噶尼喀。”

他这个声明遭到坦噶尼喀工会领导人的严厉抨击，也不幸被坦噶尼喀步枪队的人所误解。这是尼雷尔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严重危机的序幕。

就在这段时期，四天之后，离开坦噶尼喀二十四英里外的桑给巴尔爆发了革命。

第七章

据尼雷尔的朋友回忆，长时期来尼雷尔为桑给巴尔岛靠近坦噶尼喀大陆而感到担心。几年前他说过：“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岛拖到印度洋中间去，我一定这样做。”独立前一两年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次宴会上，他曾说，他认为在今后坦噶尼喀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将是桑给巴尔。那时他说：“不，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个外国君主国，它的臣民在涉猎政治。它很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我担心它将是我们的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如果尼雷尔的朋友对这个预言有怀疑的话，部分的原因是那几年来桑给巴尔城只象一幅华丽而古老的布景，这个遗址的辉煌而不幸的历史已经把它遗忘了。此外，这个英属桑给巴尔保护国，虽由两个主要岛屿即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组成，但人口总数只有三十一万九千人，面积只有一千零二十平方英里，同邻近的东非洲大陆领地相比，是很小的。桑给巴尔岛是两岛中较大的一个，长五十三英里，最宽的

地方是二十四英里。

但是在大陆上的人看来，桑给巴尔对他们的威胁一向比它的幅员所具有的要大。早些时候，岛上的阿拉伯人常说，“当桑给巴尔吹起笛子时，大湖之东的整个非洲一定会跳起舞来”。这是骄傲的自夸，但倒也是正确的，因为桑给巴尔是一个基地，阿拉伯奴隶贩子和商人用三角帆船从这里出发到大陆海岸的巴加莫约，再从那里结队去中非的大湖地区。桑给巴尔是东非阿拉伯暴政的中心和象征，大陆出口货——犀牛角、象牙和奴隶——的市场和航运站。也是大探险家伯顿、斯皮克、利文斯敦等由此出发向内陆进行探险的据点。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古代起就来过这个地方了，葡萄牙人于一五〇三年加以占领，阿曼的阿拉伯人则于十七世纪夺取了它。阿曼的统治者赛义德·萨伊德·本·素丹，于一八三二年把他的首都迁至桑给巴尔，他带来了丁香花，成为该岛的主要出口作物。他还带来了素丹领地的红旗，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为止作为桑给巴尔的旗帜。到十九世纪末，德国人探查和并吞了曾被认为是素丹的大陆领土约六万英里。面对着海峡对面一个侵略性的欧洲强国作为邻邦的前景，桑给巴尔的素丹于一八九〇年情愿接受英国的保护。

在桑给巴尔作为英国保护国的七十三年中，它的领土包括沿着肯尼亚海岸的一块五十二英里长、十英里宽的狭长土地，包括蒙巴萨港在内。这块土地由肯尼亚管理，但仍然是素丹领域的一部分，桑给巴尔政府可以每年收取一万一千英镑的租金。

桑给巴尔的衰落和奴隶贸易的逐渐废除是一致的。一八七二年素丹领域内的奴隶贩卖被禁止了，但这个岛上阿拉伯人的丁香种植园依然靠奴隶进行工作。一八九七年，所有“愿意申请”的奴隶都被解放了。到了一九六三年独立这一年，除英国圣公会大教堂仍屹立在奴隶市场的遗址上象个奴隶制度受害者的纪念品外，很少见到奴隶制度的遗迹了。这时桑给巴尔已经变成一个幽雅宁静、风光明媚、丁香和其他香料芬香扑鼻的地方，它有个珊瑚海滩和翠绿发光的棕榈树，以及一些古代王朝的断垣残壁的遗迹。年老的阿拉伯导游者引导旅客观看华丽的“奇观大厦”、戴维·利文斯敦曾花了几个星期准备最后一次探险的居处和海堤旁边的“欢乐花园”。一个睡眠着的世界，或者看来是这样。这个地方的英国文官穿着热带地方的短裤工作到中午，然后就把长长的下午花在海边航行游览和其他消遣，晚上则到英国俱乐部去消磨时间。但是即使在那时也已出现了一些凶险的预兆。例如，一九六一年选举时发生了暴

动,有七十个人被杀,其中六十四人是阿拉伯人。

对一个访问者来说,要分辨阿拉伯人和桑给巴尔的非洲人是不容易的。岛上三十一万九千居民中,六百五十名是“欧洲人”——大多数是英国人,极少数德国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二万名是“亚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果阿人;五万名被列为阿拉伯人;其余是黑非洲人。有些人自称是古时已到达此地的波斯人后裔的设拉子人。关于阿拉伯人,只有少数或多或少是纯血统的,并且实际上象《一千零一夜》里出现的那样。但是大多数同非洲人一样黑。一位英国居民那时曾解释说,“当地居民是这样区分的,凡是属于阿拉伯协会的会员或一度曾属于该会的,都列为阿拉伯人”。

桑给巴尔共有三个政党。最老的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它于一九五六年由阿拉伯协会会员创立。它的党员很多是非洲人,但是它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实际上岛上所有阿拉伯人都加入了这个党。这个党效忠于素丹,并且把他的红旗作为党旗。这个党的领袖阿里·莫辛,以前是一个公务人员,而且是受过教育的。他多少也是个阿拉伯感情主义者,传说他主张与索马里、苏丹和埃及建立一个松散的穆斯林联盟。他反对与东非联合的任何想法。他的“桑给巴尔将不成为坦噶尼喀的一部分”的

声明,对许多桑给巴尔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组织包括大部分桑给巴尔受过教育的人;主要为了这个原因,英国人很明显地赞成这个党而不怎么喜欢它的对手。

在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内,还有一个聪明而又年轻的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巴布的左派人物,他在伦敦消磨了五年后,于一九五七年回到桑给巴尔。他成为这个党的总书记,并且是该党青年一派的组织者。他曾去过中国和苏联旅行,成为由新华通讯社支持的小型报纸《桑给巴尔新闻》的编辑。一九六一年的骚动使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领导人受惊,他们派了几批巴布的青年派党员到古巴去受军事训练,以备一旦再有骚动,他们将能保卫自己。

一九六二年,巴布因为在《桑给巴尔新闻》刊登一条新闻犯了诽谤罪,被监禁十五个月。在他于次年被释放后不久,为了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对他领导的青年一派在该年选举中应分配多少议会的席位的问题,同莫辛发生了争吵。因此巴布辞职,率领他的青年一派另建“乌玛”(“群众”)党。这时许多年轻党员已由古巴回国,象“要桑给巴尔,不要美国佬”等标语,开始神秘地出现在美国领事馆这类地方的墙上。这种共产党的政治鼓动与桑给巴尔传统的念咒催眠

不大可能的结合，使西方外交家认为，“好象这个奇异乐土的一部分已经滑离了它的停泊处。左翼阵线在这里只有极少数人。”

英国当局于一九六三年试图吊销他的护照，来减少巴布到海外进行政治活动，但是机智的巴布用独木船划到大陆，说服坦噶尼喀人，给了他一张临时护照，并去伦敦出席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解决了桑给巴尔的宪法细则。之后他访问了北京，于独立后不久回到了国内。

桑给巴尔的第二个主要政治组织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非洲一设拉子党”。这是岛上的黑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政党，同大陆上的坦盟之类的政党有联系。它的主席是阿贝德·卡鲁姆，他是个高大、魁伟、没有受过教育的码头工人和船员联合会的职员，他的祖先来自尼亚萨兰。另一个领导人是卡鲁姆的敌手，名叫奥斯曼·沙里夫，他是麦克勒里学院的毕业生和兽医。第三个领导人是卡齐姆·汉加，一九五八年有一个短时期他和奥斯卡·坎博纳在伦敦同住一个公寓，后来去莫斯科学习。一九六一年他回到桑给巴尔，任该党的代理书记。这个党因为缺少受过教育的领导人，遭到严重的困难。一九五八年一个英国工党党员在会见这位魁伟的、令人讨厌的汉加之后说，“如果他是非洲一设拉子党的一个领导

人，非洲一设拉子党就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党。”

但是非洲一设拉子党显然是桑给巴尔最得人心的政党。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选举中，非洲一设拉子党得到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九，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得到百分之三十五。但是在立法会议中，每个党都获得十席。剩下来的三席由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取得，它获得选票的百分之十三点七。在卡鲁姆同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领袖穆罕默德·沙姆特之间发生了个性不合的冲突后，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于四年前背弃了非洲一设拉子党。这是沙姆特自己在一九六一年破坏这个关系的。这个狡猾的、年老的沙姆特，在立法会议中投了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票，因此使该党得以组织政府。沙姆特对于他的合作提出要求，并得到了优厚的报酬，结果他成为首席部长。

非洲一设拉子党人对选举的结果甚为愤怒；他们觉得由于英国人的纵容，他们的胜利被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素丹夺去了。素丹作为一个立宪君主，被认为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他的以爱好跑车和快艇比赛而闻名的年轻儿子詹希德，曾公开支持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一位英国外交官于一九六三年七月评论说：“这时素丹已无多大用处，如果他有用的话，他就不可能留下来。”

不到一个月，赛义德·西尔·阿卜杜勒·本·哈里发素丹突然逝世，由他的儿子詹希德继承。詹希德的素丹地位仅仅维持了六个月。

非洲一设拉子党人和他们在大陆政府中的联盟者曾敦促英国当局改变选区，以保证获得最多选票的党领导桑给巴尔走向独立。选区重新划分了，非洲一设拉子党人认为他们将是此举的受益者。奥斯曼·沙里夫说：“我可以肯定，我们将获得十七个席位”。但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在几百名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监视下举行的选举，再次产生了一九六一年的僵持局面。非洲一设拉子党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五十四，但只取得十三个席位。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与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一共获得十八个席位，因而沙姆特成为总理。在九月于英国兰开斯特大厦召开的会议上，英国试图说服沙姆特成立一个包括所有三党的国民政府；但是沙姆特拒绝了。

独立庆祝典礼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晚上举行，有七十个国家的显要人物参加，包括爱丁堡公爵和阿加·汗，但东非国家的领导人一个都没有参加。沙姆特说：“我们认为‘乌胡鲁’（解放）并不意味着分赃，也没有什么赃可分”。对很多桑给巴尔的非洲人来说，这个庆祝典礼被称为阿拉伯独立日。

总理沙姆特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神经过敏的。

他们没收了几个反对党领袖的护照，据说对非常忠于素丹的许多曼加阿拉伯人发给武器。他们还加速警察的桑给巴尔化，过去警察队伍主要由大陆的非洲人充任，包括许多来自坦噶尼喀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的马康迪族人。现在这些被解雇的警察仍旧留在岛上，失业和感到失望。

后来，在一月初，政府取缔了乌玛党，看来即将逮捕巴布，但巴布逃到了达累斯萨拉姆。后来他解释说：“那个星期我被指控拥有一件武器。这是一支很旧的枪，是我的孩子从花园里发现的。两星期前，我作过一次演讲，他们说我曾攻击〔素丹的〕王位。我听说他们企图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构成叛国的罪状。他们打算在星期四清晨四时逮捕我。但我认识的一个警察把内情告诉了我，所以我去达累斯萨拉姆聘请律师。我不愿在那里被捕而没有一个律师为我辩护。”巴布的三岁女孩，在几天前被汽车撞死，谣传警察希望在这个孩子的葬礼结束时逮捕巴布，但他没有出场。

非洲一设拉子党的一些领导人自巴布在上年七月从民族主义党辞职后，同巴布紧密合作，深信政府在他们搞掉了乌玛党的领导后将逮捕他们。同时，在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层内部，即在沙里夫和卡鲁姆之间，发生了一场险恶的斗争。沙里夫攻击卡

鲁姆“完全失败”，要求他辞去党的领导职位。还有谣传说，沙里夫正在同总理沙姆特（刚巧是他的内弟）商量，可能组织一个新的联合政党。

一位前英国文官谈到桑给巴尔时说：“我们都在推测，还要多久才会出事。我猜测将于一九六四年的第二季度发生。部长们已决定不承认乌玛党，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青年分子也说过，‘对，下一步我们将是他们的障碍了。’”

“就在这之前，部长们都很过敏。有人认为使用弓箭的马康迪族人正在策划阴谋。这使当地人吓得惊慌失措。后来部长们认为炸弹已运到北部。我认为我们正在捕风捉影。或者这可能是一种烟幕——用来诱使部分军队离开城市。我们早就催促部长们同英国人商订一个防务协定。一旦发生麻烦，东非大陆国家将明显地成为援助的最好来源了；但是桑给巴尔政府不能得到这种支持。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必须修补你们的篱笆’”。

詹希德素丹很久以后说：“星期六〔一月十一日〕一个朋友告诉我，‘今晚或明天将有骚乱。’我已经计划去猎野猪。我召见了一位部长并且告诉了他这件事。你知道，远离中心地区的人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曾处于危险境地，那时七十个人被杀。他向我保证，一切很好，平安无事。”

那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巴布说过：“星期五我在达累斯萨拉姆从某个非洲一设拉子党的党员处听说，很快将要发生一些事故。可是你知道，你是经常听到这种传说的。但我认为这一次可能是真的。”

尼雷尔后来说：“问题全在于此。非洲一设拉子党是一个群众运动。〔在早些时候〕我不断劝英国人去做我深信他们会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做的事情。”他说，很明显，他们会向大陆上非洲人的多数人统治屈服。“但是我继续说，我对桑给巴尔很担心。这正是他们的英国人的作风，他们将觉得如果他们把桑给巴尔交给素丹的话，他们才是履行他们的职责。我说，‘是的，当然我们准备同一个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政府打交道——但是桑给巴尔人民不会接受这个政府。’

“我曾对美国人说，‘注意，请你们告诉英国人：他们必须在桑给巴尔实行据我所知道的他们打算在东非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他们一定不能在桑给巴尔搞什么鬼！’〔伊恩〕麦克劳德是一位英国领导人，他懂得我讲的话。我想，这很好。不久，他辞去了殖民大臣，我们只好回过来再去找〔邓肯〕桑兹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桑兹就在这个办公室。我说，‘我们当然将和他们的无论哪个政府合作，但是我们不相信民族主义党人能在选举中获胜，如果你们不

捣乱的话’。他模仿桑兹的柔和的、施恩的语气说：‘尼雷尔先生，你为什么不喜欢素丹呢？’他说，‘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对这块肯尼亚沿海的狭长地带，我们没有充分根据的合法权利。素丹同我们非常好。他只要求肯尼亚政府照料那里的他的公民’。我说，‘很好，桑兹先生。如果你们在肯尼亚海岸没有合法权利可以坚持，你们在桑给巴尔也就没有合法权利。为什么你不让他退休？’

“现在还来得及！”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午夜，即在为纪念可兰经第一次启示的穆斯林斋戒月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事情发作了。狭窄的街道麇集着城市居民，非洲一设拉子党人正在拉哈莱奥公共会堂跳舞。尽管充满节日气象，许多桑给巴尔人心情不安；有位朋友告诉一个非洲人说：“早些回家，今夜好好酣睡吧”。深夜在姆托尼机动部队的军械库值勤的野战警察，被从四英里以外召来市区，以阻止某种暴动。这个命令可能是根据真实报告而作出的，但更可能是使警察离开营地的一种策略。

午夜过后一些时候，一队人攻击和制伏了郊外的齐瓦尼的警察军械库的卫兵，然后在姆托尼军营缴获了几百支机关枪和自动步枪。齐瓦尼和姆托尼都于五时失陷。六时，仅存的真正抵抗来自近桑给

巴尔港口的马林迪警察所。詹希德素丹后来说：“那晚我没有睡着。大约一时半我听到枪声。九时左右他们叫我起来，说一切都完了，要我在十分钟内上船。”在马林迪警察所的保护下，詹希德和他的随行人员逃上了“萨拉纳”号轮船，后来转移到桑给巴尔海峡的素丹游艇“赛义德·哈里发”号上。

一两小时前，沙姆特总理曾请求英国高级专员派部队到桑给巴尔来镇压这次起义。正如后来一位英国外交官描绘的，这是“有点歇斯底里的请求”。他还说：“当然，桑给巴尔和英国之间没有防务协定。皇家政府是完全没有义务的。不，英国从来不想对一个不复存在的政府的请求作出反应。”沙姆特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得到任何东非国家的支持，因为这将涉及到使用非洲军队在一个非洲国家使一个阿拉伯政府复辟。沙姆特也曾派一架小飞机到奔巴岛去取武器，但在飞机回来之前，到机场的公路已被封锁了。星期日下午二时十分，东非沿海的无线电报务员听到桑给巴尔的飞机场指挥塔上的信号员说：“情况严重。一辆装有三十个人的大卡车刚刚开到。一队武装人员就驻在下面。我将下去同他们会见。”达累斯萨拉姆的报务员回答说：“祝你运气好。”桑给巴尔政府在这个国家独立后的第三十四天就垮台了。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是起义者。到了星期日下午，桑给巴尔的一个大使馆称之为非洲一设拉子党的一次接管行动。另外的报告则说：“非洲一设拉子党提供了人员，乌玛党是策划者。”星期日晚上，一个在桑给巴尔电台自称是“陆军元帅”的人用斯瓦希利语宣称，非洲一设拉子党和只成立了三个月的乌玛党，将组成一个新政府。他说，桑给巴尔已宣布成立共和国，总统是非洲一设拉子党领导人谢赫·阿贝德·卡鲁姆。非常奇怪的是，他还号召卡鲁姆“回来就职”。

翌日，这位陆军元帅向电台听众介绍他名叫约翰·奥凯洛，这个名字以前在桑给巴尔政界没有听到过。他宣称，素丹已被终身放逐了，他的宫室和财产已经充公。“他永远不能再踏上我们的国土”。在各种植园中广泛开展的战斗的报道中，这位陆军元帅要求坦噶尼喀政府派一架装满药品的飞机来，并号召护士们回到她们的医院去。

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正在东非作友好访问的一艘美国驱逐舰“曼利”号，被派到桑给巴尔来接载一个美国地球卫星追踪站的雇员。星期二早晨，“曼利”号开到达累斯萨拉姆，载来了九十九名撤退人员，其中包括五十三名美国人。“曼利”号上的两个荷兰学生说，他们相信一个戴绿色便帽和自称是“波斯人”的起义领袖，实际上是古巴人。有些人认为他们听

到他讲西班牙语。整个星期中，许多从岛上来到坦噶尼喀的人带来了同样的报道，使早些时候报纸上头条新闻的说法，即桑给巴尔一夜工夫变成“东非的古巴”又甚嚣尘上。甚至一位来访的美国外交官也声称曾与一个“肯定是讲西班牙语的人”谈过话。但是谁在负责呢？卡鲁姆从战斗一开始，至少一度离开了这个岛；巴布则整个时期都在达累斯萨拉姆；并且人们也没有听到过奥凯洛的活动。

每天晚上，这位陆军元帅发表令人不快的讲话。他声称：“我将采取严厉措施。更加严厉八十八倍的措施。不准离婚。任何一个离婚者将挨打六十五下。素丹是个魔鬼。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都是魔鬼。你们拒绝这些魔鬼吗？”另一天晚上他叫喊说：“这是我陆军元帅在讲话。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怎样把人吊起来，象烤小鸡一样烧炙他们。其他人将被切成一块一块，撒在街上。有些人将被投入海里，还有些人将被绑在树上枪毙。试图做伪君子的任何人将被判刑五十年。任何抢劫的，即使抢劫一块肥皂，也将被判刑八年。我能一小时制造一百颗手榴弹。”他对一个叫做哈鲁西的阿拉伯人发誓说：“把你自己和你的儿子们杀死，否则我们将为你做这件事。”

星期一，卡鲁姆向他的同胞呼吁和平。星期二，奥凯洛说，四个前任部长将被绞死。星期三，卡鲁姆

反驳他说：将不存在什么绞死和报复的事情。星期四，卡鲁姆同巴布和汉加飞到达累斯萨拉姆，怂恿尼雷尔承认他的政权，并提供若干大陆警察来协助恢复秩序。奥凯洛显然不知道卡鲁姆的行踪，说是他使卡鲁姆当上了总统的，卡鲁姆并未参加这次起义。那天晚上，他宣布他自己是总统，卡鲁姆是副总统。后来，他否认他曾作出这一声明。

这时，东非充斥着关于奥凯洛的互相矛盾的谣传。有人说他在古巴受过军事训练；有人说他以前当过桑给巴尔的警察。但大家都一致认为，他讲斯瓦希利语，有大陆口音，他的启示录语言具有《旧约全书》中发狂的先知的奇特品质。

星期四下午，革命的第五天，奥凯洛到达他的总部，在这座粉成黄色的电台所在地和拉哈莱奥会堂里面，非洲一设拉子党曾于上星期六晚上举行过跳舞会。在会堂前面，紧紧围住几百人，肩上钉有黄色或绿色的布块，大概表示他们是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漫不经心地摆动着步枪。在前门，两个妇女对访问者摇晃着枪枝和小刀。隔壁一个匆匆地临时办起来的营地，好几十个受惊的纯血统阿拉伯人被拘留在那里。当这位着了黑色制服的陆军元帅来到时，群众欢呼着，同他握手，并高声呼喊，“共和国，共和国！”

在楼上，奥凯洛在他一天要广播几次的电台播音室不远的地方，接待来宾，通过译员的帮助，相当详细地和兴致勃勃地作自我介绍。同他的广播讲话一样，他的话带有梦幻的性质；但同他的广播不同的，除了他提到阿拉伯人外，他的话是率直而没有怨恨的。他说，他二十七岁，乌干达的兰戈族人。他迁到肯尼亚，为茅茅运动服务了三年，因为“我有解释梦的本领”，很快升为旅长。他说，五年前他从肯尼亚迁到奔巴岛，成为一个房屋油漆匠，对非洲一设拉子党的政策感到兴趣。他说，他自己策划了这次革命，用木棒当作枪，来训练农村地区的一小队一小队人。他说，“我所以发动这次革命，因为我听说阿拉伯人在屠杀穷苦的非洲人。”他说，最初的进攻使用的是砍刀、小刀、弓和箭。他声称，星期日晚上他没有同卡鲁姆和巴布商量，就提名新内阁，并且含蓄地说，他不大喜欢巴布。奥凯洛说，他甚至事先没有把这次革命告诉卡鲁姆，以免卡鲁姆企图阻止他。

他漫谈了其他问题。他的新政府将是“完全民主的，不倾向任何家伙(bloke)。”或者他的意思是说倾向“任何集团(bloc)”吧？^① 他的访问者大笑起来，他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在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他

^① 把“bloke”与“bloc”念同音了。——译者

最钦佩谁呢？邱吉尔和赫鲁晓夫。他从未访问过古巴或海外别的地方，他坚持说：“我从未有足够的钱到尼亚萨兰（现在的马拉维）去。”这不是一个没有理由的说法，因为很多非洲血统的桑给巴尔人是从尼亚萨兰迁来的。

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但是访问者离开时得到两个印象。第一，奥凯洛看来明显地得到巡逻于拉哈莱奥周围的一支非职业性的小型军队的支持。不过在桑给巴尔旅馆外面的受过训练和穿着制服的青年人却是另外一种人，对他们来说奥凯洛的名字是无所谓的或毫无意义的；这些人都是巴布的乌玛党党员，他们留着胡子，戴着便帽，偶尔讲些西班牙语，是在星期日早晨才参加革命的。第二，奥凯洛似乎相信他所说的话。关于他参加茅茅运动的经历是奇特的，尤其他作为一个乌干达人，既不是吉库尤族，又同吉库尤族没有密切关系。但是谁能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个解释梦的人能够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打进茅茅运动吗？

星期四的情况有些复杂化了，因为有七位新闻记者——四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乘三角帆船从巴加莫约非法地来到这里。就在这同一天，卡鲁姆、巴布和汉加飞到了达累斯萨拉姆，吁请尼雷尔予以承认，并要求他给以帮助。显然

他们获得了成功，因为一两天之后，第一批三百名坦噶尼喀野战警察开始到达。年轻的美国代办弗雷德里克·皮卡德，同和蔼可亲的沙里夫在下午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新闻记者事件，他们都被拘留在桑给巴尔旅馆内。对皮卡德来说，沙里夫被任为新政府的教育部长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为沙里夫最近还同卡鲁姆为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问题公开斗争过。在夜幕将临时，皮卡德、沙里夫和几个新闻记者，已坐在桑给巴尔旅馆休息室的角落里在喝啤酒了。

忽然魁梧的卡鲁姆同他的六位革命同志，愤懑地大踏步走进这个房间。他站在皮卡德前面，用不流利的英语咆哮说：“为什么你找我们的麻烦？为什么干涉我们的事务？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就撤退你们的人？为什么你们不承认我们？”皮卡德温和地抗议说，他曾通知过桑给巴尔人要撤退美国公民，但是卡鲁姆继续责骂。他的一个较年轻的副官阿卜杜尔·阿齐兹·特瓦拉急忙也骂上一句说：“我们已经浪费够多时间了。我们不需要美国人。”于是卡鲁姆向皮卡德大声说：“你访问了我们的部长，干预了我们的事务。二十四小时内从这里滚出去——不，十二小时内。”皮卡德在后面追住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带领我的工作人
员离开这里吗？”卡鲁姆回答说：“回到你们的房子里

去，不要离开。”卡鲁姆大踏步走了出去，皮卡德被革命士兵带走了。

卡鲁姆在那时发怒的真正原因，从来没有人解释过。皮卡德同垮台的政府有过密切关系，而且还同卡鲁姆的政敌沙里夫很友好，这都是事实。据信皮卡德在本周初撤退美国人时——大概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还撤退了同旧政权友好并且曾被美国大使馆雇用的一两个桑给巴尔人。毫无疑问，卡鲁姆对奥凯洛的最近的广播很不舒服，大概还对七位西方新闻记者的来到感到生气。正如后来巴布用开玩笑的话所解释的：“这些记者乘三角帆船到来，并没有适当的证明文件——他们怎么能够那样做呢？要是我们在美国这样做呢？他们会容忍我们用那种办法在美国登陆吗？而且这可能是很危险的。素丹还在近海，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危险，即他可能去奔巴岛并在那里建立政府，我们正试图把他从那一带水域赶走。因此，三角帆船突然装了些外国人到来，他们当然要被指控为间谍，这当然是危险的。”

第二天，皮卡德被宣布为在桑给巴尔不受欢迎的人，他飞到达累斯萨拉姆去了。新闻记者和一些英国侨民在同一天晚上乘英国测量船“欧文”号撤退到肯尼亚的蒙巴萨。革命后五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华盛顿断言，“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形势是无法掌握的。”但是，他对那里岛上有古巴人的报道表示怀疑，并且解释说有人推测汉加可能是受苏联训练的，巴布是受中国训练的，奥凯洛则是古巴训练的自由战士。他说：“如果这些报道属实，那么我们对桑给巴尔发生的事无法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非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来说，这次革命的到来似乎没有什么征兆。尼雷尔预料将来要发生麻烦，但是他显然对这次获得成功的阴谋毫不知情。一两天之后，他告诉一个访问者说，他曾于星期日即武装政变那天召见巴布，巴布说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奥斯卡·坎博纳几年以后说：“这次革命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想也出乎大多数桑给巴尔人的意料之外。”

尽管在桑给巴尔情况混乱，肯尼亚政府于星期一下午，即战斗开始后几乎不到三十六小时，就承认了革命政权。坎博纳于星期日飞到内罗毕和坎帕拉；他从内罗毕打电话给尼雷尔，告诉他肯尼亚和乌干达就要给予承认，并且敦促尼雷尔也这样做。尼雷尔不同意。他说他不能肯定卡鲁姆和非洲一设拉子党是在掌权，并且他不喜欢暴力。朋友们说，奥凯洛的无线电广播内容使坦噶尼喀人担心，进一步导致了推迟。坎博纳还告诉尼雷尔说，肯尼亚已决定

不允许素丹的游艇在蒙巴萨登陆；坎博纳说，他猜想坦噶尼喀也会拒绝他入境的。尼雷尔再次不同意。正如后来事实证明，他不但准许詹希德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本周末在达累斯萨拉姆登陆，并且让他们呆在那里直到飞往伦敦的准备工作完成为止。

据说坎博纳于星期日下午返回达累斯萨拉姆途中，曾打电话给桑给巴尔尚未被革命力量占领的飞机场指挥塔。塔上的信号员说：“你这杂种，六小时之前我们就请求你们帮助。你们的部队在哪里？”

重新明确叙述桑给巴尔的革命事件现在还不可能，因为大部分主要角色仍然有重要理由来隐瞒一部分事实真相。非洲一设拉子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声称曾参加了这次革命的策划。实际上桑给巴尔的官方说法是，这次武装政变是在卡鲁姆指导下由非洲一设拉子党筹划的；这种说法并不重视奥凯洛，因为他的出现产生一种为难情况，并且因为他不是党的领导人员。但在另一方面，正如奥凯洛得到东非出版社的协助，于一九六七年在内罗毕出版的《自传》中所说，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酝酿了这次革命，秘密训练了一小支军队，在最后一星期的准备中得到若干非洲一设拉子党青年团团员的支持，并且亲自领导了这次进攻。

由于事实上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已有两个或者更

多的武装政变正在策划，所以事情更加复杂化了。许多东非的观察家相信，非洲一设拉子党可能得到乌玛党的支持，还可能得到坦噶尼喀的非官方的援助，正在准备于几星期后发动一次武装政变。

现在所能作出的最好判断是，一月十二日的革命是由一批自称为“十三人委员会”的人所策划的。在革命前几星期组成的这个团体，包括非洲一设拉子党青年团的若干团员；其中有青年团的头头塞夫·巴卡里、萨伊德·巴武瓦伊和萨伊德·瓦肖托；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十三人委员会可能也包括优素福·希米德，他在革命后不久成为桑给巴尔军队的司令官。委员会不包括卡鲁姆，可能也不包括汉加；事实上，它不可能包括奥凯洛于一月十二日晚上所宣布的革命内阁的任何成员。它也不包括非洲老资格的警察总监埃丁顿·基萨西，他是革命力量在进攻的夜里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并提升为警察总监的。

这个委员会集结了一支有几百名战士的队伍，他们分成小队，隐藏在灌木林里和棕榈树丛中训练。他们除了砍刀、木棍和弓、箭外，没有别的武器。在招募成员时，领导人着重依靠肯尼亚和坦噶尼喀血统的非洲人，他们许多人是被沙姆特政府从警察部队中遣散的。大陆来的人中间有奥凯洛，他是曾在奔

巴岛住过的乌干达人，在那里事实上担任了非洲一设拉子党的地方支部主席。奥凯洛在桑给巴尔岛至少有四、五个月，可能还要长些，他在那里的的工作是做房屋油漆匠兼石匠。他在岛的东海岸还经营小规模采集珊瑚。他并不出名。

奥凯洛如何在这次革命中一举成名，至少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革命前几天，委员会的领导人招募了奥凯洛，因为他们需要有人能炸毁在姆托尼的弹药贮藏地，如果进攻失败的话；在奥凯洛过去的履历中，据说他在肯尼亚矿山曾使用过炸药。在战斗开始前几小时，有人为了减轻这队人的紧张情绪，问道：“在我们胜利之后你们希望得到什么军衔？”据说奥凯洛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他回答说：“陆军元帅”，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作为一个后来据称曾与肯尼亚的茅茅组织共同生活和参加战斗的人，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回答，因为茅茅组织都是些丛林战士，他们都自称陆军元帅。

第二种是奥凯洛自己的说法，即从上年七月起，他已在训练一小部分自由战士，并于九月同非洲一设拉子党青年团的头头塞夫·巴卡里取得联系，同他们会师。在进攻的那天晚上，奥凯洛写道，我们的人割断了倒刺铁丝网，进入了齐瓦尼营房，那时除三、四十人外，所有的人都因害怕而向后退却。这时

狂热的奥凯洛，自信是受到上帝的召唤，冲上前去，夺取了一个哨兵的步枪，用刺刀把他戳死，从而使起义者得到了“我们革命中的第一件现代武器”。

官方的解释大概是：奥凯洛被政变领导人选作吓唬敌人的稻草人；他们希望他的大陆口音会吓得岛上的阿拉伯人投降，更不必说他的令人生畏的辞令，因为这将使他们认为肯尼亚和坦噶尼喀都是支持革命的。那时在桑给巴尔的一位欧洲人曾说：“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利用奥凯洛来恐吓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人认为他是一个超人的魔鬼。他们都很迷信，他比飞机更能吓唬他们。二十四小时以后，我认为他们不想抵抗了。但是我有怀疑；我不能想象哪个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人会想出这种计谋来。巴布可能会，但他不在那里。”从未声称在开始时参与政变的巴布说，“奥凯洛因为他的口音关系，在革命爆发前不久才被接纳进来的。为的是增加革命的威望。他一抓住麦克风就离不开它了。”巴布说这句话时发出一阵笑声。

为了极力缩小奥凯洛的作用，卡鲁姆本人曾说，“他是为当劳工到这里来的。电台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广播。在革命期间，我们这里没有陆军元帅。”然后他掉转头对着他的非洲一设拉子党同事们，发出一阵会心的轰笑。

证明或者否定奥凯洛作为战场英雄的业绩是不可能的。但把奥凯洛在革命后的权力地位说成是仅仅由于他的广播表演，这很难令人信服。一月十二日前后的某时，十三人委员会扩大为十四人，为了把奥凯洛包括在内。当一月二十五日的桑给巴尔《新闻报》公布革命委员会的三十名委员的姓名时，它先刊载政府的成员，然后刊载以陆军元帅奥凯洛为首的十四人委员会的成员。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起义者的训练和组织都很差。当他们夺得了两处军械库后，就开始抢劫了。他们让素丹逃走，等到战斗开始的十二小时以后才夺取飞机场，并且从未考虑要接管电报局。他们没有从外界得到直接援助，不论是从大陆还是从海外。所谓的“古巴人”，那是巴布的乌玛党的青年成员，他们在星期日早晨的某时才参加进攻。一个目睹最初战斗的英国人确信，起义者未拿下警察的军械库之前，他们是没有步枪或其他现代武器的。他说，“当我们在两日后进城时，我看到路障里的唯一武器是夺自军械库的零点三〇三口径的步枪——用手扣扳机击发，每次可装十颗子弹。我认为奥凯洛有一支‘斯坦’牌手枪，他拿了枪拍过照片。他们有几支自动手枪。所有这些武器都来自军械库。至少两个星期以后，才出现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武器。”

素丹逃走之后，革命党人有好些天担心他将在奔巴登陆，并试图组织抵抗，或者至少呆在那里，企图从英国或大陆得到军事支援。但是詹希德这个看来不爱领导军队的温和沉着的青年人，从未考虑过这种计划，他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奔巴的朋友控制住那个地方。”

卡鲁姆的若干政敌声称，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人事先不知道这次政变，他于星期六晚上某时从岛上逃走，或者因为他不知道谁在领导这次起义，或者因为他不想呆在桑给巴尔，如果这次尝试失败的话。但是，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有两个英国居民——建筑师约翰·卡梅伦和他的妻子，于星期日早晨出发去钓鱼时，不知道晚间发生的事情。他们被城北姆托尼军械库附近的起义者所阻止，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已被用来作为革命总部的拉哈莱奥。他们在那里遇到卡鲁姆，他穿着运动裤和运动衫。他看到他们显出惊奇的样子。他告诉他们说：“我已发出严格的命令，不准拘捕欧洲人，我将安排交通工具把你们送回家去。”

这件事情之后数小时，卡鲁姆事实上乘了一只小船溜到大陆去了。那时战斗几乎已经结束，他离开的原因一点也不清楚。可能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已经成功，或者他被奥凯洛的突然掌权吓倒了吗？卡

鲁姆本人说过：“我到坦噶尼喀去是向尼雷尔解释这次革命怎样发生的。”但是他不能通电话吗？那天早晨电话是畅通的，正如电报也是畅通的那样。他还解释说：“尼雷尔推迟承认我们的政府，素丹则正在请求坦噶尼喀的援助。”但是坦噶尼喀人甚至还没有机会来讨论承认的问题，卡鲁姆反而乘了一只小船离开（有人说是乘了一只独木船），他在惊涛骇浪中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傍晚到达达累斯萨拉姆时已筋疲力尽了。

汉加在新政府的地位最初被宣布为总理，但立即改称副总理，他后来坚持说，坦噶尼喀人事先是知道这次革命的。他说，他在一两天之前已经飞到达累斯萨拉姆，预先警告他的老朋友坎博纳。他还说，以前差不多已举行过两次革命——十二月末和一月七日——但时机都不合适。他进一步说，他和另一个非洲一设拉子党党员阿布杜尔·特瓦拉曾于一九六三年末在坦噶尼喀呆了两个月，由一个坦噶尼喀警察训练他们使用武器。但是没有材料能证明这些细节。如果它们是真的话，可能是指后来于一九六四年某时举行一次非洲一设拉子党领导的政变。

无论如何，汉加也是在星期日离开桑给巴尔到大陆去的。他同卡鲁姆一样，乘了一只小船。后来汉加说，此行的目的是想获得更多步枪。

那天晚上卡鲁姆在达累斯萨拉姆会见了尼雷尔，尼雷尔觉得在岛上还是需要卡鲁姆的稳定影响的，因此催促他立即回去。在桑给巴尔，奥凯洛同时宣布了新内阁的名单，并号召卡鲁姆回去。非常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桑给巴尔官员没有谁记得奥凯洛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奥凯洛自称“陆军元帅”，和“陆军元帅胡尤”——“胡尤”是斯瓦希利语，意思是“这个人”或“某某”——他到第二天才宣布真实姓名。

卡鲁姆和汉加不能飞回桑给巴尔，因为飞机场已经关闭了。他们取得一个名叫米夏·费恩齐尔伯的欧洲人的协助，这个人从事渔业，几年来一向和桑给巴尔的非洲一设拉子党人友好。所以星期一凌晨二时，革命开始后的二十四小时，这伙人从达累斯萨拉姆北面一个叫银沙的小避暑地，登上了费恩齐尔伯的玻璃底小船出发。这次横渡花了六个半小时，因为途中机器发生故障。当他们最后于清晨到达桑给巴尔的基津卡齐时，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跑到海边来欢迎他们。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征用了学校教员的汽车，直驶拉哈莱奥。在那里他们受到陆军元帅奥凯洛的迎接，同他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然后卡鲁姆和他的阁员退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开会。

没有人知道在革命的一周内和随后的不安定时

期有多少桑给巴尔人死亡。“奥凯洛说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他不是这样说过吗？”一个曾在桑给巴尔住过的欧洲人问道。“卡鲁姆说有一千二百人左右，我的推测是在这两者之间。可能是六千人，大部分在远郊地区。”

在公众的心目中，奥凯洛就是流血的象征。一两个星期以后，一位在桑给巴尔认识奥凯洛是房屋油漆匠的英国人，做了一个梦，梦见奥凯洛在油漆英国的一艘新船，不是用的喷漆枪，而是用一支机关枪。

革命十天之后，桑给巴尔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尼尔·拉塞尔最后能够从奔巴岛（他因战争而被放逐到那里）回到桑给巴尔。同舟有陆军元帅奥凯洛，他是衣锦还乡了。这位主教后来回忆说：“他很有礼貌，他要我为他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没有想做把人放在油里煎这类事的意思。’我说，我认为把事情平静下来是时候了，他说，‘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我请他到礼拜堂来，他来过一次；他很平静地坐着。他非常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

第八章

尼雷尔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初的通知中说，他正在结束政府实施已有两年之久的非洲化政策，各族人民从此将有平等的机会担任政府工作。这个通知引起了各工会领导人的一致愤怒抗议。铁路工会答应“不惜任何代价”来反对政策的改变，一个地方政府机关的首脑也指责尼雷尔把国家“倒退到殖民地时代”。他还说：“如果坦噶尼喀以忽视其土生土长的公民来博取外国的尊重，那么我们不要这种尊重。”

在一月十二日开始的这个星期中，尼雷尔全神贯注于桑给巴尔的革命。他星期日晚上在国家大厦会见了卡鲁姆，催他立即回去。星期二，他飞往内罗毕去看望肯雅塔总理。星期三，桑给巴尔的素丹于达累斯萨拉姆登陆，等候去伦敦的交通工具，并在四天后离去。星期四，尼雷尔在达累斯萨拉姆同卡鲁姆进行一周内的第二次会见。很明显，他答应帮助卡鲁姆恢复秩序和支持新政权，因为到下星期就有约

三百名坦噶尼喀野战警察空运到桑给巴尔去临时值勤。虽然那时没有人认识到，他们的离去打乱了达累斯萨拉姆地区军队和野战警察之间的力量（均势）。

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的周末是很平静的，使尼雷尔得以把若干时间用在礼节性任务方面。他在达累斯萨拉姆海员传道会新建的游泳池正式开放后，为墙上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式，并送给阿尔及利亚大使一张三千英镑的支票，作为救济最近阿尔及利亚洪水受害者之用。星期日晚上，他同到达累斯萨拉姆作短暂休息的陆军元帅奥凯洛谈了一次话，劝他开诚布公地同卡鲁姆总统一起工作。

几小时后，即一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一时五十分，坦噶尼喀步枪队英籍司令官帕特里克·肖尔托·道格拉斯旅长，在达累斯萨拉姆北约十英里的科利托军营附近他的住宅里被军号和警报声所惊醒。他穿着睡衣跑到街上，看到他的十二个军官急急忙忙从山上下来到军营去。他后来知道，他们在山脚下被配备有步枪和“斯坦”牌手枪的征募部队所拘捕，禁闭在警卫室里。他的部队的半数——第一营的八百人——已经叛变了。

道格拉斯带了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从家里后门逃出来，在灌木林中走了一英里半，从一个朋友

那里借到了一辆汽车驶往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城市很平静。道格拉斯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安置在澳大利亚高级专员那里，驱车到首都正北奥伊斯特湾郊外的一个部队参谋官家中。他在那里拚命打电话给尼雷尔和副总统卡瓦瓦，但没有打通。于是他打电话给外交和国防部长坎博纳，要他派三架 DC-3 飞机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塔波拉去，把迄今为止他知道仍忠于政府的第二营士兵运来。坎博纳同意了。不久以后，道格拉斯知道叛变者已经封锁了通向达累斯萨拉姆机场的公路，从而把驾驶员和飞机隔离开来了。

道格拉斯担心邮局也被夺占，并担心叛变者会追查他所打的电话，于是他在奥伊斯特湾从这幢房子逃到另一幢房子。当他冲进一幢房屋时，有一群士兵坐着“陆上游览者”牌汽车驶过，对着前门乱射了一阵。道格拉斯立即脱去军装，换上了格子布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从后门闪出，跳过篱笆和墙垣，直接穿过德国大使的住宅，最后抵达英国高级专员的寓所，他在这里躲藏了五天。

尼雷尔好容易才逃脱。道格拉斯曾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后者步行到卡瓦瓦在国家大厦的寓所，并把他叫醒，他们两人一起走到国家大厦。卡瓦瓦回忆说：“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总统离开大厦。他想

留下来同他们争辩。他想责问他们，‘这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干呢？’”(尼雷尔的同事指出，尼雷尔有一次直接走到杜阿利地方印度人骚动的队伍中去，劝说骚动者回家去。他的朋友吓得不得了；后来有一个人同他说：“我的天啊！朱利叶斯，如果一块石头打伤了你，第二天所有的亚洲人都没命了。”“我知道！”他说，“但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

尼雷尔的另一朋友说：“我们跟他辩论，阻止他同叛变者谈话。他的妻子跪下来求他。由于玛丽亚的恳求，他的警卫员协助博克·穆南卡(国家大厦的副官)把他弄进地下室。他的一个警卫员然后缓步走出国家大厦去阻止叛变者。‘这里没有你们要的总统，这里只有你们的部长’，他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见坎博纳呢？’”当争论正在进行时，尼雷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卡瓦瓦正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国家大厦。

总统的弟弟约瑟夫被一个邻居叫醒，这个邻居警告他：“不要到城里去。已经发生了一次军队叛变。”约瑟夫驱车到国家大厦，士兵们阻止了他，并说：“你不能到那里去；国家大厦已被接管了。”约瑟夫同他们说：“好，你们可以接管国家大厦，但是你们不能接管我的母亲，”他把车子开进了大门。他在里面发现他的母亲安然无恙。当他离开时，有一个士

兵认识他是总统的弟弟，并且知道是他建议说士兵应当到田野去劳动。一个士兵说：“就是这个家伙，他说我们应当去基隆贝罗——巨大的蔗糖庄园。”因此他们拘留了他，把他送到科利托军营。

以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尼雷尔躲在达累斯萨拉姆某个地方，人们从未透露过在这短暂时间内他躲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这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上一个引人猜测的小秘密。不断有种种谣传：说他在一个传道会教堂或大使馆、海滨的茅舍或港口的一只船上避难，或者说他远走到阿鲁沙或甚至到内罗毕去了。“不，不是在一只船上，”卡瓦瓦曾说。“我认为由我来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是不合适的；我们到了一个我们觉得安全并且能随时得到情报的地方。后来在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尼雷尔曾被批评没有和他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大错事。”这一承认如果是暗示在再次发生叛乱或政变时他将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他接受的教训可能是错误的教训；他在一月清晨的迅速隐藏起来，可能是出于他的保存政府甚至自己生命的责任心。

第一日 这次叛变是由一小批士兵领导的，大都是没有受到委任的军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驱逐英国军官。他们说，这些欧洲人不了解他们的委屈；

一个士兵后来证明，他之所以参加这个集团——他们自称为“陆军夜间自由战士”——是因为一个军官最近命令把他们喂养的一些鸡“屠杀了”，他嫌这些鸡房太肮脏。士兵们还要求把基本军饷从每月一百零五先令加到二百六十先令，他们说，即使是一个做家务的佣仆也得到一百五十先令。在星期日晚上的一次会议上，阴谋者决定立即进行他们的计划。一个叫皮厄斯·弗朗西斯的士兵说：“今天，今天，我们将把坎博纳先生的老师们送回老家去。”

凌晨二时后不久，叛变者——最初不过四十人——占领科利托军营后，分成几队乘车驶往达累斯萨拉姆。弗朗西斯·欣戈·伊洛吉中士领导的一队，强行通过了国家大厦的守卫，试图找到总统。这一努力没有达到目的后，欣戈的士兵驶往坎博纳的住宅，把他带回国家大厦。欣戈就在门房里告诉坎博纳说：“我们已把我们的军官禁闭起来。我们不责怪你们部长，因为你们都是文官。你们不懂得一个士兵的困难。如果你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听听士兵们的诉苦，军官们将被释放。”坎博纳同意和他们一起去科利托。但为慎重起见，他坐在警察专员的车子里，走在陆军“陆上游览者”牌汽车后面。

在科利托，欣戈向坎博纳说，士兵们希望陆军立即非洲化——并且完全非洲化。坎博纳回答说，这

个计划早在考虑，但是他必须先国防部里解决某些问题。他要求他们推出几个代表到达累斯萨拉姆去讨论士兵们的不满。有几个士兵叫喊：“枪毙他！”“揍他一顿！”但欣戈坚持说，“不。我们要在今天就解决一切问题。”

坎博纳看到叛变者决定立刻撤掉英国军官，就问他们谁应当担任坦噶尼喀步枪队的司令官。坎博纳说：“从刚果的经验我记得最坏的事情是军队没有军官。”有人叫喊说：“尼伦达”——即亚历克斯·尼伦达，这位年轻的桑赫斯特训练出来的军官，曾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把解放的旗帜插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上。这个建议立即被一片喊声压下去了；一个人在讲到尼伦达彬彬有礼的举止时说道，“尼伦达是个欧洲人。”于是另一个青年非洲军官即第二中尉伊利沙·卡瓦纳被提了出来，得到全体的同意。坎博纳说：“当他们催促卡瓦纳接管时，我告诉他一定要这样做。他们硬把道格拉斯的旅长军帽戴在卡瓦纳头上。我对于他们这样憎恨欧洲人感到惊异。”

当时坎博纳拒绝在新任命的协定上签字，要等到他有机会同总统商量之后才能这样做，所以他和欣戈一队人第二次乘车回到国家大厦。士兵们在国家大厦的车道上列队，没有一个人进入这座建筑物。有人要同坎博纳一同进去，但欣戈禁止他们这样做。

尼雷尔至少两小时以前就已离开国家大厦；但坎博纳在里面同总统的副官和尼雷尔的母亲谈了几分钟话后，走出来告诉叛变者说，尼雷尔已同意他们的要求。“说谎！”有人喊叫说。“总统不在里面。”但这队人似乎满足了，再回到科利托军营去，坎博纳又坐上警察专员的车子跟在后面。

在教育中心开了一次会后，这时坎博纳同意撤掉英国军官，并立即安排交通工具把他们送往内罗毕。后来有人说，他曾再次宽慰受惊的英国军官的妻子说，她们的丈夫安然无恙，他将亲自照顾他们。中午以前，坎博纳成功地使全部或大部分叛变者回到他们的营房。当发生抢劫和骚乱后，他召集一些士兵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去恢复秩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马戈梅尼镇区，一个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两个士兵和两个非洲平民，其中一人曾抢劫这个阿拉伯人的商店。愤怒的士兵用迫击炮轰击这个阿拉伯人的房屋，然后当他和他的六岁女孩从火焰中奔出来时把他们击毙。这家的另外五个人都烧死在里面。据官方估计，这次骚动中共有十七个士兵和平民死亡。

早在这一天，坎博纳曾要求肯尼亚政府协助平定叛乱，但是这项请求立即被内政部长乔伯·卢辛德所撤回。坎博纳在向全国广播时声称：“讲话的是

你们的外交和国防部长。政府仍在这里……非洲人和坦噶尼喀步枪队的英国军官发生了一些误会。在我的调停下，士兵们现在已经返回科利托军营去了。”奇怪的是他全然没有提到尼雷尔，可能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尼雷尔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由尼雷尔的英国新闻秘书乔治·罗基向新闻界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姆瓦利穆”是平安的，并控制着局势，但这样讲并没有使人全然安心。东非到处谣传说，坎博纳正在夺权；甚至后来有些坎博纳的政敌说，他一直同叛变者在一起工作，只是由于他们太忿怒和尼雷尔已经逃走，他感到惊慌，才又缩了回来。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反驳是，如果他得到士兵们的支持，那就没有理由他在那天不发动一次政变，要是他决定这样做的话。坎博纳解释说，这些谣传进一步证明许多欧洲人对他的憎恶和不了解。他说：“英国人把尼雷尔看作稳健的领导人，他们感到我的形象已被那天的事件所提高，他们恼火了。”

坎博纳立刻认识到，危机还没有过去。他回忆说：“首先，士兵们似乎很高兴，英国军官已经撤职了。他们向我欢呼。”但是，在举行被阿拉伯人枪杀的两个士兵的葬礼时，坎博纳注意到伊洛吉举止失常。“他不同我谈话，甚至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怀疑还有麻烦，于是派安全人员去跟踪他。”

第二日 政府获悉，坦噶尼喀步枪队第二营在得到科利托军营的第一营叛变消息后不久，就在塔波拉叛变了。在塔波拉叛变中，坎博纳发出了一份电报，任命米里肖·萨拉基基亚为新营长。萨拉基基亚是个登山运动员和赛跑运动员，当他在桑赫斯特学习时，他以四分十八秒的成绩创学校的一英里长跑纪录。萨拉基基亚这次和其他军官一同被捕。他要求叛变者把这份电报读出来，并要他们高声读。于是他命令士兵立正，卸下刺刀，取出子弹；他们服从了他的命令。那天晚上他作出安排把十个英国军官和非委任军官撤离。

星期二早晨的某时，尼雷尔大概在躲藏的地方，用录音带记录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于晚上广播。尼雷尔在三分钟紧张的斯瓦希利语讲话中，劝告他的同胞保持镇静。“昨天是最可耻的一天，”他说，“有些人传播谣言，说我已不在这里，现在已没有政府了。这些谣言所造成的小麻烦，看来比它实际上造成的要大”。他还带着教训的口气说，贩卖谣言是一种幼稚的迹象，成熟的人是镇静的，他的激烈批评最后说：“我的希望是，在坦噶尼喀我们将永远不会看到再有这样一个可耻的日子。”

“但是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许多坦噶尼喀人听了尼雷尔的简短讲话后问道。有些人很想知道他

是否被不知道的敌人所拘禁。作为预防措施，英国政府准备增运二千名军队到东非。快速舰“里尔”号已经在达累斯萨拉姆升火待发，运输舰“森陶尔”号已经载了六百名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驶离亚丁。在这激动的时刻，桑给巴尔的詹希德素丹几乎未被人注意就从达累斯萨拉姆飞抵伦敦了。

第三日 星期三早晨，尼雷尔突然重新出现。他同他的妻子和乔伯·卢辛德乘车从发生最激烈骚动的马戈梅尼起，开到基温加尼，那里有一个印度人店主热烈欢迎他，喊着“加里布，巴巴。”（父亲，请进来）他巡视了达累斯萨拉姆的每一个区。在坦盟总部里，一群人高唱党歌，“让坦盟建设这个国家。”在每处停留时，尼雷尔都说：“发生的事件是耻辱，但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人们半信半疑地从屋子里凝视着，有些人胆怯地挥挥手。有一次，有六个人看到他的行列后赶忙避开，尼雷尔走在他们后面说，“你们为什么走开？没有理由要害怕”。

第四日 尼雷尔在国家大厦举行了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谈了关于叛变的影响，并把没有使公众更好地了解情况归罪于自己。他说：“伪称这些事件无关紧要，或它们在海外没有损害坦噶尼喀的声誉，这是愚蠢的”。在回答问题时，他说士兵们要求较高薪饷的问题正在讨论中，他不希望把英国军

队召来：“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的局势。”后来他被问到他是否将惩罚参加叛乱的士兵时，他微笑着踌躇了整整五秒钟回答说：“尊敬的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会议就此结束。这尴尬的停顿突出地表明那时他面临的窘境；他的政府已经接受了非法的解决办法，并已向叛变的军队投降，而无力惩罚他们。士兵们已经完全回到了他们的军营。那天一个西方外交官说：“要是他们想在今晚再次夺取达累斯萨拉姆，政府是怎么也阻止不了的。”

那晚尼雷尔在卡里姆吉厅为达格·哈马尔斯乔尔德纪念基金会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和好的勇气”，在这之前他受到五分钟的欢呼。他的一个助手说，“他的讲话涉及到了以权力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但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本人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

“在那些日子里，他的一个朋友曾说，尼雷尔认为问题会自行解决；他指望士兵们将象他一样为十七个人的死亡而震惊。”星期四，他对第一营的官兵发出指令，要他们穿上制服。他后来说：“我想看看他们是否听从我的命令。”他们拒绝了。

第五日 政府和军队之间关于叛变者所提要求的谈判破裂了，士兵又变得难于控制。星期一时，叛变者缺少政治领袖，甚至缺少政治目的。现在据报，

工会领导人已经和士兵们在科利托军营会见。工会正在计划同叛变者结成联盟，在周末举行总罢工。还有报告说，在种植园工人联合会总部所在地的莫罗戈罗正在策划阴谋。据达累斯萨拉姆流传的消息说，一个坐在莫罗戈罗花园旁小屋里的妇人，听到有两个人正在阴谋反对政府，她并召来了警察。

坦噶尼喀军队的叛变引起了乌干达和肯尼亚军队的类似的但不太严重的叛变。看到有发生麻烦的端倪，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和肯尼亚总理肯雅塔就要求英国的军事援助。尼雷尔非常不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很久就有人说，直到有人给他看了一份阴谋分子所拟的内阁名单，他才相信存在着反对政府的阴谋，但是尼雷尔特别否认这件事情。坎博纳一度说过：“最后使他相信的是，阴谋分子已同他的一个朋友接洽，要求他的朋友担任新副总统。”

星期五下午某时，无论如何尼雷尔显然已深信他的政府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在五时半找英国代理高级专员斯蒂芬·迈尔斯到国家大厦来，要求军事援助。这个要求立即转给伦敦。然后坎博纳到道格拉斯曾在那里躲避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高级专员家里，要求他的帮助。那天晚上，道格拉斯和另一个军官从同外界隔绝的海滨乘一只小艇向“森陶尔”号军舰驰去，后者是从亚丁开来的，正停在海面上。星期

六上午二时，道格拉斯登上这艘运输舰时，他知道英国政府已同意坦噶尼喀的请求。

第六日 清晨六时二十分，六架直升飞机从“森陶尔”号装载六十名英国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到达科利托军营正南的运动场。六时三十分，这艘运输舰也和停在海面上的驱逐舰“坎布赖恩”号一起开始向空开炮来吓唬坦噶尼喀士兵。道格拉斯从五十码的距离外，用扩音器对士兵说，他已重新统率军队，命令他们举起双手从军营中走出来，坐在路上。他说，他给他们十分钟的时间回答，并用斯瓦希利语倒数数字。那时海军陆战队用火箭炮向守卫室射击，摧毁了一部分屋顶，打碎了一些窗户。士兵们立刻开始投降，十分钟内就有一百五十人，下一个小时又有一百五十人。道格拉斯后来说：“到了七时三十分，事情完全结束了，虽然那天早晨我们还要围捕一些躲进灌木林里的人。”三名坦噶尼喀士兵被杀，五名受伤，英国人没有伤亡。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次事件更戏剧性地说明年轻的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了：坦噶尼喀叛变是由不到四十个人发动起来的，而被六十名英国海军陆战队镇压下去了。

那天早晨，英国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的部队同时行动。在乌干达，他们黎明前就从恩德培飞机场赶到金贾军营，制服了警卫，俘虏了叛变者。在肯尼亚

的拉内特兵营，肯尼亚步枪队第十一营的部队曾在星期五晚上夺取了军火，英国皇家骑、炮兵于拂晓到达，夺取了军械库，并把士兵缴械。从星期六早晨起，英国军队保护着三个东非政府免受它们本国军队的袭击。

那天清晨，东非对外电讯公司达累斯萨拉姆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惊慌的坦噶尼喀士兵。他说要把下列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坦噶尼喀步枪队被没有番号的军队所俘虏，请迅速派联合国部队来援助。”这份电报按优先速度发出，署名是“司令官陆军中校伊洛吉。”电讯公司的迈克尔·赖特，四个月后在为审讯叛变者作证时说，这人显得“很苦恼”。赖特不能认出他就是弗朗西斯·欣戈·伊洛吉军士。

许多海外观察家认为很奇怪的是，三支东非军队差不多同时发生叛变，而且是在桑给巴尔革命后只一个星期；但是没有发现这些军队之间的共谋。所有这三支军队以前都是英王非洲步枪队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士兵有某些共同的不满。坦噶尼喀的官员倾向于责备他们的英国军官没有使政府更多地了解情况。卡瓦瓦有一次说，“如果军队司令官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认为叛变是可能避免的，而他沒有这样做。没有一种适当的制度把我们军队的思想情况告诉我们。”在许多英国军官方面，他们觉得坎

博纳对军队处理失当，并且不懂得军队的训练。有一次，他在上级军官不在的时候同士兵们谈话，请他们谈谈他们的困难。但达累斯萨拉姆的大部分外交家相信坎博纳在叛变的一周中举止适当，虽然不断有关于他不老实的谣言；当一家伦敦报纸提到他是“东非的莫斯科的人”时，坎博纳提出了诽谤罪的诉讼，并获得胜利。

星期六下午，尼雷尔抨击那些试图用武力来威胁国家的罪魁祸首并向他的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不得不召来英国人惩罚一支已经“被不忠和抗命所毒害的”军队。尼雷尔的一个朋友回忆他有一次说过：“英国人经受过锻炼，我们则从来未经受过。”叛变发生后，他问尼雷尔：“这是一次锻炼吗？”尼雷尔说：“是的，可以算是一点儿锻炼。”他常喜欢说在长期的独立斗争中，没有一人曾丧失生命；但在这次一个星期的叛乱中，至少有十七个人被杀。尼雷尔说：“这整整一星期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次最痛心的耻辱。全世界的人要把在这个星期所听到的这些事件从记忆中磨灭掉，将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

在随后的日子里，尼雷尔解散了第一营，并开除了第二营的几百名士兵。他怀疑有其他人卷入这次阴谋，把五千名警察解雇了百分之十；下令查询了四百多人，其中有些人是工会会员，曾同科利托军营的

叛变者有过接触，他并根据“预防拘留法”，拘捕了五百五十人，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释放了。他解散了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建立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来代替它，并以劳工部长为该会的总书记。他任命萨拉基基亚上尉——在危机时此人曾被坎博纳选拔为第二营营长——为新的军队司令官，把他提升为少将。他把士兵的军饷增加到差不多正如叛变者要求的那样：从每月一百零五先令增加到二百四十先令。他发出一封感谢电给英国政府，然后召开非洲国家外交和国防部长的紧急会议，讨论“由于军队叛乱所引起的对整个大陆的严重危险”。这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免于追究他的召来英国军队的责任，并赞同他向其他非洲国家借用士兵的计划，直到他自己的新军队被训练出来。四月初，英国军队都走了，由尼日利亚的陆军中校詹姆斯·帕姆率领的第三营接防，此人两年后在自己国内的一次政变中死去。欣戈·伊洛吉中士由于参加军队叛变被判徒刑十五年，另外十三个士兵被判刑五年到十年。

那年二月的某天，尼雷尔讲到叛变所造成的损失。他说：“这里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感到很失望。这是双重的耻辱——被我们自己人叛卖的耻辱，以及召来英国人的耻辱。对我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英国人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短越

好。”

这次叛变使尼雷尔仔细考虑他的国家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英王的非洲步枪队从来没有把士兵训练成为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的士兵。他们不过是有英国军官的军队而已。所以我们接手时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把制服稍稍改变一点，我们委任了几个非洲人军官，但是在上层，仍然是纯粹的英国人。没有校官级的非洲军官。我们继承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你们决不能认为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当我建议，这里都是些身强力壮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帮助建筑桥梁呢？军官们回答说——他学着省字的英国人口音说——‘这些人都是士兵呵！’我说在战时英国士兵是建筑桥梁的。他们回答说：‘战时又当别论’”。

“我认为，一支军队必须接受一个国家的政治道德。我们的军队不知道我国的政治道德是什么。英国人允许在军队内部有不同的政见，但那是他们道德的一部分。我曾邀请一些英国军官到这里来参加宴会，其中一个军官同我谈论政治。他说，他将投票赞成社会主义者而反对保守党员。好，那很好。但是，你能够设想肯尼亚军队里有一个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的陆军上校吗（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那时是肯尼亚的反对党）？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反对党，这些

该死的家伙将在第二天早晨把政府推翻。这里的反对党会是颠覆分子。那几天(叛变的一星期中)，他们在同军队商量，哪里有什么将来的反对党领袖，我能够象霍姆爵士请威尔逊来商量那样把他请来和我商谈的呢？我能请谁来对他说‘注意，兄弟，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局势安全的问题呢？’在这里这种事情是行不通的。

“我不需要别人来说服我这里需要一个反对党。西方应当同反对党商量，而我不需要。应当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做反对党，不要做颠覆分子，不要不忠。’

“叛变期间一个士兵曾说：‘我们怎么能推翻这个该死的政府呢？它太得人心了。’这你们能想象么？”他重复讲了这个士兵提出的问题，显然他对此很高兴。“我们所需要的批评是能促进一个好政府的批评。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暗示我没有履行我一九五八年的诺言。这是我们欢迎的那种反对党。”

他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懂得建设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支脱离人民群众的军队。”他说他的有些朋友坚决主张，他不应当建设一支政治军队。“但是对我来说，一支政治军队只是接受国家的政治道德的军队而已。”

回顾起来，这次叛变似乎标志着殖民地时期以

后英坦关系的顶点。当有人问到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为什么他认为英国的援救坦噶尼喀政府未能产生持续的较好关系时，他回答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乐于看到他的军队被六十名年轻人所压服。当然，我们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但是对朱利叶斯和坦噶尼喀来说，这是一次很大的丢脸。没有人喜欢别人那样来帮他们忙的。人们总是不喜欢得到这样的帮助的。”

四年以后来回顾这次叛变，尼雷尔以愈益增强的信心说：“恢复是彻底的，并且恢复得很早。这次叛变是军人的罢工，他们失去了控制。它震动了这个国家。但是正如英国人所说，任何坏事都有好的一面。它使我们几乎白手起家来建立一支军队。我们继承了许多制度，但是军队却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成果。”

第九章

尼雷尔总统希望大家明了：按照斯瓦希利语的习惯，坦桑尼亚这个字应该读作坦-桑-尼-亚，把重音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国家大厦通告，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在桑给巴尔革命后的不宁静日子里，三百名坦噶尼喀野战警察继续留在岛上。他们确定的目的是帮助桑给巴尔人恢复秩序和防范阿拉伯的反政变，但是更重要的作用是支持卡鲁姆的统治，以对付其他革命分子。新总统在革命后两周宣布桑给巴尔为一党制国家。这个合法政党当然是非洲一设拉子党，因此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布立刻向全国广播，宣布他的乌玛党并入非洲一设拉子党。

新政府刚刚成立，就开始没收大量阿拉伯人种植园的土地，分给非洲农民。它还把岛上具有“种族性质的”俱乐部收归国有，当时英国联邦和殖民大臣

邓肯·桑兹正在被收归国有的俱乐部之一——英国俱乐部里进茶点。后来他在回答一个记者的问题时说：“不，在桑给巴尔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象征性的和大快人心的行动，是卡鲁姆在一次营火会的仪式上烧毁了岛上仅存的少数人力车，答应补偿给每一个人力车主一百英镑。他说，他早就主张终止把人当作牛马使用的不道德习惯，但是从前的政府嘲笑他的想法。

在这个动荡不安时期，几百名身带武器的革命分子在街上随便行走，偏僻地区不时发生杀人事件，英国侨民从五百人减少到不足五十人。至少有七百名阿拉伯人和五百名印度人逃离了这个岛屿。原来规定只能搭乘三十名乘客的三角帆船，竟装载了一百五十人之多。有一只这样的三角帆船在肯尼亚北部海岸沉没，只有船长一人生还。

二月二十日，陆军元帅奥凯洛飞抵内罗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抨击外国“鬼子”，并说他愿意在南非任何殖民主义者依然当权的地方发动革命。然后他去乌干达看望他的家属。当他几天后在达累斯萨拉姆重新出现时，他向新闻记者否认他是陆军元帅奥凯洛；他说，他的名字是吉迪恩·贝克。奥凯洛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解释说，他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逗留是为了等待卡鲁姆，但是卡鲁姆没有来。四、五天以

后，奥凯洛听到谣传说，他是桑给巴尔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他飞到桑给巴尔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桑给巴尔机场上受到照常武装的卡鲁姆和其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欢迎。卡鲁姆把奥凯洛匆匆塞进一架坦噶尼喀政府的飞机，说尼雷尔要和他们谈话，这两人就飞返达累斯萨拉姆。第二天早晨，奥凯洛被带到国家大厦，尼雷尔对他说，“曾经有一些误会。政府是你的还是卡鲁姆的？”当时奥凯洛用暧昧的、含糊的话回答，第二天卡鲁姆独自回桑给巴尔。奥凯洛写道，当他在一周后设法见到尼雷尔时，尼雷尔告诉他，卡鲁姆要他“回到乌干达自己家中休息六个月之后，再考虑返回桑给巴尔的问题。”

奥凯洛抱怨说，他没有钱，甚至他的手提箱也在一星期前留在桑给巴尔机场；他的三个月军饷到底怎么办？第二天，坎博纳带来了他的手提箱，但没有其他东西。奥凯洛悲伤地写道，“素丹在英国受到很好的接待，而我自己的兄弟们却驱逐了我。我把素丹搞下台，但是我的命运比他坏得多。”

奥凯洛记述他怎样在不名一文的情况下从内罗毕流浪到乌干达。不过他没有提起他怎样偶然得到一辆新“珀若”牌轿车的经过，他在三月十四日开往乌干达途中把它全部弄坏了。四月七日，奥凯洛写信给卡鲁姆，得到移民局主要官员的复电：“现在通

知你，你是桑给巴尔不需要的人。”

新桑给巴尔政府接受中国、东德和苏联技术人员及援助的速度之快，使许多原来支持推翻阿拉伯统治的东非人感到惊讶。在革命后尽快承认卡鲁姆政府的苏联，派来一艘装有卡宾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以及小型武器的货船。二月末，巴布宣布桑给巴尔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十八万五千英镑的援助。他说：“这仅仅是开端。”殖民地的名称被换成了共产党的名称：在几个星期之内，一座体育场改名为毛泽东体育场，一所学校改名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学校，中国医生开始在弗·伊·列宁医院施行针刺手术。

桑给巴尔人对西方国家倍加忿怒。他们忿恨早些时候报纸上报道桑给巴尔已变成“东非的古巴”，他们对于英国、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不承认桑给巴尔特别恼火。二月初，西德政府派遣一名外交部官员到桑给巴尔；他回到波恩时，深信桑给巴尔人已同意和西德建立关系，而不是和东德。但是不久，桑给巴尔人接受一名东德代办来岛上，同时桑给巴尔代理外长哈桑·莫约驳斥西德的抗议是“狂妄自大的行为”。

岛上剩下的唯一美国外交官唐纳德·彼得森，在两名坦噶尼喀警察保护下在市区各地驱车闲游。

他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卫星追踪站，和已撤退的该站美国职员的家属、财产。每日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他用普通电话同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通话。

二月十九日，卡鲁姆总统在忍耐不住的情况下命令英国高级专员和美国代理代办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桑给巴尔，因为他们的国家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权。两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这项命令也随之撤销。美国任命弗兰克·卡卢奇为新代办，他是一个曾在刚果任职的青年外交官。卡鲁姆的态度似乎暂时缓和下来；但在四月初，“为了桑给巴尔安全和国防的利益”，他要求美国永远撤走它的人造卫星追踪站。美国驻肯尼亚大使威廉·阿特伍德在纽约发表的声明，说是中国和东德正在企图把桑给巴尔变为“一种非非洲国家”，这使卡鲁姆极为愤怒。这个声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发表的时间不恰当。在卡鲁姆命令撤走卫星追踪站的同一天，他接受中国新任大使孟英的国书，并且说桑给巴尔把中国看做是“一个真正的兄弟，而不是一般的朋友”。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下面的问题在东非经历了无休止的辩论。普遍的看法是：虽然共产党大国并未直接参与策划桑给巴尔的革命，但此后它们立即企图利用它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并且取得了相

当大的成功。此外，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在革命六星期后还不承认卡鲁姆统治是一个严重错误，当时中国、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接踵而来，赞扬和支持桑给巴尔人。不过，我们也决不能肯定西方国家的及早承认会对卡鲁姆后来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卡鲁姆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他面临的问题和内心的恐惧，从狂妄的陆军元帅到阿拉伯反政变的危险等等。他无可避免地要信赖参加他政权的年轻和受过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而后者也很快地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政策。例如，以色列本该是新政府的第一个和最密切的朋友，因为以色列人曾经是独立前的非洲一设拉子党的最大捐助者之一。但是在革命以后，当以色列人打算和卡鲁姆政府建立关系时，他们遇到了不可理解的阻力。

尼雷尔对于西方国家不能理解桑给巴尔发生的事情深为忿怒。他感到特别忿怒的是，英国人既然把这个岛国交给一个阿拉伯少数派政府，却又好象不能理解为什么非洲多数派夺到了政权。后来，他不愿谈论非洲一设拉子党是否是政变的唯一鼓动者，或奥凯洛在那次策划中起了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这类问题是不相干的。真正的问题是，黑人多数派两次用殖民国家遗留下来的选举办法都没有能得到治理国家的权利，而用革命手段却取得了

这种权利。

两年以后尼雷尔说：“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西方国家却宣称共产党接管了。荒唐！几年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情（革命的危險）。是那些拿着弓、箭和砍刀的人接管了政权。但是西方国家说，‘这些人是共产党！’

“好，共产党人已抢先进来了。桑给巴尔人对政治没有经验。他们是普通人。普通人！同时西方国家撤出了！美国人是最先撤出的。为什么？是民族主义党要求他们撤走卫星追踪站的。不是非洲一设拉子党提出的。

“这些人没有经验。请走出去看一看他们呀！他们没有什么国外支援，他们担心英国人会把素丹弄回来。而俄国人、中国人和东德人都承认他们。正如他们说的，‘在你沉下去的时候，你甚至会试图拉住一根稻草’。他们要懂得或关心冷战干什么？他们认为，帮助他们的就是好人，不帮助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懂得的就是这些。”

但是考虑到新政府中的左派力量，它会不会不顾一切采取反西方的政策呢？尼雷尔说：“是的，政府中有左翼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派”，乌玛党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中的少数派，“而且是少数派中的分裂派。他们会极力主张左翼政

策，但是这不会变成冷战问题。他们和东方国家打成一片，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承认桑给巴尔。”

四月二十二日，尼雷尔飞抵桑给巴尔，这是他在革命以后第一次来桑给巴尔，他的助手描写这次旅行是对卡鲁姆作一小时的“礼节性拜访”。第二天，达累斯萨拉姆国家大厦宣布，尼雷尔和卡鲁姆实际上已经签订了“联合的条约”，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已经同意合并。

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人们简直不知道如何解释。内罗毕《东非旗帜报》的一篇社论说，“观察家们把联合共和国看作是两种方式的合而为一：既是为了加强桑给巴尔的革命政权来对付极端分子，把他们遏制在岛国之外，也是极端势力的进入大陆。”甚至有少数被人认为曾经参加过革命的人，也有点莫明其妙。当通告发表时，桑给巴尔外交部长巴布正在访问印尼后的回国途中，他在途经巴基斯坦时说，他没有意见。在第二天到达内罗毕后，他说他自始至终知道这个计划，他是赞同的。卡鲁姆在宣布后的第二天在桑给巴尔人民宫对他的部下说，联合共和国并不需要桑给巴尔改换它的朋友们，同时尼雷尔向他的国民议会致词时，坚持这个行动是受到非洲统一的愿望的启发而引起的，同冷战政策毫无关系，“再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大陆上的统一不必通过莫

斯科或华盛顿。”

根据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的这个新国家的临时宪法，尼雷尔被指定为总统，卡鲁姆为第一副总统，卡瓦瓦为第二副总统。卡鲁姆还被任为桑给巴尔的“总统”，虽然这个名称后来改为“政府首脑”。在任命了新内阁的二十二名成员以后，尼雷尔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回答问题的多变和善辩，差不多同他在三个月前兵变的一周间回答问题时相同。新首都设在哪里呢？“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的军队会解散吗？“它们将变为整个军队的一部分。”政治犯会释放吗？“他们并不因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不成其为政治犯了。”没收的财产会归还原主吗？“为什么要归还呢？”

联合共和国被广泛地解释为西方的胜利，这就无可避免地激怒了尼雷尔并使他在政治上感到为难。关于导致合并的原因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尼雷尔始终坚持说，最简单的说明就是正确的说明。按照尼雷尔的说法，坦盟和非洲一设拉子党经常是密切合作的，并且曾讨论过统一的问题。今年三月的某日，当卡鲁姆来达累斯萨拉姆看望尼雷尔时，尼雷尔对他说：“注意，我曾经明白告诉过肯雅塔总理和奥博特总理说，当他们准备成立东非联邦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告诉你，‘当你准备

和我们成立联邦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尼雷尔继续说：“卡鲁姆说，‘你说的当你们准备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准备好了！’

“这是三月份的事情。联合共和国本来可以在三月份实现的。但是在三月份，我们正和东非国家举行一系列会议，当时我们恰好有成立联邦的可能性。所以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等待着。”尼雷尔说，但是就在三月的那一天，卡鲁姆告诉他，“召集新闻记者吧，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尼雷尔却同他说，“还要花些时间。”

尼雷尔继续说：“我衷心认为他们都是人民的朴实的、诚实的领袖。这些人民的真正领袖是说话算数的。我们都曾谈过，我们想要合并，现在有一个领袖说，‘我们已经多次谈过，在我们获得独立以后我们要合并，现在我们已经独立，所以让我们进行吧。’”

在他和卡鲁姆谈话之后不久，至少在宣布成立联合共和国的六个星期以前，尼雷尔召见了检察长罗兰·布朗，对他说：“我想要你为我做些机密工作。”尼雷尔说，桑给巴尔人有意和坦噶尼喀联合，他要求布朗考虑作出有关这方面的安排。

尽管尼雷尔和卡鲁姆早就达成协议，但是桑给巴尔方面却还有许多摇摆不定的迹象。据说汉加赞

成合并,而巴布表示反对,卡鲁姆则动摇其间。巴布之所以反对,至少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在桑给巴尔的政治地位不稳定。他自己是一个混血儿,只得到少数桑给巴尔人的拥护;但由于他的才智和手腕,他使自己成为卡鲁姆政府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知道坦盟和非洲一设拉子党间的密切合作,他无从揣测他个人将在联合政府中起什么作用。根据一位参加联合政府人士的说法,巴布甚至从大陆上带一个律师来加强他的论点,即在联合政府中坦噶尼喀会吞掉桑给巴尔。据说他之所以去印度尼西亚,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说服卡鲁姆把这个问题拖下去,至少暂时不作决定。

尼雷尔的处境十分为难。正如坎博纳有一次对美国记者所说的,“我们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不断增加,第二个问题是有卷入冷战的危险。冷战已经在刚果出现——它将会直贯非洲。还有一个问题:他必须说明他有自己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如何使桑给巴尔和东方国家隔离,但又不为西方所利用,以达到它们的目的。”尼雷尔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可能完全不同意坎博纳的说法。不过,毫无疑问,他的主要动机是防止桑给巴尔——以及坦噶尼喀陷入大国对峙的漩涡。一位朋友回想起有一次尼雷尔大发雷霆地说过:“中国人在岛上,

美国人却说我正在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是在非洲的越南——我是绝不允许在非洲发生这种事情的。”

他对于岛上的军事集结和连续出现的暴行非常忧虑，但是他无力干预，即使他想干预的话；他的军队已经大部分遣散，他自己的安全正在依靠尼日利亚人。他还关心仍在桑给巴尔值勤的三百名坦噶尼喀警察的安全。达累斯萨拉姆的有些观察家都说，如果不能成立联合共和国的话，尼雷尔准备撤退这些警察，因为他不愿让他们的生命在万一发生新的战斗时遭到危险；由于这种可能大大改变岛上军事均势的前景，卡鲁姆才深信应当马上和坦噶尼喀联合。

据说卡鲁姆的摇摆态度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交换联合共和国文件仪式的时候，他甚至以不参加相威胁，可能是因为坦盟的《民族主义者报》过早公布联合共和国的消息使他生了气。

长期以来，尼雷尔非常忿恨英美报纸称他为“温和派”和“亲西方派”。在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后，当西方报纸祝贺他为同共产主义斗争夺得这个岛屿时，尼雷尔勃然大怒。不仅因为他感到这种祝贺词会引起误解和曲解他的动机的后果，它还会使桑给巴尔人处于为难的地位，因而损害——如果不是破坏——

联合共和国本身。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桑给巴尔人是那么单纯和那么专心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不会关心国外报纸的言论；但是可以利用的地方迟早总会被利用的，这几乎是现代非洲事务中的一句格言。而且，尼雷尔在这方面特别容易受到指责，因为他在那一年曾要求过英国的军事援助。七月，在开罗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声称，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把训练非洲自由战士的任务交给一个“帝国主义代理人”——显然这是指的坦噶尼喀，因为大部分训练游击队的营地就设在这个国家。尼雷尔气忿地回答说，当他的国家忍受“耻辱”向以前的殖民主义国家要求帮助时，“一个非洲兄弟国家的大使居然为之欢欣鼓舞，使我不得不要求撤换他。”坦噶尼喀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要求加纳大使离开它的国家的。尼雷尔继续说，“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已分裂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真正需要一个大陆政府，并孜孜不倦地为它的发展而工作，另一部分人仅仅利用‘联合政府’这个词句，来达到宣传的目的。有些人喜欢用他们的卓越才能来破坏我们大陆统一的一切机会，因为有一些愚蠢的历史学家会这样记载说，他们要求统一的时候正是别人不需要之时。”

六月间，《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尼雷尔的危险》的文章中宣称，总统“干掉了一条蟒蛇的一半”。

它继续写道：“他顺利地吞噬了桑给巴尔，但是没有首先粉碎它的战斗力量。消化这条活蛇要花很长的时间，它的挣扎作用正使坦噶尼喀感到痛苦，甚至可能深入坦噶尼喀的政治肌体而成为致命伤。”这种批评——对联合共和国内部不断发生严重问题的正确反映——引起了《民族主义者报》发表一系列针对英国和美国的讽刺文章。一篇特别恶毒的社论断言，“英国人把手指扣在扳机上来煽动〔一月〕叛变，为他们卷土重来提供充分的理由。”又说，英国“想要把尼雷尔当作傀儡来操纵。”此后不久，达累斯萨拉姆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英美报刊对联合共和国的敌意。”卡瓦瓦说，政府“遗憾地支持了”这个决议。

两年以后，有人问起反西方宣传运动实际上是否是掩饰尼雷尔试图对桑给巴尔施加压力的一种美妙的烟幕，一个大陆官员回答说，“它不是烟幕。如果你喜欢，你说它美妙好了，但不是烟幕。这个行动没有其他目的。”

八月，政府为联合共和国征求新的名称，“它要有联合的意义，并且易于发音。选中的建议给予十镑奖金。”两个月后，尼雷尔宣布了当选的称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次竞赛吸引了四十多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三十四人参加。受到欢迎的名称，除“坦桑尼亚”外，还有“坦桑”和“坦基巴尔”两个名称。五天

以后，政府(在普遍以为国名仍未确定的情况下)又发布一个简单的通告：正确的读法是坦—桑—尼—亚。

大陆上的坦桑尼亚人感到苦恼的是，他们发觉桑给巴尔同坦噶尼喀联合以后并没有多大改变。卡鲁姆坐了一辆黑色的奥斯汀“公主”牌汽车在岛上到处奔驰，仍被称为“总统”；联合共和国实际上从来不被提到。同革命以来的做法一样，从达累斯萨拉姆来的旅客必须特别签证，也发生过几起坦噶尼喀政府官员不能进入岛上的事件。桑给巴尔人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奇特方式进行革命。六月，他们派解放军部队包围电力局办公室和发电站的同时，把桑给巴尔电力局收归国有。但是实际情况是，自从一月以来，电力局已经是一个准官方机构，它由卡鲁姆任命的六人委员会管理。

在这一年中，有无数关于联合共和国处在崩溃边缘的谣传。有一个时候，据说尼雷尔曾要求尼日利亚派遣军队来作为桑给巴尔解放军的对抗力量；但尼雷尔坚持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可是，三百名坦噶尼喀警察都重新装备了冲锋枪。

桑给巴尔人的外国朋友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些国家都不愿放弃他们所已获得的外交地位。坦桑尼亚政府要求岛上所有的大使馆从六月三十日起降

格为领事馆，但是东德人差不多在一年以后才撤销他们的大使馆。中国人继续向桑给巴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但他们宣布他们正在给予大陆坦桑尼亚一千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并给予桑给巴尔五百万英镑贷款。

一九七二年初，联合共和国成立以后八年，桑给巴尔只是部分地和坦噶尼喀一体化。根据一九六五年修订的临时宪法，联合共和国政府管理外交、国防、国籍、外贸、海关、港口、民用航空及邮电业务。警察力量是统一了，但是现在称为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的两支部队却没有统一。桑给巴尔的革命委员会依然用法令进行统治；桑给巴尔没有独立的司法或立法机关，大陆上来的旅客在桑给巴尔机场上仍要经过移民入境手续。坦盟和非洲一设拉子党尚未合并。桑给巴尔人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的总统选举中投了票，尼雷尔都在没有反对者的情况下连选连任，但是自革命以来岛上一直没有议会的或地方的选举。一九六八年卡鲁姆接见坦桑尼亚《旗帜报》记者时说，他并不期望桑给巴尔在五十年内会有自由选举。他说：“选举是帝国主义者用以破坏人民的工具”，他再次提到独立以前的选举情景，虽则非洲一设拉子党赢得人民的选票，却没有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一九七〇年七月，尼雷尔不得不用

同样理由向他的议会解释，为什么桑给巴尔人不在那一年参加议会选举。他说，岛上人民仍然害怕这种尝试会颠覆革命统治，使广大人民回到少数人的控制之下。但是他说，他希望在新议会的任期内(任期至一九七五年止)举行会谈，来拟定一个新的和永久的宪法。

从开始起，尼雷尔一直以最放任的态度对待桑给巴尔人。他在一九六五年说，“桑给巴尔人是个有自尊心的民族，没有人打算把他们变为只是共和国的第十八个专区。”相反，桑给巴尔人在联合政府中已经得到相当好的、超过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代表地位。在联合共和国的一千三百万人口中，桑给巴尔的人口只有三十五万；事实上，桑给巴尔比大陆上十七个专区中的任何一个专区都小。可是，从一九六七年起，尼雷尔的二十二名内阁成员中，有七名是桑给巴尔人；在坦桑尼亚议会的一百八十三名议员中，有四十名是桑给巴尔人。和他们的大陆同事不同，桑给巴尔人过去从来没有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他们现在所以能够取得议会席位，是由于他们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或由于他们在桑给巴尔政府中的职位。尼雷尔一直努力使桑给巴尔人深信他们正在联合共和国中得到好处。可以推测，他的理由是，不管实现完全的一体化是多么缓慢和痛苦，但把桑给

巴尔留在共和国内总比留在外面好。

尼雷尔在岛上人民中所以拥有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他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当卡鲁姆的宿敌奥斯曼·沙里夫担任了好几年坦桑尼亚驻美大使之后在一九六五年返国时，桑给巴尔政府以“革命前的罪行”控告他，并把他监禁起来。据信尼雷尔安排把他放回大陆，给他当姆贝亚专区的政府兽医；沙里夫在那里呆了四年，后来又卷入另一次阴谋活动。一九六八年，有消息说达累斯萨拉姆政府正同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讨论他们的辞职条件——几乎可以肯定说这是自由选举和改革的先决条件——但是显然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从那以后革命委员会仍然继续掌权。

使大陆当局震惊的是，桑给巴尔人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方法处理无数问题。曾经听到一个坦桑尼亚官员多次发牢骚说：“桑给巴尔是我们的苦难。”一九六六年桑给巴尔人公布一条法令，规定父母拒不同意女儿的婚姻是非法的。卡鲁姆拥护这个法令，认为可以克服种族歧视，但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立刻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法令无非是使他们的女儿为有权势的非洲政客大开方便之门。圣公会主教尼尔·拉塞尔大胆地说出反对新法令的意见，马上被驱逐出境。

这个争论在一九七〇年又被重新挑起来。在四个年轻的波斯姑娘拒绝嫁给六十五岁的卡鲁姆后，他下令逮捕她们的十个男性亲属，罪名是“妨碍实行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他发誓要驱逐这些人，然后要驱逐所有波斯伊斯纳谢里教派的一百多名成员，因为这些姑娘和她们的亲戚都属于这个教派。后来经过同尼雷尔的一次秘密谈话后，卡鲁姆放弃了这次控告。几个月后，四个波斯姑娘——显然是另外四个——被迫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结婚，由第五个委员主持婚礼。她们的十一个男性亲戚被“人民法院”法官下令送进监狱，并且受到鞭挞，法官指控他们“散播种族冲突的种子”。大陆上的妇女团体愤怒提出抗议，同时内罗毕《东非旗帜报》抨击这个案件是“向奴隶时代的骇人倒退”。

一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努力向一个外国朋友解释这种情况：“你必须按桑给巴尔的条件来理解这个问题。请注意，桑给巴尔过去是贩卖奴隶的地方，是整个非洲奴隶制度的象征。历来的情况是，如果一个有钱的阿拉伯人喜欢一个非洲姑娘，他就把她带回去，就是这么回事。婚姻向来由父母安排。但是只在各族以内。

“革命以来，现在对桑给巴尔人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倒过来了。当一个非洲人对一个阿拉伯人或

印度人说，‘我喜欢你的女儿’，阿拉伯人说，‘哦，不’。那位非洲人说，‘为什么不呢？’阿拉伯人说，‘那末，让我们问她一下’。非洲人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过去的做法不是这样。她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呢？我又不是一个罪犯。’”

这位大陆上的人最后说：“你可以对他们说，‘这是荒谬的，这并不是自由的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这个事件使达累斯萨拉姆和这个岛的关系紧张起来，也使尼雷尔大伤脑筋。尼雷尔在辩论对罗得西亚继续实行贸易禁运和英国政府计划恢复对南非出售武器这类非洲问题的时候，他的朋友也为他道义上所遭的损失感到苦恼。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谈人权呢？”

一九六九年八月，桑给巴尔当局控告十四个人阴谋推翻卡鲁姆政府。其中汉加、沙里夫和其他两人，都在大陆被捕后由坦桑尼亚当局送交桑给巴尔政府。经过好几个星期，卡鲁姆终于在十一月通告说，经秘密审讯后，四个被控阴谋叛乱的已经处决，九个关在监狱里，另一个已予释放。在作出这种既草率又残酷的姿态时，他并没有列举四个被处决的人的姓名。三年以后，汉加和沙里夫的死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一位熟悉两个人的欧洲人说：“在我的

谈话接触中，没有人相信他们还活着。”

卡鲁姆的通告意味着，尼雷尔把这四个人交给桑给巴尔当局是无意中使他们不经正当审讯就判处死刑的。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他同意交出他们时，他后来说：“这是为了交叉盘问。我想弄清楚这件案子是否能成立。我怎么能对卡鲁姆说，‘因为你认为你有一个案件，你就到大陆来和他们谈呢？’”尼雷尔作出决定之时，正当小规模阴谋活动扰乱达累斯萨拉姆政府以及桑给巴尔的时候，他显然相信这些小规模活动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在实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如何，他把汉加和沙里夫两人交出的决定是一个严重错误。

既然不愿和也许不能用武力解决桑给巴尔的问题，那么尼雷尔对于联合共和国最后能否获得成功的希望似乎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他在一九六九年末说：“我相信非洲的统一，但是这些该死的边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是帝国主义者造成的。非洲人民比这些边界还要神圣不可侵犯。我对联合有两手准备。即使桑给巴尔人没有受到坦噶尼喀的排斥，如果他们只是感觉到联合共和国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而脱离，而桑给巴尔人又是真有这种想法，那么我不可能去杀桑给巴尔人。如果他们自由地参加，他们也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们没有征服桑给巴

尔。如果他们留在联合共和国内，必须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这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唯一基础。人们用扩张军队的办法来控制一个帝国。但是人们只能加强内部的团结意志来保持一个国家的统一。”

奥凯洛自从被桑给巴尔宣布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以来曾经一再被捕，多半是因为触犯了移民条例。一九六四年十月，在被放逐到肯尼亚和送到乌干达边境以前，他在坦桑尼亚的姆万扎监狱中待了十天。同年末，他溜回肯尼亚，因为非法入境而被监禁十八个月。被释后不久，他回到乌干达，在没有宣布原因的情况下，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一直遭到预防性拘留。

一九六九年二月，他又因非法潜入肯尼亚而被捕。卡卡梅加的行政长官发现他散发“违禁刊物”，判处他徒刑三年。奥凯洛作为一个有魔力的人和一个革命输出者，他的名声相当大，因此乡村行政长官不敢造次。奥凯洛向基苏木高等法院上诉后，他的刑期减为一年。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他在被释后，由当局用警察飞机送往乌干达。

一九六四年二月，即革命后的一个月，詹希德素丹从伦敦迁居到近朴次茅斯的索斯西，同他一道的有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二十五个亲戚和随员。两年

以后，一位美国新闻记者_在维克多_利亚丛林中他的三层楼砖屋中访问他。他看来感到出乎意外地满意，他是个怕羞的、和藹的青年人，正在尽情享受他的新生活。一辆“雷诺”牌跑车停在他的门口。他说，他在看电视，有时出去看看电影，也有时上街去看看他的母亲。他说那年夏季曾到沙特阿拉伯和亚丁作三个月旅行，去“看看我的人民”，他们都是从桑给巴尔逃来的。他用相当低的声音表达岛上阿拉伯人对大陆上黑人的宿恨：“他们把霸占岛国叫做革命，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入侵。”他收到许多关于桑给巴尔生活的报告。他说：“这不是真正的联合，是共产党人在控制。”他说，最近有几个肯尼亚来的非洲人访问他，并且对他说，他们在桑给巴尔旅行的时候，被保安人员钉梢。他说：“我喜欢他们对我说老实话。”但是这不是他的真正的心里话。同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流亡者一样——剧作家厄斯启拉写道，“我懂得流亡者是怎样过着他们的痴心梦想生活的”——他非常爱听来自家乡的在他看来是有希望的片段消息。

卡鲁姆度过了八年多作为一个冷静的但是暴戾的桑给巴尔独裁者生活。在他最后的几年中，由于丁香价格猛涨，他设法积累了三千万英镑的外汇储备，使尼雷尔伤脑筋的是，他小心翼翼地不让坦桑尼亚政府插手。他还是象过去一样的反复无常和不可

捉摸；他停止了控制疟疾的计划，理由是非洲人对“疟疾有免疫力，”他“废除”了岛上的监狱，释放了几百名犯人。

一九七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正当卡鲁姆在他的白围墙的阿拉伯式建筑非洲一设拉子党总部同他的挚友们玩牌时，四个带枪的人闯进房间向他开了四、五枪，显然立刻就把他打死了。其中一个凶手当场被卡鲁姆的卫队打死，两个在后来同治安人员的搏斗中被击毙，第四个据桑给巴尔电台广播，已经自杀。据说三个凶手是以前乌玛党的支持者。只有一个名叫胡缪德·穆罕默德·胡缪德的青年陆军中尉同时有私人动机；当卡鲁姆那次释放犯人时，胡缪德获悉他的父亲(被判为杀人凶手)在服无期徒刑期间，曾受过鞭挞，并且已被处决。

第十章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以后不久，尼雷尔就开始感到西方大国的压力，要求他结束岛上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以及减少那里的中国人和东德人。他并不重视这类劝告，部分是因为他痛恨这些国家不断干预他的国家的内部事务，部分是因为他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桑给巴尔。一九六四年八月，当他宣布准备为他的军队邀请七名中国教官和四名翻译来工作六个月时，一位西方外交官问他是否意识到他所冒的风险。尼雷尔愤怒地说：“最大的风险是军队叛变，我的军队曾在二月叛变过，但它不是中国人训练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进一步阐明这个见解，他质问说：“难道桑给巴尔人都象一群坐着的该死傻瓜，什么事情都不做吗？他们接受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说，至于他自己的军队，他曾要求好几个不结盟国家派遣教官，但是它们拒绝了。“我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的援助是我想要的最友好的援助。这个所谓中国的问题是

什么问题呢？”

“这个简单的请求是一个小小的尝试，用来表示我们是不结盟的。可是谈到实际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商业和学校等方面就完全是西方色彩的。这个国家所受的影响是西方的。作为一个总统，要我来说明为什么我接受中国的援助，这件事情本身是一大侮辱。这就是我的解释，也是我的抗议。”此外，坦桑尼亚人认为尚有其他粗暴压力的事例，他们不断对这些压力作出敏锐的反应，虽则不一定是公开的。几个月后，当他们在寻求西方援助修建一条通向赞比亚的铁路时，一位西方的大使告诉尼雷尔说，“我想你会发觉，这条通向赞比亚的铁路是要经过桑给巴尔的。”这个意见尼雷尔听起来就象是不加掩饰的威胁，使他认识到只要共产党在岛上还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不可能指望西方援助修建这条铁路。

联合共和国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和两个德国的关系问题。自从独立以来，坦噶尼喀就和西德有十分融洽的关系，正期待在今年五月宣布的新五年计划中从波恩得到相当大的帮助。事实上，过去一度是德属东非的主要殖民地的坦噶尼喀，和西德人有一种干儿子般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桑给巴尔革命以后，东德抢先进来，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它在非洲的第一个大使馆。为了保护它的外交据点，东

德人开始给桑给巴尔人建立了一座无线电发射台，并派来一艘装有衣服和其他货物的货船，他们还答应在桑给巴尔城的恩甘博区重建整个市区。卡鲁姆向东德人保证决不允许破坏新建立的友好关系。

面对这样离奇的问题，坦桑尼亚人指望西德人承认联合共和国，并且同意一种妥协办法，如同意桑给巴尔设有东德领事馆。坦桑尼亚人答应联合共和国不承认东德，其实际结果将是东德丧失它在非洲的唯一大使馆。然而波恩政府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总理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违背西德哈尔斯坦主义的条件，按照这个主义，除苏联外，波恩不得同任何跟东德有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僵局一直继续到一九六五年二月，那时坦桑尼亚宣布它的决定：联合共和国虽则不正式承认东德，但同意东德在达累斯萨拉姆设立一个总领事馆，作为对他们关闭桑给巴尔大使馆的补偿。

西德政府以惊人的迅速进行反击。它取消了对坦桑尼亚的一项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用来购买军用飞机的四百万英镑资金援助，并实际上在一夜之间就撤退了它的空军和海军训练工作队。波恩还宣布，西德内阁将在下一次会议上考虑“进一步对坦桑尼亚施加压力的行动。”西德的反应正是尼雷尔痛恨的那种强国对弱国的粗暴外交威胁。他要求西德

立刻取消所有其他援助，包括已经承诺的三百万英镑的技术援助。他说：“一只饿狗会在任何情况下接受你给它的食物，即使你扔给它。但对一个人来说是两回事，当你把食物给一个饥饿的人的时候，你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他要保持他自己的尊严。”后来他表示，有些人“指望用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联合方式来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但这是做不到的。”

在这个多事的时期，当大陆坦桑尼亚人努力恢复桑给巴尔的和平与秩序，并同一大堆前所未有的外交问题作斗争时，发生了三起严重损害坦桑尼亚和美国关系的事件。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坎博纳突然中断在北部高原阿鲁沙的休假，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召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有“具体证据”，即“某些西方大国”，具体指美国联合葡萄牙，正在准备进攻坦桑尼亚。似乎以坦桑尼亚的保罗·列维尔^①自居的坎博纳，打电报给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统一组织说：“我荣幸地通知你们，联合共和国已经收集到充分的材料和确实的证据，表明某些西方大国阴谋推翻坦桑尼亚政府并破坏民族主义和解放运动。”两天以后，他在莫希的七千名忿怒的坦桑尼亚群众大会上说：“我们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懂得自由的可

^①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爱国者。——译者

爱，同时因为他们迫使英国人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他们现在试图暗中破坏我们的政府呢？”

正当反美主义席卷坦桑尼亚的时候，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几乎等了一个星期才看到“文件证据”，结果是三份影印文件。据称是西方外交文电的这三份影印文件，都是用随随便便的法文写的，其中一份提到“推翻朱利叶斯·尼雷尔政府的特别部署，国务院正在研究继任人选。”另一份谈到美国谋求得到“英国不加干涉的保证”。第三份据称是给一个大使的，要求用九千英镑来招募南非洲人，以发动一次“暴动”。当时一位美国外交家说，“证明这些文件都是伪造是不成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提出来的证据是否会被接受。”

当时尼雷尔正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马尼亚拉湖度一周假期。据说他是从他的老朋友安德鲁·蒂班代巴盖（坦桑尼亚驻刚果大使）那里拿到这些文件的。他把文件交给坎博纳说，“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当尼雷尔在几天后回到达累斯萨拉姆时，西方人士希望他会声明这些文件都是假的。但是尼雷尔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下午在詹瓦尼运动场举行的约两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关于世界大国争霸问题的长篇演说，一再提到搞错的可能性。他说：“这件事情或许不是事实”。如果这些文件是不

真实的，“我将是第一个感谢上帝的人”。他说，美国人否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他们会有机会证明他们的主张的。

西方外交家对尼雷尔没有讲得更明白些感到失望，但是他们倾向于把主要责任放在坎博纳身上，而坎博纳曾温和地告诉他们，这种公开揭露未经证实的断言是“非洲人处理问题的方法”。有人甚至认为坎博纳利用这次事件来损害美国在坦桑尼亚的地位，并使尼雷尔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处于窘境。

不过坎博纳和尼雷尔后来都坚持说，坎博纳没有责任。坎博纳说：“我不过是此事的广播员而已。他从马尼亚拉湖打电话给我，要我公布这些文件。不管它们是真是假，我们认为这是防御它们的最好办法。”尼雷尔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过：“在这件事情上责备坎博纳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不想公布这些文件，我就不会把文件交给他。”尼雷尔还说，当然，他自己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方法，但是基本上应由他本人承担这件事情的责任。

这个文件案子在坦桑尼亚人心目中仍然是新鲜的时候，十一月末又发生了第二件事情：由美国空军飞机运载的比利时伞兵，空降在刚果的斯坦利维尔，以营救被刚果叛乱分子扣留作为人质的一千名白人的生命。空降进行之时，正值美国驻肯尼亚大使威

廉·阿特伍德和占领刚果东部很多地方的叛乱运动的“外交部长”托马斯·坎扎在内罗毕谈判释放人质。在所有非洲国家首脑发表的抗议声明中，以尼雷尔的抗议声明最为激烈：“就在寻求保障大家安全的谈判正在举行的时刻，外国军队空运到刚果的行动使人想起珍珠港事件来。”坎博纳补充说，空降是“西方世界对非洲大陆事务及和平的最卑鄙、最不正当和最有挑衅性的干涉”。

非洲人对这种可以很好地营救数百名人质生命的行动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西方人普遍感到震惊，同时对于非洲领导人对叛乱分子杀害五十个人质（包括美国传教士保罗·卡尔森博士）很少表示或一无表示感到愤慨。

对于空运作出这种反应的关键，在于非洲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脆弱性。自从冲伯领导加丹加脱离刚果，并且有一次实际上向尼雷尔提出加丹加和坦噶尼喀合并的可能性以来，尼雷尔就一直不信任他。在刚果战争期间，冲伯成为利用白人的支持和白人雇佣军来残杀自己兄弟和毁灭自己国家的那种非洲人的象征：即雇佣白人來杀害黑人的黑人。这几年中，在坦噶尼喀没有比叫一个人为“冲伯”更丑恶的绰号了。尼雷尔认为冲伯于一九六四年回到利奥波德维尔担任总理是对非洲的出卖。“有三个死了的人

如果今天活转来，他们会问‘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肯尼迪总统、哈马舍尔德和卢蒙巴。”他还显然相信，伞兵在斯坦利维尔着陆的目的不仅是营救人质，而是在平息刚果的叛乱，从而帮助冲伯政权。这是确实的，尼雷尔和非洲人对于空降消息的反应是过分了；但这也是确实的，西方大国没有施加更大的压力，以防冲伯在利奥波德维尔接管政权，它们不了解非洲领导人对他痛恨的深度。当有人问起为什么尼雷尔对于毕竟是营救生命的人道主义使命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尼雷尔的一个欧洲朋友回答道，“非洲人会这样说，‘你们竭尽全力去营救一千个白人！但是对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几百万非洲人你们却什么也不做’。这就是非洲的反应。尼雷尔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狂热的非洲人。”

尼雷尔本人在一九六六年曾试图向一个美国访问者解释这些情况。“能够在非洲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将是美国能了解非洲。这不应该有困难。美国在一七七六年为了自己的革命而战斗，而别的热爱和平而又通情达理的民族为什么会拿起武器来战斗，这没有比独立宣言阐明得再好的了。在革命诞生的国家中，最伟大的国家是美国。今天你们有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你们用这种道德来判断一个社会。根据你们自己的道德，你们认为阿拉巴马是不

能容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是罗斯福对邱吉尔说，‘你到现在还不让印度自治，我们怎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为自由而战呢？’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人们会理解一个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其他地方为自由而战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为维护一个帝国的行为辩护吗？’然而后来有些事情就不对头了。

“我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患有精神分裂症。它说，‘你们必须支持美国的反共斗争。’在它心中的某一角落里，它又承认非洲人有获得独立的权利。但你们把非洲的问题束之高阁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发生冲突，你们支持你们的盟国，而不支持自由。

“好。刚果独立了；麻烦发生了：刚果有被肢解的危险。共产党人并没有卷入。麻烦是以叛变开始的，所以努力制止分裂是很自然的。总的说来，我认为肯尼迪是避免让它成为一个冷战问题；他想要通过联合国来帮助卢蒙巴和中央政府。

“好。那时出现了一个傀儡政府，以西里尔·阿杜拉为总理。不过我们并没有争吵。但是最后加丹加省人回来了，阿杜拉被赶走了！我知道美国在这方面不及欧洲人那么老练，但是他们的人被排挤出去了。我不相信美国对于把冲伯弄回来负有责任——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在那里了！正是那些曾经

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人把他弄了回来——而美国却拥抱他！

“好。美国——很可敬的人——说，‘我们参加〔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是为了营救传教士’，而那时美国对我们的反应感到十分惊异！非洲几乎一致谴责这一行动！现在我问，‘为什么美国感到惊异呢？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杀人一直在刚果继续进行！为什么这种杀掉人质的特殊威胁使他们不安呢？喜爱屠杀非洲人的雇佣军已经征募，为什么美国对此并不感到担心呢？’

“从它自己的道德来说，美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应该是我们的同盟者：制止这些雇佣军，这些人类的敌人，他们喜爱杀人。为什么选出这件事来呢？然后又颠倒是非把它说成是我们要灭绝传教士，要把他们吃掉呢！

“我以前说过，为了试图说明这个问题，不妨设想有某一个犹太人招募以前的纳粹分子到以色列去，帮助他进行夺取权力的斗争。其余的犹太人会有怎样的想法呢？我们然后又设想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国。如果其余犹太人反对这个人，他的盟国会对这些犹太人的反应感到惊异吗？

“对我们来说，非洲能够发生的最好事情是美国——这个有道德的强国——了解我们。我们这个

大陆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大陆，我们对此有强烈的感觉。”

第三件损害美国和坦桑尼亚关系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尼雷尔召见美国大使威廉·伦哈特并告诉他说，他相信伦哈特手下有两个人从事颠覆活动，因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这两个人是在达累斯萨拉姆任大使馆参赞约有六个月的罗伯特·戈登，和驻桑给巴尔的代办弗兰克·卡卢奇，这位代办在困难环境中的工作看来是出色的。据说尼雷尔还向伦哈特保证，据他了解，大使和他的使馆都和这些活动没有关系。

他的含意似乎是说，这两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他们正在阴谋推翻桑给巴尔政府，而国务院并不知情，但在阴谋成功以后，国务院会赞同的。后来和美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见中，尼雷尔的一个工作人员问道，“你们对他们搞的军火又怎样解释呢？”大使馆的结论是，受到指控的原因是由于戈登和卡卢奇在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之间每日通两次电话，还推测他们的通话经常被桑给巴尔海峡一边或两边的情报人员用磁带录音机录了下来。

美国政府的报复是驱逐了坦桑尼亚驻华盛顿的只有两个人的大使馆的参赞，并以商量工作为名把伦哈特大使召回去。结果是坦桑尼亚召回了它的大

使奥斯曼·沙里夫，因而使两国关系有好几个月处于紧张状态。坦桑尼亚人对于华盛顿的行动感到惊异和愤怒，并且指出尼雷尔——做出不寻常的姿态可能是企图帮助美国保全面子——曾经写信给约翰逊总统，说这是坦桑尼亚和“两个美国人的争吵，而这两个人碰巧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尼雷尔拒绝提出对这两个外交官指控的证据，并且回答说：“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和美国同样是主权国家……我们不威吓别人，我们也不喜欢受别人的威吓。”

实际发生的事情显然是美国官僚主义行动的一个小典型，卡卢奇为了急于使第一副总统卡鲁姆对美国有一个良好印象，曾在几天之前告诉大使，他希望约翰逊总统在桑给巴尔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即一月十二日，给卡鲁姆来个贺电。但是到底那一天是坦桑尼亚的国庆日呢？是十二月九日的独立纪念日，或七月七日^①，或一月十二日的革命纪念日，还是四月二十六日的联合纪念日？伦哈特推论正式的国庆日是十二月九日，贺电应该由总统打给总统，即由约翰逊打给尼雷尔。卡卢奇坚持说：由副总统汉弗莱打给副总统卡鲁姆怎么样呢？伦哈特还是不同

^① 7月7日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纪念日，又是该国的建军节。——译者

意。但是他后来又说，如果他错了，而其他国家发来贺电，美国还有“第二个十二日”的机会。这是指二月十二日，在那年是作为革命纪念日来庆祝的，因为一月十二日正值伊斯兰教的斋月。他还说，贺电署名人的职位不应当“高于威廉斯”（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门南·威廉斯）。

一两天后，卡卢奇在电话中向戈登抱怨说，他不满意伦哈特对他讲的话。戈登回答说，“你为什么直接联系呢？头头不想插手这件事”——意思是说：如果你愿意，你自己去向华盛顿请示，大使是不想卷入的。他们用的是一套官僚主义惯用的语言，其中一个人甚至使用“第二个十二号行动”的词句和“足够的军火”的字眼——意思是指向华盛顿说明情况所必需的情报。

并不奇怪，坦桑尼亚的情报人员听了这些通话，不理解这些美国行话的含意。或者可能是桑给巴尔的情报人员误解了。也可能是有些人听了这些通话，认为大可利用一下。不管怎样，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歇斯底里十分高涨的时候。坦桑尼亚政府非常担心桑给巴尔的情况，以及西方国家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在上年的事件发生后，政府也全神贯注于安全的预防了，来访者注意到好几位坦桑尼亚部长办公室里都有《无形政府》这本书，这是一本关于

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情况的书。

尼雷尔的朋友和同事得到的印象是，尼雷尔真正相信这些外交官在搞阴谋活动，或者至少相信美国代理人凭借这类方法来推翻桑给巴尔的政权似有可能。一个坦桑尼亚人说，“但是，总统是否理解是无关重要的。桑给巴尔人是不理解的。”

在以后的年代，越南战争成为引起摩擦的重要根源。尼雷尔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说，“美国必须从强权的精神错乱中清醒过来”，虽则他讲话的特点是在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也表扬了反战的美国人民。但并不是所有坦桑尼亚人抱同样的宽大态度。若干年以来，坦盟主办的《民族主义者报》始终保持刺耳的反美方针，它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失可能超出坦桑尼亚人的想象。和平队是这种恶感的牺牲品。一九六一年，坦噶尼喀是第一个要求美国派志愿人员的非洲国家，到一九六六年，在坦桑尼亚的和平队员人数到达五百零八人。但是《民族主义者报》不断地批评和平队；尼雷尔本人也在一九六七年说，和平队的理想已经衰退，这个组织已经被“动机不良的人”渗入。一九六九年末，最后一个志愿人员回美国去了。

在独立的初期，坦噶尼喀可能比任何其他非洲国家鼓舞和感动了更多的美国和西欧的年轻访问

者。乌干达政论家阿里·马扎鲁伊于一九六七年在东非《转变》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描写一种他称之为“坦桑热”的传染性社会现象。他把它解释为“坦桑尼亚对许多和它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所施加的传奇般的魅力，”又说：“我们知道有许多最平凡的西方实用主义者在坦桑尼亚魅力吸引下都变成富有幻想的样子了。”他写道，特别易受影响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看到坦桑尼亚——主要因为尼雷尔的人格和理想——是一个他们能够达到在本国所不能达到的政治目标的地方。坦桑尼亚现在依然得到国外景仰者的崇拜，不过因为过去几年的恶感和误会，这种景仰者的人数已经减少。

住在坦桑尼亚的美国人，感到那种对抗和猜疑的气氛是难于接受的。但是，正如一九六七年末一个坦桑尼亚人所评论的，“我们受到美国强权的威胁——意思是指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进攻我们，而我们毫无办法。过去的斯坦利维尔是一个例子，现在的越南又是一个例子。坦桑尼亚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日益增进，我们感到强大的美国对此并不乐意，可能起而干预。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一九六四年情况的重演（军队叛变和以后发生的事件），当时我们感到那么无能为力。”

一九六五年后，美国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已经逐

步改善，但是决没有回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那样的温暖。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一直倾向于只访问那些很可能以友好态度接待的非洲国家，他们很少再在坦桑尼亚停留。尼雷尔在一九六九年对加拿大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他在华盛顿中途停留。他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没有会见尼克松。

尼雷尔同西方最严重的争吵，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当时由于英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行动以制止少数白人控制的罗得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尼雷尔和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场争吵，实际是当年六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就已经开始了。在这次会议上，尼雷尔代表坦桑尼亚不同意公报中最后关于罗得西亚和越南的部分。尼雷尔说：“我们曾经作过长期努力，谋求取得英国政府的保证：他们进行无论什么谈判，都必须实现以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罗得西亚的独立。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得到这种保证。”他还反对哈罗德·威尔逊的建议，即由英联邦派遣一个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使团去华盛顿、西贡、莫斯科、河内和北京。尼雷尔说：“我仅仅提出，英联邦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出面支持威尔逊或美国……据我们的了解，中国可能说愿意接待这个使团。但我是在说，我们不应该采取行动，因为按照

过去的经验，这种行动好象是单方面的，并且把中国放在被告席上。”威尔逊设法把尼雷尔完全孤立起来，没有其他总理在这两个问题上支持他的立场。

尼雷尔在辩论进行时告诉一个朋友说：“这是可怕的。这使我好象狂妄自大。当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我知道参加会议的人会说，‘尼雷尔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想把自己树立为急进派的领袖——或者是因为他对中国承担了义务的关系’。我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在想这些。”

早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尼雷尔就威胁要退出英联邦，如果英国同以伊恩·史密斯总理为首的罗得西亚政府谈判独立问题的话。他象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担心一个独立的罗得西亚势必要同南非及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结盟；同时他感到不能容许罗得西亚的不到二十五万的少数白人永远统治这块殖民地上的四百万黑人。十月在阿克拉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结果成为恩克鲁玛政权的衰落），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敦促英国停止罗得西亚的宪法，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威胁要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如果英国允许罗得西亚的少数人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话。

罗得西亚的独立是在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的。尼雷尔最初劝告要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他说，应该让

英国有机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十二月三日，非洲统一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通过了除非英国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压服罗得西亚的反抗，否则成员国将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议。朋友们说，尼雷尔认为这个最后通牒是愚蠢的，但是断定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再没有人会相信非洲人说的话，而更糟的是，我们将不会相信我们自己说的话。”

尼雷尔肯定知道十天之内不可能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他立即着手准备他的人民在十二月十五日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他在坦盟总部的群众大会上说，“我的决定可能意味着苦难，你们准备好承受吧！除丧失现有的英国援助外，还意味着要取消正在准备签订的一笔七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协议。”他还开始一再向坦桑尼亚的英国公民保证，并告诫他的人民，对英国居民施加暴力将是不能容忍的。“任何英国臣民都无须担心政府机关或联合共和国的人民会侵犯他的个人安全。”当一群学生焚烧英国高级专员的汽车时，尼雷尔命令他们回去道歉。

在十二月十五日限期以前，非洲统一组织其他成员国对决议的支持落后于形势，尼雷尔注意到阿克拉的决议是一致的。他说：“但是现在，有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回到他们的首都，并且着手查看

他们的银行存款。这是可笑的。”当英国人抱怨不可能在决议规定的限期前解决罗得西亚白人的反抗时，尼雷尔在十二月十二日回答说，我们需要的是“英国有诚意采取坚强行动的明确证据。”他指出，非洲人要求的是“以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独立。十二月十四日，尼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题为“非洲的荣誉”的演讲，说明为什么坦桑尼亚要坚持承担非洲统一组织的义务。他当时用英语演讲，因为他没有时间把它译成优美的斯瓦希利语。在午夜时候，坦桑尼亚断绝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几内亚、加纳、马里、埃及、毛里塔尼亚、刚果(布)、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其他八个非洲国家跟着行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没有行动。

奥斯卡·坎博纳和劳工部长迈克尔·卡马利扎领导了拥护这次决议的达累斯萨拉姆示威运动。尼雷尔公开说：“如果威尔逊先生有点雄心充当破坏英联邦的英国首相，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是我不能阻止他实现他的雄心。”如果英国在限期以后采取措施，又怎么办呢？“如果明天证明我是非洲最大的笨蛋，我将感到非常高兴。”他私底下因缺少支持以及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而感到沮丧。他谈到英国人时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坦桑尼亚和英国的邦交关系差不多到三十一个月以后才恢复。

几乎在断绝外交关系的同时，坦桑尼亚和英国开始合作空运石油，供应赞比亚的紧急需要。赞比亚以前是英属殖民地北罗得西亚，于一九六四年获得独立。英国政府曾经禁止它的国民向罗得西亚装运石油；索尔兹伯里政权的反应是切断赞比亚的石油供应，赞比亚的石油一向是从莫桑比克港口贝拉经过罗得西亚运入的。后来空运被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之间的公路运输所取代，最后为一千英里的输油管所代替。

尼雷尔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同意让皇家空军暂时使用坦桑尼亚的飞机场，但要求英国人尽快改用民用飞机。不久，英国在未取得坦桑尼亚政府同意之前，就派载有油桶的快速舰从亚丁驶往达累斯萨拉姆。于是尼雷尔提出军舰不得进入达累斯萨拉姆，这位直爽的舰长作出正确的姿态：他邀请总统午餐。后来，当地的新闻记者问舰长是否指望总统接受邀请，他回答说：“为什么不接受呢？不应借口断绝外交关系就不讲礼貌了。”常常表现出十分爱好英国人的性格和怪僻的尼雷尔，据说他为这件事大笑不已。

达累斯萨拉姆的外交界倾向于尊重尼雷尔断绝关系的决定，但是认为做得过于僵硬。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当他下了决心的时候，他就坚持下去。同英国断绝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它恰恰挫败了他想完成

的事情。”

不管怎样，尼雷尔显然从来没有对这次决定表示后悔。他在几个月后说，“不，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法。我们国家首脑在阿克拉开过会。我出席了会议。我可以和他们分道扬镳，我可以，说，‘这是荒唐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而问题是严重的。几个月后，又开了一次会。我派我的第二副总统去出席。他们考虑了可能采取什么步骤。他们解决了外交关系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我们不能把军队开到罗得西亚去——我们没有这种幸运的军队。但是我们对于种族主义问题可以强烈表达非洲人的感情。很好！”

“在私人关系上，我们知道有些人说是就是，说不就不。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也要这样：这样全世界可以懂得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否则他们会说，‘那些非洲人是不可信任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说是是否意味着是。’

“树立不可信的名声对坦桑尼亚会有帮助吗？年轻的国家经得起对道德冷嘲热讽吗？至于古老的国家，道德已成为强权的工具。年轻的国家经得起把道德作为强权的工具吗？经不起的！”

第十一章

一九六五年九月，即同英国断交前几个月，大陆上的坦桑尼亚举行了一九六二年以来的首次大选。直到那时为止，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认为自己会得到党的再次提名，因而确信会再次当选。可是，党采取了一种新的制度，按照新制度的规定，全国执行委员会几乎为每一个选区推荐了两名候选人；只有六名在职议员，包括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和其他五名内阁阁员，他们没有竞选对手。尼雷尔也没有对手。他的声望使党不准备指定任何人去同他竞选；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同他进行竞选的。在坦桑尼亚存在的这种不满情绪，除私下外，极少公开表现。

在桑给巴尔没有举行议会选举；政府解释说这是因为革命胜利后的时间还不太长。但是，桑给巴尔人同大陆上人民一样，他们也有机会对选举尼雷尔当总统表示赞成或不赞成。尼雷尔在竞选运动中回答问题时，对一群桑给巴尔选民说，指定他当终身

总统是危险的。他说：“要是发生那种情况的话，你们就要回到素丹统治时期的老日子去了，我甚至可以自封为尼雷尔素丹。”

尼雷尔在竞选运动中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使用选票的方法。他说：“那些不希望我在下一个五年当总统的人，只要在选票下面注明‘不同意’的地方划一个勾。如果你认为我应该继续当总统，我希望你到投票处去投票时，在选票上的‘同意’字样下面划一个勾。”

在竞选运动之初，坦盟中央委员会挑选了两个代号：“锄头”和“房屋”，并为每个候选人指定一个代号。委员会设想这两个代号的价值是大体相等的，但是分析竞选运动的政论家和政治学学者们发觉这两个代号本身很快就在许多选区引起争论，还发觉候选人以锄头为代号就具有胜过对手的明显有利条件。

一位名叫贝尔·哈里斯的英国政论家，在一本地方杂志《姆比奥尼》上评述竞选运动说：“在学者们的报告中一再出现这一类的词句：‘一切财富来自锄头’；‘你们当中家里有一把锄头的有多少人？’回答是一阵阵‘是呀’的喊叫声；‘我们应作为一个沉睡的国家，还是应作为一个觉醒的并且动手建设的国家？’一个低级别的部长在竞选运动期间到处带着一

把锄头……只有一两个选区有效地使用了‘房屋’的代号。例如，在姆贝亚区，那个本地出生的候选人强调了‘我们住的房屋都在这里’这个左邻右舍的共同关系。他赢得了胜利。”

候选人能否表现出他仍保持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通的作风，这是竞选运动的另一个要素。哈里斯小姐写道：“学者们的报告说，凡是采取西方式教育群众的态度来为政府政策解释和辩护的候选人都被认为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讲话。”

进行选举那天的情景很象其他非洲国家的选举日：在盛开火红色花和非洲木棉的树荫下，投票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个选民的拇指都涂上红墨水，以防他在当天再到别的投票处去投票。

鉴于尼雷尔的不断增长的声望，他的胜利是不足为奇的。一九六二年在两个候选人竞选的情况下，他赢得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的选票；一九六五年，在没有对手竞选的情况下，他获得将近百分之九十七的选票。出乎意外的是，许多在职议员被击败了。在鲁菲吉，那位级别较低的社会发展部部长兼全国妇女组织主席、骄傲的碧碧·蒂蒂·穆罕默德遭到惨败。另一个落选的是尼雷尔的最能干的同事之一、财政部长保罗·博马尼。博马尼的朋友们指出：选民指责他在三周前建议从工资中另行征收百分之五

的发展税；但博马尼家族在姆万扎拥有的财富，特别在大棉花合作社（即维多利亚合作社联合会）所掌握的权力，引起广泛的不满，这也是确实的。

合计一共有两位部长和六位低级别部长落选，另有三位低级别部长没有得到党的提名。九名普通议员也被击败，另有三十七名普通议员或者没有谋求再次当选，或者没有被再次提名。在一百零七个选区选出的新的一届议会的议员中，有八十六名是新人。获胜者中间还有卫生部长德里克·布赖森，是尼雷尔内阁中唯一的欧洲人，还有阿米尔·贾马尔，唯一的亚洲人。这两个人分别战胜了他们的非洲人对手而再次当选，而布赖森几乎是获得五对一的多数票当选的。

议会有十个席位是“指派”的，在物色其候补人员时，尼雷尔采取的立场是，这些指派的席位不应用来挽救那些落选政客的政治生涯。这项决定使其中的碧碧·蒂蒂·穆罕默德感到恼火。于是，尼雷尔对其规定作出了一个例外，指名保罗·博马尼当一个指派议员，并任命他担任管理开发和计划事务的国务部长。尼雷尔解释说，博马尼这个人太有用了，少不了他。贾马尔接替博马尼当了财政部长。

几个月以后，有人问尼雷尔，他是否认为这次选举已经证明这个国家的一党制是有效的。尼雷尔说：

“我认为它已经证明我们一向讲的话是正确的。按照定义，民主主义者是自由的人。选举的方法绝对不可以同民主政治的要素混为一谈。我不责怪西方人对我们有怀疑的看法。他们所了解的唯一的民主政治是多党制，而他们所看到的一党制都是不民主的。但是，数量众多的政党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治。”

他还说：“我还不能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看法。你们不能用一次选举来证实一种制度。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能够有一种自由的选举。我现在的希望是，我们能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使我们的实验能继续下去。这也许会引起西方人说：‘可是……也许……’”

在那年早些时候的电视访问节目里，尼雷尔继续阐述他的论点。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但按照宪法我有充分的权力做一个独裁者。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就能够自称这种制度已有保障。起保障作用的不是一次选举，而是一种传统；民主政治的真正保障是民主政治的传统。”

尼雷尔有时谈到达累斯萨拉姆是一座“谣言城”。把这个静寂的、散发着东非海岸香料的芬芳、按阿拉伯语被命名为“和平港”的小港口城市，说成是“谣言城”，这对一个偶然的来访者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是，有时确实有一种流言蜚语狂仿佛笼罩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阴沉的上空。一些观察家甚至把对外国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说成是坦桑尼亚人的一种从奴隶贸易时代留下来的一种特性。无论如何，许多外国人似乎懂得要体谅他们。一个住在达累斯萨拉姆并在坦桑尼亚政府供职多年的英国人，一次带着忧郁惶惑的情绪对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解释道：“你知道，我们得体谅他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一位曾在坦桑尼亚住过的精神病科的欧洲医生，把这种症状归咎于他称为一种“乌呼鲁蒂斯”^①的疾病，并作了如下的描述：“抑郁，疲倦，几乎重复产生部族互相残杀的恐惧；社会各阶层中焦虑的大量增长（相当数量由于背离父亲而犯下的非严重的罪行）。另一个因素是家庭这一组带的破裂；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他认为连续不断的谣言是局势紧张的一种表现。

尼雷尔有时向朋友们诉苦说：“我很讨厌这些猜疑，”要开展定期的运动去反对它。有一次，他居然查出十来个被指控散布谣言的本地人，并警告他们今后不得再犯。在一九六六年庆祝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日的群众大会上，他提到一些盛传关于内阁内部不和，以及联合共和国即将瓦解的流言蜚语。

^① 一种神经系统的炎症。——译者

他说：“我们一共听到三次发生三种不同政变的谣言。”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年轻的陆军司令萨拉基基亚少将说：“我说，少将，人们认为今天早上我们这儿肯定要发生的政变现在怎么样了？”

一九六六年有一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尼雷尔说：“可是，我认为这些谣言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这就是：谣言的内部来源，那不过是些流言蜚语，出于无知和误解；还有是地方上的捣鬼。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城市并不是大得可以免除这种搬弄是非的捣乱，但是它又不是小得使我们能了解其他每一个人的情况以及全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可是，此外我认为谣言还另有来源。自军队叛变以后，我同一位外国外交官进行过一次讨论。我向他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在星期五那天，城里谣言充斥’。他发表了意见——我是个天真的人，所以对我来说，他的意见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建立你们自己的谣言工厂？’是呀，我觉得存在着故意制造谣言的工厂。”

一直在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当议员的切沙姆夫人，在一九六六年尖刻地说：“这里有太多的〔外国〕妻子，她们终日无所事事，只是给家里和朋友们写信，诉说她们呆在这里有多么勇敢。”她有一次想起，在尼雷尔和议员们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私人座谈会

以后，当地的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他有没有告诉你这儿发生过一次未遂政变，并讲出了阴谋者的姓名，真有这回事吗？”切沙姆夫人回答说：“绝对没有！他会向一百五十人透露阴谋反对他的是什么人吗？你这个人呀，动动你的脑筋吧！”后来她又说：“这个混蛋！他总是在落日酒会上弄得我发窘。”在那次座谈会上，尼雷尔讲到坦桑尼亚在世界权力斗争中的作用。他说：“但这与你们无关。你们的政策是发展坦桑尼亚。你们必须警惕来自外部的影响。注意谣言，如果性质严重的话，你们应当把听到的谣言报告政府。”

当然，一部分疑惧是完全有根据的。继贩卖奴隶的经历之后，紧接着就是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在这一段时期，坦噶尼喀人看到肯尼亚成了东非的工业中心，并得到殖民主义国家的额外投资和重视。独立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叛变、桑给巴尔革命以及遍及整个非洲的无休止的军事政变和内战，这些事件在他们精神上造成创伤。坦桑尼亚人也认识到，他们在收容接待来自南非、西南非洲、罗得西亚、莫桑比克等至少十二个难民组织或“解放运动”、甚至有一个来自法属科摩罗群岛的团体时，他们考虑过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有些组织同沿街店铺的办公室差不多一样大

小，以供从南边逃来的青年人作为聚集的场所，他们就在那里寻找工作或谋求读书的奖学金。其中只有几个组织是真正从事游击运动的；最活跃的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它近六年来一直在指挥着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个断断续续的军事战役，并在大部分这段期间里实际上控制着两个省。一九六九年初，受过美国教育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埃杜瓦多·蒙德拉纳博士，当他试图打开一个从外表上看是从欧洲某地寄来的包裹时，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被炸身死。最初有报道说，这个象书籍般大小的炸弹包裹上面盖有东德或苏联的邮戳；后来又谣传说是西德、法国、甚至日本的邮戳。不管怎样，坦桑尼亚当局断定包裹是直接偷偷地投到当地邮政系统的，或甚至是投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邮政信箱里的。这个案件没有被官方破获；人们猜测集中到下列的每一个人：从削弱游击运动中显然能得到好处的葡萄牙人直到难民团体中蒙德拉纳的政敌。不管真相如何，暗杀事件着重表明了非洲领导人是较易受到间谍活动的伤害的。这件事提醒坦桑尼亚人，如果全部独立的非洲，特别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不是由象尼雷尔和卡翁达那样的人组成的政府来领导，而是由另外一种性质的政府来领导，象马拉维的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所组成的政府，就会愿意同南部非洲

的那些白人政权共处，互通贸易，并接受他们的赏赐，这对南非和葡萄牙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一九六六年，尼雷尔在参加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后回国途中说：“非洲是一团糟。非洲某个地方一定有个鬼。我是一个相当迷信的非洲人，我相信有鬼。”在会上，代表们拒绝了（那怕是暂时的）重新修订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预算；该委员会是为各种游击队运动提供经费的，而大多数游击队运动是以达累斯萨拉姆为基地的。尼雷尔说：“我认为非洲国家必须打定主意：他们是否要优先考虑非洲，还是要优先考虑他们同外国统治者的合作。”

尼雷尔这样感情激动地反对其他非洲政府，显然是极其罕见的。大体说来，坦桑尼亚和它邻国的意见分歧，应尽量象处理坦盟会议内部的或非洲大陆政府和桑给巴尔人之间的争论一样审慎处理。最使坦桑尼亚人感到恼火的是，一个外国人利用达累斯萨拉姆作为讲坛，来抨击另一个非洲国家或者它的领导人。

建立一个由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的东非联邦，似乎不再象在一九六三年时那样迫切了。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三国把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东非共同事务组织改为东非共同体，其总部设在阿鲁沙。

这个东非共同体是一个共同市场和联合管理机构，它为三国管理的业务范围很广。它负责征收所得税、关税和消费税；它管理四家独立公司，它们分别办理东非的航空线、铁路、港务和邮政电讯业务。它的分支机构包括一个上诉的司法系统和一个开发银行。经过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三国同意一项给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以一些援助的计划，以赶上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肯尼亚。

直到一九七一年初，坦桑尼亚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摇摆于热诚与指责两种态度之间。一九七一年一月乌干达总统密尔顿·奥博特被推翻，以及后来坦桑尼亚同乌干达的新军人统治者伊迪·阿明将军发生争吵，造成了对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最严重的威胁。尼雷尔继续承认奥博特为乌干达总统，并表示欢迎他来坦桑尼亚避难。一九七二年年中，阿明宣布要把乌干达独立后一直保留英国国籍的大约五万名乌干达亚洲人驱逐出境，这时尼雷尔攻击阿明采取的是种族主义的行动。一九七二年九月，一帮忠于奥博特的乌干达反叛者从坦桑尼亚侵入乌干达，在几天内，两国之间几乎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乌干达发生的事件加速了坦桑尼亚倾向于南方的赞比亚，今天坦桑尼亚同赞比亚政府的关系大概比同任何其他非洲国家都更为友好。

一九六五年刚果总理冲伯下台后，坦桑尼亚同刚果的关系立即得到改善。大概因为尼雷尔非常藐视冲伯，所以他准备同新总统蒙博托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即便蒙博托是夺权的军人也罢。当蒙博托政府在一九六六年把四名前内阁部长公开处以绞刑时，尼雷尔只是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坦桑尼亚人同另一个非洲国家最激烈的争吵，是他们同马拉维，即从前的尼亚萨兰之间的争执。事实上，当前结怨的问题是：坦桑尼亚人坚持用殖民地时期的名字尼亚萨湖来称呼处于两国边境的湖，而马拉维人则早已把它改称为马拉维湖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马拉维总统班达博士。班达博士有一段相当奇特的经历。他在十三岁时离开他的国家，在南非、美国和英国读书，并在伦敦后来又在加纳行医。一九五八年，在他离国差不多已有四十年以后，他应召而回到尼亚萨兰去领导本国的独立运动。他的同事是一群把班达博士称为“我们的父亲”的青年人；他转而称呼他们“我的孩子们”。

一九六四年，尼亚萨兰获得独立，班达博士的孩子们当了他的内阁部长。可是几周之内，他们中间就有几个人同班达博士争吵之后逃命去了。四位或五位前部长在达累斯萨拉姆定居下来，其中有卡尼

亚姆·奇乌梅，他前几年在多多马曾经是坎博纳的好朋友和同校教师。

后来，班达博士指责坦桑尼亚政府庇护他那些背叛的部长，很可能情况是，马拉维人曾一度接受过一两个坦桑尼亚领导人或许就是坎博纳的援助。在坦桑尼亚人方面，他们对于班达博士同葡萄牙人合作并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日益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班达有朝一日会允许南非利用马拉维为基地，来进攻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另一个次要的刺激，是关于马拉维湖的所有权及其湖岸线的争执。有一次有人援引了班达特有的夸张语气的话说：“尼雷尔是最不配在那里叽哩呱啦大喊大叫的人。这件事是他挑起的。去年他对属于我们湖的一部分提出要求而把我惹火了。他指望我依然保持缄默吗？他认为我也象他自己那样，是一只水母吗？我不是水母。我的背上是有脊骨的。”

据说尼雷尔认为只要班达在掌权，坦桑尼亚和马拉维的关系不会有多大改善。一九六六年，当两国即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会谈时，班达宣称谈判应主要讨论坦桑尼亚交出在达累斯萨拉姆避难的几个马拉维部长。据说尼雷尔曾打电报给班达说：“如果你不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就没有必要举行会谈。”

自从坦盟成立的早期以来，尼雷尔就一直强调发展地区性的联合作为逐步达到非洲统一的重要性。然而他并不赞同恩克鲁玛关于成立非洲联盟的号召，因为他认为在现阶段这种号召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只是为了自己。他还表示不应容忍加纳普遍存在的贪污；一九六六年恩克鲁玛被推翻以后，尼雷尔对朋友们说：“他在容忍贪污上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把他毁掉了。”

尽管如此，尼雷尔由于恩克鲁玛的倒台而非常忧伤，并把这件事看作是非洲人反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事业的一次失败。五年以后，密尔顿·奥博特的下台使他更为难过。在乌干达发生军事政变时，奥博特正在新加坡出席英联邦总理会议，会上他曾联合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以退出英联邦相威胁，如果英国政府继续打算恢复向南非出售军火的话。

一九七一年初，在奥博特被推翻以后，尼雷尔宣布坦桑尼亚要训练一支“民兵”或国内警卫队，以加强国家的防卫。他在演说中列举一些事件，说明这种民兵也许是有用处的：一九六一年卢蒙巴在刚果的遇害，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一年恩克鲁玛和奥博特的先后倒台，一九七〇年一支敌对部队对几内亚的袭击。据几内亚指控，这支敌对部队得到葡萄牙的支持，其中有一些人是白人雇佣兵。尼雷尔把这

次对几内亚的进攻，说成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特别是因为坦桑尼亚象几内亚一样，同葡萄牙人有一条互相敌对的边界。

在恩克鲁玛倒台几个月以后，尼雷尔曾谈到军事接管政权之风正在席卷非洲。尼雷尔说：“士兵们参加进来，据他们说，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建立一个政府的方法有它自身的逻辑。如果他们是靠枪弹进来的，再让他们放弃依靠枪弹所得到的地位，那将是不容易的。”

当人们问他有没有办法使非洲不发生内部政变时，尼雷尔回答说：“你怎么着手呢？恩克鲁玛常常讲到设立一个最高指挥部。我不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假定这个最高指挥部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由各国政府组织一个联盟，来保护自己，对付外部敌人。但是你怎么能用北约组织去阻止在英国发生的政变呢？外国军队怎么进入该国呢？我在这一点上和恩克鲁玛意见不同，因为非洲最近将不会受到来自外部的进攻。我的答案是要有象美利坚合众国那种基础的统一，这就是解决我们内部问题的答案。”

尼雷尔说，只有非洲国家受到“外部国家的真正颠覆”，另一个非洲国家才有理由进行干涉。“但如果坦桑尼亚出现了内部的叛乱的话，非洲怎么办呢？入侵坦桑尼亚吗？谁来入侵呢？”

第十二章

只要尼雷尔的当务之急是发展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要他敬慕艰苦奋斗的生活并憎恶奢侈的话，他对中国入迷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尤其同桑给巴尔的合并，促使他进一步向左转到一种新的政治平衡，中国就成为一个主要的外国受益者。

北京政府已表示正要寻求途径加强它在东非的外交活动。一九六四年一月的革命发生后几个星期，中国人答应给桑给巴尔五百万英镑无息贷款和运送一批军火。约在坦桑合并后两个月，即在六月份，中国又给坦桑尼亚一千万英镑。八月份，尼雷尔签署了由中国派遣十一名军事技术人员的协议，忿然反抗西方外交上的压力，因为他们反对此举；尼雷尔指出，他手下的军官多半是英国训练出来的，而且他刚刚同西德签署一个训练飞行大队的协议。

一九六五年二月，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把中国的情况同自己国家的问题联

系起来，颇为感动。他对中国东道主说：“如我能把一千万坦桑尼亚人都带到中国看看你们解放后的成就时，我愿这样做。”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时我认为我们国家期望从中国这样的国家得到经济援助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是非常勤俭节约的，而我们却不是这样。”他说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他，中国外交部有三千多工作人员，但只有十部汽车。“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奥斯卡（尼雷尔的外交部长）。”

一九六五年六月，他欢迎中国总理周恩来到达累斯萨拉姆访问。周重申了他前年的那句名言，“非洲的革命形势特别好。”肯尼亚和其他几个非洲政府曾反对这个不吉祥的预言，但尼雷尔把这句话解释为号召进行社会和经济革命。他说，“非洲的革命条件是很成熟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周恩来对此是不能负责的。如果不允许发生革命，那么非洲就不成其为非洲了。”

在为周恩来举行的国宴上，尼雷尔描述了访问中国对他有多么大的意义：“在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期间，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即你们的政府和人民对事业全心全意的努力……以及自觉的厉行节约，这一切都是为了集中全力来进行建设。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教益。”好象在强调他所说的这

一点，四天以后，尼雷尔宣布政府今后在官方招待会上只供应啤酒、不含酒精的饮料、茶和咖啡，不供应别的饮料。政府今后为官员购置汽车，除了四轮传动车辆以外，一概不得超过九百英镑一部。

尽管对周的接待是热情的，尼雷尔在致词末尾以具有他的特点的警告语气谈了坦桑尼亚的独立问题：“不管来自那一方的指挥或新殖民主义，我们都不接受，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松对颠覆我们政府和民族的警惕性。我们绝不出卖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国家以及决定我们未来的自由。”

尽管中国人不久便表现出还不十分了解尼雷尔，但是他们不论在当时或以后，在同坦桑尼亚人打交道中从未犯过任何严重的错误。周访问达累斯萨拉姆后不久，尼雷尔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使坦桑尼亚没有在关于越南和罗得西亚的最后公报上签字。约在同时，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被推翻，尼雷尔对本·贝拉是很尊敬的，因为他支持南非反对白人政权的解放斗争。为了使原定六月二十九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按时进行，中国人表示要立即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新政权。据说尼雷尔颇感震惊。他问道：“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吗？友谊并不意味着只是因为一个朋友被打倒，你就可以把他忘掉。现在当本·

贝拉在监牢里时，他们要我去阿尔及利亚。我的朋友们不懂得这一点使我吃惊，我的因此吃惊也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

他采取了除非释放本·贝拉或者经过审讯证实有罪，他就不去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几天后，也使尼雷尔感到沮丧的是，以前积极支持本·贝拉的阿尔及利亚大使，于政变后从阿尔及尔回到坦桑尼亚，他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上斥责本·贝拉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挑拨离间”以便使自己当独裁者的家伙。该大使说，“一切秩序都很正常，局势已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尼雷尔从此不再在国家大厦接见他。

中国已着手进行一项旨在引人注目地显示它对非洲友好的计划。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在一九六四年独立前的好几年，就想修建一条往北到达坦噶尼喀海岸的铁路，因为赞比亚没有出海的通路，它的铜的出口和它的进口货物都要靠那条穿过罗得西亚和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领土的铁路来运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赞比亚人就下决心要在北方修建这条铁路；他们感到，即使英国和它的盟国不愿制服罗得西亚的叛变政权，他们至少可以修条铁路来减少对由白人统治的南方的依靠。

早在一九六三年，卡翁达就同尼雷尔讨论了这个计划。尼雷尔同情卡翁达的困境，此外，他并把这条铁路作为开发坦噶尼喀西南地区的工具。卡翁达恳请西方几个国家——英、美、法、西德以及日本——的支持未能成功，但在一九六四年，中国人告诉他愿意帮助。下一年周访问达累斯萨拉姆后，中国派来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小队，对铁路线的坦桑尼亚部分进行初步勘察。

西方之所以裹足不前是由于工程费用问题，最初估计需要六千万英镑，后来增到几乎一亿五千万英镑。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作出的结论说，从运输量来看修建一条铁路是不切实际的，它另行建议只花费一千一百万英镑来改进赞比亚产铜地带与达累斯萨拉姆之间的公路。世界银行的这种观点也加强了西方国家不愿修建铁路的决心。在卡翁达催促下，英国和加拿大主持了另一次勘察，这次勘察于一九六六年结束，估计铁路修建费用为一亿二千六百万英镑，还要一千二百万英镑来扩建达累斯萨拉姆的港口。英、加报告提出的观点说，如果赞比亚把它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运输交给这条铁路的话，那么在经营上还是有利可图的。但在勘察完成时，西方原有的一点点兴趣也消失了。美国后来同意在伊林加和赞比亚边界的顿杜马之间用一千零七十万英镑

再修建一条公路。

尼雷尔一九六五年七月说，“我决心要修建这条铁路，不管谁为它的修建提供资金我都准备接受。”两个月后，他证实了中国愿意包修这条铁路：“现在我们只有中国一家肯定愿意承包”，再没有接到其他国家提供资助的建议。坦桑尼亚人不同西方争论一千一百公里铁路是否太贵的问题，但是他们责怪西方毕竟没把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人长期渴望的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发展工程放在最优先的政治地位。一九六七年末的一天，一位坦桑尼亚人对美国朋友引证了一段伦敦《星期日新闻》的文章说，美国在越南的卷入每天要花二千三百万英镑。他说：“我们的铁路只要花美国在越南的七天开支就修建好了。”

中国人勘测了两年，直到一九七〇年才签订最后协定。协定要中国给予一亿六千八百万英镑的无息贷款，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三十年中由坦赞两国各偿还一半。一切当地开支，包括中国派去的一万名工人的工资都出自中国赊给两国国营贸易公司的货物的销售。两国接受了这种风险：他们可能承销某些价高或者质量差的货物，而这些货物在别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购买的。

在所有外国对非洲已承担的援助项目中，坦赞铁路可以同苏联在埃及建设的阿斯旺水坝和主要用

世界银行以及美、英提供资金在加纳建设的沃尔特河水坝并驾齐驱。坦赞铁路是北京政府已承担的对援助项目中最大的一项。

除了这条铁路之外，中国已对坦桑尼亚提供了其他很多援助项目。自坦噶尼喀独立后，中国提供的贷款和赠款约有二千一百万英镑。在该国大陆上，他们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用二百七十万英镑建造一座友谊纺织厂，此外还建造一家农具厂、一个实验农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他们还用两条船开辟了一条从中国到坦桑尼亚的航线。在桑给巴尔，他们建立一个水稻农场，一个棉花农场，一家制鞋厂，一个抽水站，一家拖拉机修配厂。他们在桑给巴尔的影响一直在增长，而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东德的影响却在下降。东德人在桑给巴尔犯了一系列典型的援外错误，包括提供了两艘拖网渔船，由于那里没有冷藏设备，所以在东非水域不适用。

除技术援助外，中国现在为坦桑尼亚的陆军和几个从南非白人统治国家来的黑人难民营提供了二百名教官，这些黑人难民在他们自己的流亡政党主持之下，在营里接受游击训练。中国还为桑给巴尔的两个陆军营中的一个营提供约四百名教官。他们为坦桑尼亚的海上警察提供几艘巡逻艇。同时并协助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建立小的海军基

地，为此中国已答应再给六艘巡逻艇。

谣传说，中国还表示愿意协助坦桑尼亚建立一个空军基地，并供应喷气式战斗机。在训练坦桑尼亚陆军和空军中，加拿大起着重要作用已有五年的历史了。一九六九年上项协议期满时，坦桑尼亚人决定不再续订。这个决定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加拿大是个北约成员国，而葡萄牙这个非洲最后的殖民主义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之一。我们不能肯定坦桑尼亚人是否真的认为加拿大人会把他们的军事秘密告诉葡萄牙人，但他们可能推论，如果一旦同葡萄牙人发生战争，加拿大的立场将是暧昧不明的，而中国人的立场却不会那样。

尼雷尔对中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数字日益增长是否感到不安呢，他不承认这一点。他曾说，“西方不想修建这条铁路，它们也不要中国人来修。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没有铁路吗？”但他又说，“我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中国人会意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我们，就会自找麻烦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由于一系列对外政策事件的后果，坦桑尼亚这时正失掉它一向从英国、西德、美国等国家所得到的大部份外援，这时，有人问尼雷尔，他是否感到他的对外政策使国家在外援上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他说，“现在人们对我的批评是：我有太讲原则的倾向。这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发展资金。但是，这说起来容易，证明就难了。的确，我们失去了一些援助，例如，就少了英国七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你知道，困难在于贷款常同采购联系在一起，其次还有当地开支跟贷款结合的问题。但这次贷款，英国也支付当地开支。这是我们接受贷款中最好的一种。

“另一个例子，由于历史关系最乐意帮助我们的一个国家是西德。后来，在德国对坦桑尼亚统一问题的解释上我们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把我选出来并不是要我把我们神圣的国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西方是世界上金钱的真正源泉。西方的国家很富而又有经验。我一度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好，那个时期认为它最讲道理。但在建设上我们得到些什么呢？它们在援助别的国家进行建设的问题上是很少以慈善为怀的。不错，也有一点点。由瑞典领导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国家是个例子。它们觉得富国有义务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我认为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在瑞典几乎全国人民都有这种情感。当然，这种事情一切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多少也有一点。但还没达到支配政策的地位。在美国，居支配地位的是：你必须反共！特别是：在给与援助前，

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倾向是很重要的。”

有人问尼雷尔他是否感到一个不结盟国家比起同东方或西方结盟的国家来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尼雷尔回答说，“不，这是不确实的。那要看战略地位。举例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就是这样。对印度的援助不是为了亿万穷人，而是为了（印度人早几年曾与之作战过的）亿万中国人。印度人（从苏联或美国）拿到支票后会很自然地感谢中国人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非常不幸的世界上。权力之争是全球性的。如果我们处在中世纪，你可以恳求罗马教皇不要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而在美国和俄国之间分享霸权。不过，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中国起来了，到处都有中国的影响，它是不能忽视的。”

“非洲是欧洲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是欧洲的属地。就非洲所发生的事态来说，譬如刚果，世界上的人认为，哎，共产党在那里反对西方！至于加纳，则认为‘要求中国人和俄国人撤离！’但是，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

“如果没有冷战，我认为这本应是一场欧洲同美国之间的斗争，是美国领导着争取自由的斗争，欧洲说不，这一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冷战发生了，美国对俄国比对自由更加关心。于是它和欧洲打成一片，也成为殖民主义者了。而它自己却并未占有

一寸非洲的土地！我们对美国说，‘你是个革命的国家！’但不是这样，美国要听从它的盟国，而它的盟国是在欧洲。美国仍要通过伦敦来制定它对非洲的政策！在尼日利亚、加纳，当然还有东非问题上，美国决不会听从我们的。它愿意听从伦敦而不会直接听从我们。

“可是，欧洲仍要我们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而我们不愿成为任何人的势力范围，我们不是同美国进行斗争，我们要和它建立一种直接关系。（在回答《坦桑尼亚新闻》时）美国对我们的臆断是：‘他们要成为中国人！’我们懂得这个缩写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共产党人！”他举起双手做出非常失望的样子。

讨论的问题转到越南，而且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和美国。他说，“非洲国家真的关心越南吗？它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非洲问题上，它们关心的是它们自己的自由。它们对一国关系的好坏取决于该国对非洲的态度。我很难设想有那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对越南问题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外交上谈到这个问题是有的。非洲人可能会说，‘我们不懂得你们在干啥。’你们期望从我们得到的最多不过是我们的怀疑。

“我自己从未感到在越南问题上我能起什么特

殊作用。越南问题有两个方面——思想方面和冷酷的事实方面。思想方面是：美国人有权在越南吗？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因此，寻求现实的解决应当撇开思想方面的问题，应当承认他们在越南的事实，找出解决办法。只有大国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国的力量只能是道义上的。我们只能在道义上进行争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非常关心(越南的问题)，特别是我在伦敦遇到了麻烦后。”他说这句话时讥讽地打了个冷颤。他所指的是哈罗德·威尔逊一九六五年在对东南亚派出英联邦国家和平使团问题上把他孤立起来获得成功的事。“那时我说我不了解越南。我不同意派和平使团去，派和平使团是错误的，那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帮助的骗局而已。可是越南是个权力竞争的问题，基本上是个权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小国遭殃。越南正好被选作这场斗争的一条战线。坦桑尼亚也有此可能。”

尼雷尔说，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是试图以实力遏制中国的错误思想为基础的。“我不相信你能遏制中国。意义何在？不过，我懂得实力，因而，我了解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全球性的责任和观点。我了解这一点。我所不能理解的是美国早在越南战争之前就已开始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排斥中国是保证

世界和平的一种方法这个思想制订的。运用一切力量(军事的、外交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国际麻风病人来对待,使现代世界上没有人敢和中国接触,对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便是可疑的!这种恐黄病!对此我不理解。”

回忆起一位教会领导人物曾问起他支持中国人的事,尼雷尔说,“我愿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我相信是林肯说的——‘上帝一定爱护普通老百姓,否则,他就不要创造这么多的老百姓了!’”接着,他又很同情地说,“这些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有七亿之多,他们有权共享这个星球上的友谊和财富。但美国却说,‘你必须朝中国人的脸上吐唾沫!你在联合国必须每次投票反对中国!’这是废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作为道义问题我不理解这种做法。我不理解那些年复一年地投票反对中国——反对七亿人民的亚非国家。我不理解这一点,你们怎能用这种方法来争取和平呢?美国有一种基督教的道德。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里宣传仇恨是件很坏的事;但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也唱起仇恨歌,仇恨、仇恨、仇恨七亿人民……!”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可惜的是我必须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说这话。如果我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说话时,我就要站在乞力马扎罗的山顶上大声疾呼道:

这是错误的！

“中国人(外交和技术人员)来到了坦桑尼亚：单是他们的到来就是个问题。开始，当人们问我在这里的中国人时，我回答说，‘他们没有给我增加麻烦’。现在人们又问我，‘为什么他们没有增加麻烦？为什么他们在坦桑尼亚这么驯服？’我甚至收到美国朋友带来的一封写给报社的信，要我回答一些主教和大主教提出的问题，他们感到我对中国太友好了。这样一来，主教和大主教也对这个问题不安了。我想圣灵不及主教对此事关心，否则，我要面临严重的后果了。

“感谢肯尼迪，美国人正在试图调整他们同俄国的关系；但是，他们却不能接受中国——一个高尚的民族，一个具有好多世纪的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是很自豪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巨人了，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如果我们正在开始了解俄国的话，为什么不去了解中国呢？

“肯尼迪是我尊敬的人，他是个好人，一个伟人，可是有一天他不得不对俄国说，‘从这里滚出去’，全世界的人说，‘我的上帝！这要发生核战争的’，肯尼迪还是冒最大的风险说，‘从这里滚出去’。不管我们会说什么，中国可能感到美国离它太近了——美国

太强了，不能离得太近。

“我不理解，美国怎能单独地争论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同时也单独地为拒绝接纳中国而力争。我了解德国，这就是我们不承认东德的原因。中国人自己告诉我这不是一回事”——他大笑起来——“但是，我看这是一回事。”

“这就是我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必须学会同中国共处。”

因为尼雷尔常常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从冷战的观点来评论非洲的倾向，他的来访者就问他是否觉得真有非洲的共产党人这样的事情。他回答说，“明确地讲，根据定义没有什么非洲的共产党人，非洲的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非洲的基督徒吧了。”“不论你在非洲那里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有这样的事。可能出现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他们到过欧洲，在知识上成为共产主义信徒。可能有这么一些人，一群文化很高的人，觉得共产主义是很吸引人的，但常常失望。

“他们从欧洲回来，面临着非洲的困难，怎样才能把共产主义应用到非洲来呢？你如何在非洲运用这本共产主义教科书呢？那种书本上的共产主义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学过的，但是，你怎样在苏库马兰来进行和宣传共产主义呢？在一个没有封建主义的

农民国家里你怎样进行这种活动呢？怎样开始呢？

“非洲共产党人有一个现实问题。他可以在伦敦学习共产主义，但一回到非洲便发觉它是一种无法应用的工具，于是便认识到他必须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从远处看，非洲好象是处于典型的共产主义的形势之下。但是，实际上，它仍处于苏库马兰人的原始状态之中。”

几年后，在考虑同一问题时，他写道：“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把历史发展分为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这几个阶段，社会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来的。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正统的道路。在中国，他们甚至有过度发展的封建主义和一些资本主义要去消灭。在非洲，一般说来，我们必须从部落公社和没有建立起很多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遗产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南非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这才是个你能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般说来，要在非洲应用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使之适应农村经济。这种经济比起俄国或者中国革命者所面临的更加原始。一位好的非洲共产党人将被迫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

第十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尼雷尔开始了他在独立以来距离最长的内地巡视，四星期的旅程使他走遍了坦桑尼亚大陆国土上十七个专区中的八个，最后在阿鲁沙参加三天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了这次旅行。他在会上宣告已完成了一个后来称为阿鲁沙宣言的文件。这是他在独立后所写的许多重要演说稿和政治文章中最最重要的一个。

尼雷尔的许多正式演讲稿，通常从英文译成斯瓦希利文时，是由国家大厦干部来润色和翻译的，干部成员中包括一个作为他的私人助理的英国女人琼·威肯和总统新闻秘书保罗·索齐格瓦。可是，这篇六千字的阿鲁沙宣言，却明明是以尼雷尔本人的文体写成，直率，生动，没有他过去许多演讲稿那样拘谨。“宣言”一开始就肯定坦盟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并概述了党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政策纲领。“宣言”强调指出，政府用业已增

加的税收来支付发展工作的费用将是非常困难。它说：“知道有更多牛奶就能办一切事情并不能改变牛挤不出更多奶这个事实。”至于外援，“宣言”说，坦桑尼亚不能单靠它：“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国家是贫穷的，所以依靠金钱作为发展工作的主要手段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我們想通过外国的财政支援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财政资源来摆脱我们的贫困，那是同样地或者是更加愚蠢的。首先，我们拿不到这笔外援的钱。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准备给我们无偿援助或贷款，或者协助我们建立各种工业，直到我们完成全部的发展目标……即使所有的繁荣富裕国家愿意援助贫穷的国家，其援助仍是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繁荣国家并没有承担同全世界的贫困作斗争的义务。”此外，“宣言”还说，“独立意味着自力更生。如果一个国家依靠另一个国家的赠与和贷款来发展的话，这个国家的独立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独立。我们怎能依靠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来完成我们的大部分发展工作，而不把我们很大一部分随心所欲的行动自由交给那些政府和国家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它在结论中说，唯一的答案是依靠自力更生较慢地发展，重点是发展小农的农业经济。

“宣言”后面附有一份新订的“坦盟和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准则”。其中具体规定：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

得持有私人企业股份或在其中担任管理职务，不得领取两份或两份以上的薪金，或者拥有出租的房屋。

尼雷尔回到达累斯萨拉姆的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向阿诺托格卢运动场上的群众讲了两个半小时有关“宣言”的事。他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别人不答应给我们钱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订出计划去做。”可是，他又说，“拒绝接受一个外国工程师或一个外国经理的指导，这可不是自力更生，这是愚蠢。”

就在那第二天，同胞们惊愕地听到尼雷尔宣布：政府正在把在坦桑尼亚的一切银行实行国有化，作为实现阿鲁沙宣言的第一步。他保证对实行国有化的资产给予完全的补偿，并强调私人存款不受影响。他对聚集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坦盟总部前面的军人和警察说：“市民们，我自己就有钱存在一家国有化的银行里。我的钱是安全的。已接管的是机构，不是客户的存款。”有几名阁员因为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这一胜利而高兴得相互拥抱，军人们在这二月的炎热天气里欢呼并挥舞旗子。

在这以后的两、三天内，政府宣布计划对一些保险公司、进出口公司、工厂和大剑麻种植园实行国有化，对其他七家生产水泥、卷烟、鞋子和啤酒的工厂购买大部分股份。当时从伦敦和内罗毕传来了恶毒

的预言，说坦桑尼亚政府将无力偿付实行国有化的资产，并且接管后在经营上也会遇到困难；结果证明这两种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些资产的价值最初估计为一亿镑，但是到一九六七年末就看出它仅约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镑。政府提升了一批雇员担任因外国工作人员被遣返回国后空出来的工作，在少数情况下，也从国外聘请了一些专家来经营这些国有化的公司，直到训练出坦桑尼亚自己的专业人员。第一年年终时，尼雷尔发表了一篇讲话，表扬在坦桑尼亚的印度人，因为那一年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在坦桑尼亚的前途，并且也担心英国移民法所规定的新限制；即使持有英国护照也不让他们移居英国。尼雷尔说，这些印度人使银行的国有化得以顺利进行。“这些人应受到我们国家的感谢。可是现在，”他惯于用他自己的桑纳基族人作例子说笑话：“如果一个桑纳基族人到银行去借钱，因为他没有任何抵押品遭到拒绝，他就会跑到我这儿来，说印度人互相包庇，我们应该用桑纳基族人当银行经理，万安奇（同胞们），我请你们注意这种思想。”

随后，政府与一些公司缔结了协定，参加了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意大利建造的太珀炼油厂和所有其他石油工业的股份；一九七〇年初又宣布接管由亚洲人控制的整个批发商业系统。政府把国内唯一

私营的英文日报——坦桑尼亚《旗帜报》收归国有。在独立后的年代里，《旗帜报》的英国编辑们企图使报纸的社论采取一种同情的立场；但是《旗帜报》的连锁销售权是属于在白人统治的南非拥有大量股份的英国隆尔霍联合大企业的，这使这份报纸在坦桑尼亚人的眼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可疑。作为一份直接对尼雷尔负责的官方报纸，《旗帜报》理应采取半独立性的方针；在它创刊的头几天中，它曾发表了一篇报道，结果导致二十六名无辜被捕的外国人获释。可是在坦桑尼亚历史的这一时期，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水平是相当低的，早在政府接管《旗帜报》以前，这一事实就影响着它的报道了。

一九七一年初，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尼雷尔称之为“扫荡”措施的法案，批准对价值在十万以上坦桑尼亚先令(约五千九百英镑)的所有的商业大楼、公寓房屋、甚至单幢住宅(房主自己居住者除外)，都实行国有化。该法令规定只对建筑物盖成不到十年的房主支付补偿金，显然其理由是因为拥有十年以上旧建筑物的房主，他们的投资已收回足够多的利润。采取这一措施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动机的鼓舞；同时也由于担心再发生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年代里曾出现过的那种利用房地产渔利的现象。但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被涉及到的资产是属于亚洲人的，这一

措施产生了进一步缩减当地亚洲人的财富的效果。

继阿鲁沙宣言之后，又有两份补充文件：《自力更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第一个文件是个修改全国学校的教学方针的计划，它首次指出必须着重教育大多数学生回到农村而不是去争取升学进入高等学校。第二个文件概要地叙述了建立“乌贾马”（家族式）合作村的三个阶段。文件说，首先应说服一批农民把家搬到一个集中而又靠近水源的村子里，并在村子附近种庄稼。然后再说服他们建立小规模公共农区，假定十户一组，共同劳动，分享收成。最后，如果第二阶段能够完成，下一步计划就应当转入建立公社农场。文件强调说这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后阶段就是我们奋斗的理想。文件说：“富裕不会自动地到来，虽然我们大家都可能变得比现在稍为富裕一点。”有几个合作农场在坦桑尼亚已存在很久了，如尼雷尔在一九六六年去塔波拉旅行期间曾视察过的卡齐马的妇女农场。到一九七〇年底，据说全国拥有一千多个自称为“乌贾马”合作村。

国有化规划是国外报刊对阿鲁沙宣言广泛议论的唯一问题。大部分议论重新提出这种看法：认为坦桑尼亚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甚至尼雷尔讲过一个笑话，大意说坦盟的青年团员是坦桑尼亚的“绿卫兵”，

也被当作新奇的证据，说穿着“中国睡衣式服装的”尼雷尔已拜倒在毛主义的阴影之下了。

可是在坦桑尼亚人看来，“宣言”最重要的部分还在于政治领导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九六七年六月，碧碧·蒂蒂·穆罕默德辞去了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和坦盟中央委员的职务。她说身体有病，准备“回到厨房去”；可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家都明白：她要在政治生涯和房地产租金收入之间作出抉择，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她“挑选了资本主义”。

尼雷尔在三月间告诉全国执行委员会：他自己也遵守新规定办事。他说，他的妻子以前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姆杰·姆韦马经营一个家禽饲养场，现在已经把它赠送给姆杰·姆韦马合作村了。他说，他已经卖掉达累斯萨拉姆马戈梅尼区的旧住宅，现住在姆萨萨尼湾的一所用银行借款建造的新住宅里。他说除了从出版第一卷演说和论文集《自由与统一》所得到的少量版税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宣言”发表以后的几个月，是一个政治上的紧张时期，在此期间政府领导人都在努力作出如何遵守法律的决定。议会于十月通过一项关于领导人的法案，要求议员们各向议长报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和资产；议长则直接向总统报告他自己和妻子的财产。一位朋友问尼雷尔是否可以有一个过渡时期，以

减轻对那些受到影响的领导人的打击。尼雷尔厉声回答道：“不！这样做只会让人们有时间去打掩护。我们必须现在就实行。你谈的充其量不过关系到一千人的事；我谈的是关系到一千三百万人的事。”可是，该议案还是给予领导人一年的时间来“洗净”自己，并容许享有遗产的人用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处理：或卖，或送，或者辞职。到九月中旬，大约三十名有额外收入的议员，为了保留自己的议员席位，放弃了每月五十三镑六先令的议员薪金。

据人们广泛地传说，尼雷尔之所以搞出这个“宣言”是由于他对国家发展的情况感到失望。据说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内地访问了一些自独立以来生活改善不多的农民。他已意识到有特权的人走向腐败的端倪，虽然同尼日利亚、加纳甚至肯尼亚这样一些国家的情况相比，腐败的程度是很轻的；在那些国家里，因拥有更大的财富和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已使更多的金钱流入到一些领导人手中。但是他很厌恶这种现象，并相信它能破坏非洲自由的意义。

可是，尼雷尔否定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宣言”是上述影响的直接结果。几个月以后，他对一位来访者说：“如果你知道全部实际情况，这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他在本子上记着，一九六二年他用斯瓦希利文写了一本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小册子，其

中有许多论点后来包含在阿鲁沙宣言里。“最重要的内容，即讲自力更生这一部分，可以在一九六二年的论文中找到。在谈到依靠人民的劳动来实现发展，论文说，其利益应归人民自己所有，不是归人民的领导人所有，这一点必须明确。

“去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写好了一本小册子的草稿。我们停止贷款给公务人员去建造住宅，因为后来发现他们有时出租这些住宅。我们声明过，我们将停止这么做，拉希迪(卡瓦瓦)也在议会里声明过我们将停止这么做。对于象专区和地区专员这样的行政人员也不得给予这种贷款。”

他说，他不断地仔细考虑着用什麼最好方法向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直到他认识到：“我们不能只谈住宅问题，我们必须谈领导与财产的关系。依据财产来看领导的责任心。最好的方法是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没有剥削，然后规定它几条什么是剥削。这些想法启发了我：我改变了突然出小册子的想法，而把社会主义不应有剥削作为会议中讨论的主题，‘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不，”他苦笑着说：“它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挫折，不如说是由于鼓舞。它只是确定了我们所应当做的那些事情。‘宣言’讲了两件事：一是没有足够的援助给发展中国家。第二，即使有足够的援助来满足我

们的全部发展工作的要求，而‘宣言’还说不行，依靠援助是错误的。”

有人问尼雷尔：他实际上是否在打击社会上的全部特权集团。“是的，”他说。“这是我们的意图。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发展，那么必须对人民来个说明：利益将是属于人民自己的。所以我们不妨说：‘很好，我们现在揪住一个集团，以后再揪另一个。’你可能说，‘我们要揪的只是印度人。利用非洲人来协助我们同印度人斗争，非洲人是会给予帮助的，因为他可以取代印度人。揪从国外移入的侨民。’你可以这样做。但你只会使问题延迟解决。我们已为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怎么能容许少数本国人进行剥削呢？所以我们把外国投资者，本地资本家，以及我们自己的政治领导人看成一种人来对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时也在揪群众。我们鞭策每一个人。

“我们怎么能使人民去追求他们所不理解的目标呢？我们的目标的定义必须是全面的——并且是不妥协的。既然作出银行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决定，拖延实施就对国家经济更加不利。我们前进的速度取决于国家的现实情况。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正在要努力干什么。”

突然，至少对每一个阅读由坦盟主办、在达累斯

萨拉姆出版的日报《民族主义者报》的人来说都感到突然，全国掀起了一阵参加支持阿鲁沙宣言的进军行列的热潮。九月初，《民族主义者报》的一则新闻报道开始写道：“在阿鲁沙精神火焰的锻炼和改造下，九名英勇的青年已列队从辛吉达出发，举行路程最长的进军——穿过八个专区——以表示对阿鲁沙宣言、总统和党的支持。一支由一百零六人组成的包括各种年龄的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正在南下向着首都前进，这些参加进军的英勇的人们将在那里同党的领导人进行革命的会见，并保证他们对阿鲁沙宣言的支持。……这些英勇的进军者将献交尼雷尔三百三十先令，作为他们帮助青年英雄烈士塞蒂·本杰明的双亲的一点献金。”塞蒂·本杰明是阿鲁沙人，二十岁，在向达累斯萨拉姆的进军中因为衰弱而在莫希去世。

九月二十六日：“一支由平均年龄在四岁和六岁之间的七十四名英勇的孩子组成的队伍，已从警察学校的幼儿园进军到莫希城。”

九月二十七日：“英勇的青年英雄和烈士塞蒂·本杰明·姆平加所属的队伍，目前正在南下向首都前进，他们将在那里当着尼雷尔的面保证他们对阿鲁沙宣言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十月九日：“一队十六名坦盟青年团员，为了表

示支持阿鲁沙宣言和总统提出的有关监禁国家叛徒的建议，从恩加勒·纳尼尤基向阿鲁沙进军，走了三十五英里，途中他们发现有一群大象和平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这些忠诚的坦桑尼亚大象在领着队伍走了一段时间后，改变了路线……”

后来，突然，朱利叶斯·尼雷尔也参加进军了。十月三日，他开始在他的家乡马腊专区内，作一次好象是普通的旅行。在一个村子里，他告诉村民们要提防两种危险：外来强国对坦桑尼亚的统治，和过量地喝土酿的蓬贝酒。然后（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他和他的伙伴们走了十二英里，从他的出生地布蒂阿马走到了基阿巴卡里村，第二天他们走了二十二英里到了布恩达。几天后，《民族主义者报》报道说：“尼雷尔总统带着革命的总统纵队，进一步深入到姆万扎专区，从昌加萨走到革命的进军者正在休息的地方尼阿卡博贾，历程十五英里。”它又报道说，在尼阿卡博贾，“全村都沸腾起来了，到处洋溢着阿鲁沙精神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

总统的伙伴们在第二天到达布恩达时，又累又热。大家筋疲力尽地在汽车拖着的绿白两色活动房屋的背阴处坐了下来，这所活动房屋是政府最近为国内行军购买的。有人问国务部长布霍凯·穆南卡，进军的情况怎么样。“厉害，”他哼着说。尼雷尔的双脚

涂满了爽身粉，他正坐在一张斜靠着活动房屋的帆布椅子上休息。最近被任命为马腊专区的专员，他以前的秘书阿克兰德·姆希纳抱怨说，他的腿擦破了，并说：他刚才从萨拉基基亚少将那里听到，一个进军者应该每走十英里就把自己的两只袜子掉换一下。“‘你的意思是我每走十英里就得更换我的轮胎？’我问他，他说是的。我得告诉我的儿子。两天后他将出发，开始他自己参加的一次进军。”尼雷尔一行中最擅长行军的原来是总统的前任新闻秘书哈欣·姆比塔，他已调在坦盟总部工作，随后担任了党的执行书记。前一天，姆比塔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到姆万扎，然后乘长途公共汽车从姆万扎赶到布蒂阿马——历程一百三十八英里。当哈欣知道伙伴们已离开了布蒂阿马，又跑了十二英里才赶上了他们。

傍晚，太阳落山时，尼雷尔在布恩达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他脱下卡其布裤子、衬衫和帽子，穿上了坦桑尼亚服装。他讲不要把牲口当作一种财富的象征来养着。必须使用它们去耕地，“美国人在飞向月球，而我们还在睡觉！”他还谈到非洲人不能管理自己的事务是非洲的耻辱。他的眼睛睁大了；他象往常一样活泼起来，当他提高嗓门断断续续地说笑话时，群众同他一起笑起来了。那天他本来是不准备讲话的，可能他宁愿让进军本身来说明问题。第

二天，当专员请他在下一站讲话时，他拒绝了。他好象决心要避免采用到处演讲这种政治姿态的常规。后来，不少村民在他经过时简直显得非常惊奇。他低着头，戴着一顶塌下来的帆布帽，走在进军队伍中没有人认得出他来。

乡村的景色是壮丽的，维多利亚湖的湖水在地平线上闪耀着光辉。路旁是露头的岩石和人一样高的蚁塚。因为雨季来迟了，土地干得尘土飞扬。约瑟夫·纳马塔自言自语地在嘀咕：“如果你要我的腿，你就拿去吧。”和阿克兰德·姆希纳一样，纳马塔以前也是尼雷尔的一名干部，最近他担任了专员。

在布恩达的那天晚上，三家啤酒店和一家茶室都挤满了人，这是独立以来最激动人心的盛事。在海希马酒吧间的墙上挂着四幅毛泽东照片，和一幅尼雷尔照片。中国大使是否到过这个乡镇并且赠给了一所新建立的公共会堂一百镑钱呢？酒吧的主人是否在邮件中收到这些照片，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就把照片挂到墙上去的呢？

在布恩达睡了四、五小时后，他们在两点钟醒来，不久又上路了，大家用手电筒照着路，跌跌撞撞地走着。尼雷尔在萨拉基基亚少将后面，走在左边，少将走得仍旧象赛跑运动员一样轻快；尼雷尔旁边是两名保卫人员。大家尽量走在深陷的轮胎车辙里，以

避开松散的砂砾。突然，两个人跳到边上去了，因为路中有一条蛇盘着，一个士兵老练地把蛇踩死了。

总统终于命令休息十分钟。“好伙伴们，我们一口气走了两个半小时了。”哈欣·姆比塔倒净了鞋里的砂粒。尼雷尔看到了现任姆万扎专区的专员约瑟夫·纳马塔穿的一双褐色小山羊皮的尖头皮鞋。“啊，曼哈顿，”尼雷尔假装嘲笑地说。“太不象样了。”那年尼雷尔一直在要求坦桑尼亚妇女们唾弃“美丽迷人的幻想”和“曼哈顿生活方式”。队伍在穿过一座桥后又停了下来，在乡村警察所的旁边，喝些茶，吃些面包，随后吃些煮鸡蛋。一个士兵说，“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前进，不要等我们的肌肉变僵硬了再走。”但是队伍并没有马上再走，而是逗留了八个小时，直到白天的热气消散后才出发。总统退到自己的活动房屋里去了，一路上这所活动房屋由一辆军用卡车拖着，穆南卡和纳马塔开着车走了，也许到路前面的那个传道会所去休息了。其他的人就躺在一些“陆上游览者”牌汽车的车篷布上，或者把自己的背包铺在警察所里的混凝土地板上。当一顿有咖喱的便餐准备好的时候，姆比塔就去给一名西方来客找一把匙子，别的人都按照非洲部族的习惯，就用自己的手指抓着吃起来了。哈欣是一位粗鲁的好主人，他说：“吃一只香蕉吧，喂！多吃一点！”

两名保卫人员靠在一辆“陆上游览者”牌汽车上，谈起了到纽约去访问的问题。一个人问道：“你以为我们将来也会象那样吗？”谈到坦桑尼亚在最近五年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时，他们抱着有点怀疑的态度认为是有的，坦桑尼亚是在变化，但是非常慢。萨拉基基亚谈到他的爬山活动。他说，他已经爬过乞力马扎罗山八次了。他曾发誓要每年一月份去爬一次。他说，但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没能够去，因为非常忙。

下午五时半，穆南卡、纳马塔和其他一些人折回来了。有人用非洲人嘲笑的字眼，对驾驶梅塞德斯-本茨牌汽车的这伙新贵的阔佬政客们喊叫说，“瓦本茨吗！”后来，总统从他那所活动房屋里走了出来，队伍就再继续前进。这一次预先通知了沿途村民，人们打着鼓，拿着旗子，以及许许多多儿童都参加进军的行列。儿童们一直挤在队伍的前面，有些进军者不断地把他们推到路边去。队伍到达路旁的一个警察营房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大家围坐在活动房屋前面，喝着啤酒和凡塔橘子水。总统很高兴。人群中有一位赤着脚刚参加进来的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总统指着他带着玩笑的口气说：“就是这个人，他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他打败了我的财政部长。”哈欣·姆比塔正在读着一份

刚从达累斯萨拉姆送到的《旗帜报》。他激动地宣布，卢古沙酋长在塔波拉乡村选区击败了七名竞选者，当选为该地区的坦盟主席。“卢古沙酋长？”尼雷尔喊了起来，看上去好象对这个古怪的报道抱着一种宿命论者的态度，相当高兴，一九六四年兵变事件以后，卢古沙曾遭受预防性的拘留，被监禁过三年左右，现在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已被选任了党的较低的职位。

饭迟迟没准备好。“我们得吃饭了，”纳马塔说。“本来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睡下来了，”萨拉基基亚说。最后，在九时三十分，队伍中的十二人开车到两个美国马里诺尔牧师的舒适的住宅去了。牧师们竭力款待他们，不辞劳苦地给他们弄饮料，但是这些进军者已疲劳得几乎瘫倒了。有人抱怨说，头天晚上在布恩达因为有音乐演奏，真难于入睡。“只要有决心睡觉，”哈欣说，“你就能睡着。”

他们在三时醒来，已经迟了一个小时。开车的人出了什么事了？后来，当他们在四时三十分经过传道会所时，有一个牧师站在那里等着，也参加了进军。“哪一位是总统？”他问。他们走了三个小时半，中途一点也没休息，等到最后停下来时，他们已走了十五英里。这时他们在活动房屋周围坐了下来，象总统召开的一个非正式御前会议似的，人人都倾

听着谈话，偶尔说上一两句俏皮话。那个年轻的牧师一直在他们后面徘徊，后来穆南卡说：“啊，可怜的家伙在这儿，昨天夜里我们搬进他的屋子里去了。你后来睡在哪里呀？”牧师高兴地说：“睡在汽车里。”为了打破这层无形的隔阂，尼雷尔说：“啊，那么你也一直在进军？啊，好的。好的。”这时警察端来了放了牛奶和糖的茶，以及煮鸡蛋。

进军者一直继续走了八天，总共走了一百三十八英里，最后到了姆万扎，他们准备在那里参加坦盟全国会议。在离姆万扎还有三英里的地方，城里有一半人都出来迎接他们。《民族主义者报》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一片农民的呐喊、军乐悠扬和妇女的叫声中，总统满怀革命信心，笑逐颜开地领导着他的队伍，走进街道中挤满了欢呼人群的山顶城镇。……尼雷尔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城来的情景，使群众惊羨不已，他们看到总统身体这样健康，敬佩和激动的心情几乎达到发狂的程度。全城都由阿鲁沙精神激起的革命热情支配着。”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尼雷尔的司机卡巴卡说，当他自己不得不开着汽车时，他真不好意思看着总统在他前面走了一百三十八英里，他要放弃他的十四天休假来支持阿鲁沙宣言。那位烈士塞蒂·本杰明的队伍的成员则走了四百五十英里，到达累斯萨拉姆后才转乘火车前往姆万扎，

他们在姆万扎结束了这次长期的旅行。

“我对这件事曾考虑了几个星期，”尼雷尔后来在解释他为什么决定参加进军时说。“我一直对这些青年(向达累斯萨拉姆进军的)说：‘不要听那些人的话’”——那些人怀疑进军是否有益，并认为把精力用在地里干活会更好些。“毕竟，”尼雷尔笑嘻嘻地继续说，“看起来这些孩子不是在建造大桥！但进军是要他们接受今后建国艰巨工作的挑战的一种象征。

“我想，我能够鼓励他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也参加这个青年运动。同样，我感觉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必须说‘现在停止吧’。但是你怎样去说和谁来说‘现在停止吧’这句话呢？因此，参加了这次进军后，我可以说‘现在停止吧’。但是，参加了进军第三天之后，我想，‘这是件很有益的事。为什么说停止呢？如果进军对我是有益的，那么对他们也是有益的。’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进军。

“同样，”他用手指着他的新任的新闻秘书保罗·索齐格瓦说，“我的这些同事们，经过进军之后，我现在比以前更了解他们了。”

但是最后，当八名圣安德鲁学院的青年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走了四百十三英里到达阿鲁沙时，尼雷尔告诉他们，“雨季已到。因此应该停止进军，人们应该开始干农活了。”

第十四章

一九六六年末，有人问朱利叶斯·尼雷尔：在独立后的头五年内，他的政府没有发生过怒气冲冲的争吵或分裂，没有一名部长逃亡或被关入狱中，这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确实如此。我们未曾有过粗暴地罢免某人职位，也从未有人采取激烈的辞职行动。这有一个客观原因，即：我是幸运的。我是非洲最幸运的总统之一。我的同僚很忠于我。的确，人们猜测有些集团正在反对我；但这种猜测是不正确的。”

“你搞调动职务。当然，我是常常这样搞的。只有一两个人长期担任某一种职务。这就是所罗门·埃留富（教育部长，后因病辞职）。他担任这个职务象个素丹。我免除了一些部长的职位，而给他们其他工作。我任命了其中两人当大使。但是，我为什么要动摇这种有人讨厌的制度呢？它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是很合适的。”

“我认为原因在于我的性格是不喜欢调动人事

的，确实也是这样。至少部分原因是这样。这种性格有缺点；因为不予调动，就会保留过多的不称职的人，我不知道，要是另外一个人当总统的话，他也许会为了能力胜任的问题而动摇这种制度。这有可能。

“我的同僚懂得他们是我的同僚。许多人来自党，如：拉希迪、奥斯卡、博克。这些人构成政治集团，是党的老战士。贾马尔也是，尽管他由于章程的规定没有能在党成立时入党，但他实际上是党的创始人。德里克·布赖森则入党稍为晚了一些。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政治集团就是个党。它给国家带来了特点。如果要摧毁这个统一体，我必需有最强有力的理由。即使必须调动某个人员，也不能使他丢脸，而是给他一个他能干得较好一些的职务。总之，我们正在建立制度，在养成政府的习性。”

为什么奥斯卡·坎博纳受到这么多外国人的厌恶或不信任呢？

尼雷尔答道：“奥斯卡是一个怕陌生的人。你们西方讲到开放性社会和封闭性社会。当你们遇到一个不爱暴露思想的人时，人们不会对他太了解的。人们一旦去了解他，就会说：‘啊！我懂了，想象完全错了。’但他毕竟产生了神秘。其次，奥斯卡的口齿并不很清晰。这样，纵令你有机会同他谈话，他也表达

不清楚，甚至连口号也可能表达不清楚。因此，外界人感到他很神秘。

“这决不是公正的。但的确我的性格给人以公开直爽的印象。好吧！你不会改变你的看法。但这决不是公正的。奥斯卡是一个普通人。拉希迪也这样，但拉希迪并不神秘。他为人客观。他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奥斯卡非常容易激动。他象所有易于激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强烈的感情。他象是测量感情的一只气压表。拉希迪是一名行政人员，是一个实干家。他是不易激动的。奥斯卡对人是感情用事的。外界人误解奥斯卡，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说奥斯卡不忠。他是极其忠诚的，——忠于党，忠于我，忠于人民。对别人来说，‘做事情是因为它正确’，而对奥斯卡来说，则是为了强烈的激情。

“他非常通人情，非常温和。让我这么讲吧！”尼雷尔张嘴大笑地说：“奥斯卡有一些美国式的缺点和气质。这是你们的国家被人指责的缺点之一。我本人指责过美国的这个缺点。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缺点，但毕竟是一个缺点。因为你热情爱别人，所以希望你得到别人的热情爱戴。你希望得到一切人的爱戴！你的感情是强烈的。当你被人有所指责或者受到误解时，你会说：‘是对我么？为什么？我做了如此这般的事，而居然得到误解！’这是一件很有

人情味的事。另外有些人，象拉希迪·卡瓦瓦那样，是非常英国式的。如果你喜欢他们，那很好。但如果你不喜欢他们，这并不会使他们中止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且他们一定不会流下眼泪的。决不会！”

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奥斯卡·坎博纳的朋友中，会有许多人同意尼雷尔的上述描述。坎博纳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是一个不忘记老朋友因而有时会找来麻烦的人，是一个总是被一群食客、找工作的人、亲戚、老朋友围起来的人，是一个在朋友和家属亲戚上花钱很多的人，至少就坦桑尼亚的标准来说是这样。

凡是在这些年中同坎博纳详细谈过话的人，几乎都会承认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感情容易受到挫伤。他仿佛从童年时代起就认为，那些他曾希望得到他们喜爱的、有势力的人——特别是白人教师和以后各式各样的外国人——都误解了他和不喜欢他。有一次，他带着自我解嘲的幽默说，他动身去伦敦，让英国联邦事务部“瞧瞧这个可怕的家伙”。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在独立前的年代，坦噶尼喀最有势力的欧洲人实际上确实都误解了他，不喜欢他。他似乎有一种绝顶的才能：参加宴会迟到一小时，惹总督生气；在坦盟初期，他坚持那些抱有同情心的白人必

须离开坦盟的会场而得罪了他们。坦噶尼喀独立后，他受到欧洲人的责备，怪他几乎在每一个吓唬他们和惹他们生气，或者似乎有种族偏见意味的行为上，都有他的一份。有时候责备他的行为不正当，有时候责备他办事无能，因为人人都说他是政府中最差的行政人员之一。他被指责要对拘留法负责，要对建国初期草率地驱逐欧洲人出境一事负责。他被指控在实行警察人员非洲化方面搞得太快。他要对一九六四年的兵变担负部分的责任；据说他直接同兵士谈话，请他们申诉不满，从而至少是促使了军纪的瓦解。最糟糕的是，有人私底下说他在兵变中扮演了神秘的角色，但这种谣传一点证据都没有。

他被指责要对若干起反美事件负责。其中著名的是那件一九六五年的“文件”案子。据说这是一起由西方策划的反对坦桑尼亚的阴谋。东非的欧洲人倾向于喜欢尼雷尔，而且对于政府所采取的那些不受他们欢迎的行动，也乐于为尼雷尔开脱责任。肯尼亚的许多英国侨民不赞成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政策，但即使在今天还是称尼雷尔为“朱利叶斯”，以表示他们对于他的正直品德和他某些例如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等行动还是有点淡薄的好感和敬佩的。坎博纳总是转移人们对尼雷尔的批评。正如一名英国新闻记者有一次说：“在批评中尼雷尔总是摆脱得干

干净净。没有人责备过他。难道这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的要旨吗？让别人去干刽子手的勾当。”

没有证据说明坎博纳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对尼雷尔不忠过，但是，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坎博纳的不满情绪在愈来愈增长。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以前，尼雷尔没有明确指定过代理人或继承人。当尼雷尔辞去总理时，他本来可以至少从他的四名同僚中挑选他的继承人，这四个人是：坎博纳、卡瓦瓦、保罗·博马尼，也许还有当时的内务部长乔治·卡哈马。他选择了卡瓦瓦。一九六四年爆发兵变之前，坎博纳身兼外交和国防部长。这时，他的势力也许达到了顶点。接着，内阁改组，尼雷尔把国防部长职位给卡瓦瓦，并亲自兼管外交，而派坎博纳去管专区行政事务。据说，这是坎博纳担任坦盟总书记职务的一个更合理的发展。他一直担任坦盟总书记到一九六七年。坎博纳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即从一九六二年起大致由卡瓦瓦作为尼雷尔的继承人。一九六四年有一次当尼雷尔的同僚劝尼雷尔不要作一次被认为是冒险的旅行时，坎博纳真正关心地谈到尼雷尔的安全问题。他还说：“没有尼雷尔的话，我们怎么办呢？”“谁来接班呢？”这种意见看来有点希奇，因为其他所有的人都认为卡瓦瓦会接班。（然而，在与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后，宪法具体规定，一旦在

职总统去世，在特别选举举行以前，由第一副总统阿贝德·卡鲁姆继任。一九七二年四月卡鲁姆遇刺身死。)另一次，当坎博纳明显地感觉到，至少是亟想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受到冷遇时，他懊悔地向一个朋友陈述道，尼雷尔“总是放任人恣意妄为，使其自食其果。”有时候，他对别人同尼雷尔总统的关系，似乎流露出妒忌；一九六四年兵变时，尼雷尔隐不露面，坎博纳对留下来的那几个国家大厦侍从人员说：“不过，你们必须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才能请他的一位欧洲朋友送他到一条船上……”尽管如此，坎博纳的同僚们还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忠心，也没有怀疑过他对非洲问题的热情关怀。他会十分激动地谈论那些没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潜在才能的聪明小伙子的困苦处境。他还会十分激动地谈论坦桑尼亚以南那些地方争取自由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坎博纳到荷兰去休养了几个月，据说是为了治疗高血压病。当他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家里的时候，体重至少减轻了三十磅，显得好几年来没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第二年五月，坎博纳乘飞机到东德去了几天；他说，他需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格检查。不久，六月十日，他非常突然地以“心血管疾病”为理由，辞去政府和党内的职务。辞职发生在内政改组的时候；在这次改组中坎博纳从管专区行政事

务调任负责地方政府和农村开发事务。使坦桑尼亚人感到格外惊奇的是，他不仅辞去新的内阁职务，而且还辞去担任了十三年之久的坦盟总书记的职务。

七月中旬，政府逮捕了坦盟青年团前领导人埃利·阿南吉西。紧随着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阿南吉西率领青年团袭击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家荷兰银行，从而在三月被撤职。他作为一名议员，批评坦桑尼亚接受加拿大的军事援助，理由是加拿大同葡萄牙有着“北约”的联系。几天后，政府宣布已挫败了一起武装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拘留了两个人：阿南吉西和哈米西·萨卢穆。后者曾一度担任过卡齐姆·汉加的警卫。而汉加是桑给巴尔人，是奥斯卡·坎博纳的老朋友，上个月被尼雷尔撤掉了主管坦桑联合事务的国务部长职务。

同一天，即七月二十二日，坦桑尼亚议会通过一项秘密动议，要求坎博纳说明他辞职的真实原因。尼雷尔在一次演说中指责说，坦桑尼亚有几个“狂人”和几个政客；这几个政客是“妓女似的唯利是图”，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个人尊严还贵重。他说，政府知道这几个“铜臭的”政客是谁，政府会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抓起来。这以后扣留了三名中级文官，一直关到一九六八年二月。

坎博纳从来没有在议会里澄清过同他辞职有关

的种种谣传。七月三十一日，达累斯萨拉姆有消息说：坎博纳及其一家已溜到欧洲；坎博纳取消了他预定去内罗毕的私人飞机，改乘汽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去内罗毕，再从内罗毕乘飞机去伦敦。甚至在坎博纳突然离开的消息传遍整个首都以后，有人在他那幢坐落在姆萨萨尼湾的新建的住宅里回答电话时，还在说什么坎博纳先生只是进城去了。

要是坎博纳按原定计划乘私人飞机去内罗毕的话，坦桑尼亚的警察本来很有可能把他抓住。还是他坐汽车离开使警察感到意外，还是他的逃跑得到实际上的许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据说，政府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意见。有些人认为他应该逮捕，而其余的人认为除了应该允许他离境以外，不应该使他成为一个受迫害的牺牲者。

坎博纳在一段长时间里曾经是全国最有名的三、四个政治家之一。他的背叛造成了紧张气氛。而且，它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即正当坦桑尼亚领导人试图适应阿鲁沙宣言的严格要求。达累斯萨拉姆的某些外交观察家认为，支持阿鲁沙宣言的行军热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坦盟发动的，以便向全体领导人员表明总统是得到人民充分支持的。

坎博纳到达伦敦一个多星期后，宣布他是阴谋推翻总统事件的受害者。他被指控在一堆阴谋和挑

拨离间中有嫌疑,但他声称“总统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一点摩擦。总统的那些敌人充分懂得,他们要除去总统,首先要除去我。”他控诉说,坦桑尼亚内部已经爆发一场暗中进行的权力斗争,这是由一个人数虽小却很有势力的集团指挥的。他们反对阿鲁沙宣言,找到了法律上的漏洞,把他们的财产转移给他们的孩子和家属。坎博纳说,这个集团控制了“情报部门、警察、军队和其他要害部门”,并试图陷害他,暗杀他。至于谈到他离开东非时所取的独特途径,坎博纳解释说,他希望乘车经过莫希去内罗毕,以便能向他妻子的家人告别。他说:“一旦我的健康得到恢复,我就要回国。我无意抛弃支持我的那些选民。”

坎博纳的有些朋友认为,坎博纳希望尼雷尔听到他的奇妙声明会邀请他回国。相反,尼雷尔很生气,对来自莫罗戈罗——坎博纳的选区——的一群来访者说,应该剥夺坎博纳在议会中的席位。尼雷尔号召坎博纳回国,辞去席位,重新参加选举,并答应他坦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将提名他为候选人。尼雷尔说:“他欺骗了整个坦桑尼亚,欺骗了整个非洲。我信任他,你们也信任他。当他到我这里说,他因身体不好而希望辞职时,我相信了他,因为他的身体确实并不好。”尼雷尔说,现在坎博纳在伦敦讲什么“他和卡齐姆·汉加是坦盟的创始人。他在伦敦讲,坦桑

尼亚将在三个月内爆发一场革命。”

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争论决没有结束。坎博纳提出如果尼雷尔辞职，他就回国并辞职。而且，他威胁说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来“揭开坦桑尼亚政界的盖子”。《民族主义者报》回答他说：“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好了。否则表明你是懦夫，是坦桑尼亚和非洲的叛徒。”

九月，卡齐姆·汉加和丹尼斯·丰贝阿赫（坎博纳的另一个朋友）两人离开坦桑尼亚去伦敦。在这以前不久，汉加被罢掉桑给巴尔副总统和尼雷尔内阁的主管坦桑联合事务的国务部长的职务。丰贝阿赫被免去商业和市场专员，最后免去其在外交部的职务。汉加在离开坦桑尼亚三个月后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几乎立即遭到拘留，同时被拘留的还有奥斯卡·坎博纳的两个兄弟，奥蒂尼和马蒂亚。由马蒂亚·坎博纳主编的斯瓦希利语报纸《世界报》被勒令停刊。

一九六八年一月，坎博纳终于发动了全面攻击，宣布尼雷尔“正在把自己搞成一名独裁者”，谴责不久前逮捕汉加一事是“坦桑尼亚历史中可悲的一页”。坎博纳声称，坦桑尼亚人曾经向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保证不会逮捕汉加的。坎博纳责问道：照这样子他自己怎么能回国呢？

一月中旬的某天，二万多人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集会，庆祝桑给巴尔独立日。会上产生了紧张场面，尼雷尔大骂坎博纳和卡齐姆·汉加，下令把汉加带到到会群众面前。尼雷尔朝着他讲：“我不知道你向塞古·杜尔说了些什么话”，尼雷尔转向群众讲：“他回来后，我并不想拘留他。可是，他开始说什么他是应桑给巴尔军队的要求而回来的。这是撒谎！”尼雷尔又对汉加说：“这就是我拘留你的原因。”

汉加从伦敦回来后，曾经在达累斯萨拉姆对一个桑给巴尔朋友说过，桑给巴尔当局把他的朋友和亲戚关在岛上。他甚至更轻率地向另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是一名便衣警察）暗示过，他正在达累斯萨拉姆等待桑给巴尔军事当局采取反对阿贝德·卡鲁姆的行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尼雷尔下令释放汉加。八个月后，尼雷尔因确信汉加卷入了更多的阴谋，而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他和奥斯曼·沙里夫移交给桑给巴尔当局去审讯。这两个人在经过一次秘密审讯后，由卡鲁姆下令，予以公开处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即在坎博纳逃往伦敦三个多月以后，有人提醒尼雷尔一年前他谈起来是怎样描绘坎博纳的。尼雷尔说：“是的，我记得。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一位教授有一次是怎么说的？这个教授说：‘一个独裁者跟我们都一样。是一个强烈

地希望得到爱戴的人。当他走错路时，还讲：他喜欢受人爱戴，所以，请爱戴他吧！否则……’

“对！我只能把我对我这个朋友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你。去年，奥斯卡的健康情况很差。这可完全是真的。他到亚的斯亚贝巴去。在那里，他们关于是否接受加纳代表团（参加非洲统一组织会议）的问题，有过一场愚蠢的争吵。以后，他回来对我说：‘医生说我应该去治病’。我说：‘当然该去。立刻去荷兰！’我替他出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伯恩哈特王子的医生，这个医生曾经给我的两名同僚看过病。

“这样，他去了好几个月。当他回来时，他的健康情况已好转得多。他的体重减轻了很多。我记得在今年四月，他说医生要他去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我说：‘好！请去吧！’于是，他这次为了要听听‘别的医生的意见’去了东德。可是过了几个星期，他写信回来说：‘我担心。我想我该辞职。’以后，我的一位荷兰朋友曾经说：‘我认为奥斯卡将辞职。他曾要求我替他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寻找一个工作。’这位荷兰朋友说：‘我想你会发现他这人已经大变样。’”

尼雷尔继续说，坎博纳回国时，正好赶上坦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在伊林加开会。他在会上坦率地讲到他的健康很差，并吐露说：“总有一天，我会要求你让我走。”尼雷尔指出说：“这是他第三次讲到他的健康

情况”。六月初，尼雷尔宣布内阁改组。“八日那天，在部长们即将宣誓就职之前二十分钟，他来找我说：‘导师！你瞧！如果早点你告诉了我内阁改组的情况，我一定会说我要辞职的。’我跟他在楼上争起来。我说：‘让我们暂时不作出结论。你晚上来这里，我们再讨论。’我们一起下了楼。他说：‘我一定要现在离开’。他这样地情绪沮丧。我对他说：‘我阻止不了你去，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是否合乎时宜？’”——事实是，辞职与内阁改组同时发生。“他说：‘导师！你瞧！我总是被人误解。如果我现在辞职，我会被误解；要是我将来辞职，我还是会被误解。’嘿，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他说在辞去总书记之前，他会等待一下。”

尼雷尔继续说：“而且，麻烦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哈欣〔姆比塔〕告诉我说：‘但是，他已经也辞掉总书记的职务了！’我想了想说：‘好吧！让他以后来说清楚。’此外，《民族主义者报》的本·姆卡帕说：‘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据他自己说是为了健康关系而辞职的。’姆卡帕说：‘可是，他曾经同汉加一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听了之后，尼雷尔不禁举起双手，感到惶惑不解。

“我们中央委员会每星期六举行一次会议。我希望他在下一个星期六来参加会议并作出解释。我向

会议的参加者说，坎博纳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的健康状况。但是许多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那天晚上，坦盟的一位老盟友来看我。我说：‘他是由于健康关系而辞职的。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去问他。’那位老盟友说：‘我刚从他家里出来。他说他是由于汉加而辞职的。’我说：‘天哪！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一个聪明人不会由于别人而辞职。他的辞职是从原则出发的。’”

在随后的谈判中，尼雷尔对调解人说：“我不会再要汉加，是我在组织这个政府。”坎博纳终于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尼雷尔说：“他说了一些使我感到有点震惊的话。我觉得他的神经过于紧张。他说：‘我害怕。我叫我兄弟同我呆在一起，保护我。’我告诉他说：‘离开这儿，休息去吧！’他来到我家。他表示同意并说他将去莫罗戈罗。好吧！我认为那不叫做什么休息。因为莫罗戈罗是他的选举区！”

尼雷尔在讲到拘留五个人一事时，继续说：“当时，我们围捕这些蠢才，这些人的确是蠢才。坎博纳着了慌，离开本国。我们曾在这以前要求他交出外交护照。汉加已交出外交护照。我认为要交出护照这件事可能促使坎博纳离国；我想，他认为我们是会阻止他离开本国的。”

尼雷尔重又讲到早期时的奥斯卡情况。“奥斯

卡的不安全感始终足以使我解释他性格上的每一个弱点。我可以从这一点解释他的一切。

“他喜欢神话。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初吸收了奥斯卡，他却在一九五六年就去伦敦。”为什么？“这是由于他感到不安全的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每一个成员都不喜欢他。他待在伦敦直到一九五九年，终于对我说：‘好！我就回国。可是中央委员会中那些从来不写信给我的家伙会有怎样的看法呢？’我说：‘瞧你奥斯卡！我无法保证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喜欢你。’他回国后发现党已经由另外一些人，即由满怀信心的人们建立起来。我们尽了种种努力给他安排工作。”

尼雷尔在回顾坎博纳在其中扮演暧昧角色的若干重要事件时坚持说，对一九六五年美国策划的“文件”案子负责的是尼雷尔自己，而不是坎博纳。不过，尼雷尔说，他正在根据最近几个月内听到的情况，来回顾早期的事件。尼雷尔说：“如果我不理解某件事情的话，我就着手回头来看看历史。”

一九六九年十月，坦噶尼喀的全国妇女组织前主席碧碧·蒂蒂·穆罕默德和前劳工部长、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前总书记迈克尔·卡马利扎同四名军官一起因从事“不利于法律和秩序”的活动而遭到拘留。一天后，《民族主义者报》的一名前新闻编

辑格雷·马塔卡在内罗毕的机场上遭到逮捕并被移交给坦桑尼亚当局，据说他替奥斯卡·坎博纳充当密使。在随后的叛国案审讯中，宣告穆罕默德夫人、马塔卡和另两名被告犯有阴谋推翻政府和暗杀总统的罪行，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卡马利扎和一名军官被判处十年徒刑。

奥斯卡·坎博纳后来一直呆在伦敦。关于他的近况，人们知道得很少；有一天，一九六八年末，他因非法拥有一件武器而被罚款二十五英镑。他对尼雷尔的攻击慢慢地平息下去了，但他明显地保持着对坦桑尼亚政治的殷切关心。在达累斯萨拉姆有人说，他有时寄送圣诞卡片给坦桑尼亚的议员们，有时写信给被坦桑尼亚政府解除职务的人，表示同情。

第十五章

在辛吉达吃人的是真正的狮子。

昨天，警察方面的发言人否定了这种报道：在姆提帕区今年死了六个儿童后，闻名的杀人的狮人又在活动了。儿童不是被狮人杀害的，是吃人的野兽吃了他们。一支猎队在村民的协助下正在搜捕。

几年前，辛吉达的狮人使这个地区恐怖起来。巫术师愚弄人民，让他们披上狮子皮在这地方杀死了许多人。

——《旗帜报》一九六六年三月

昨天，一位议员在国民议会询问是否有一种具有女人形状的鱼。

土地、住宅和水利发展部长马斯万亚先生告诉塞勒尼议员（西基洛萨选区）说，没有人鱼。

马斯万亚代表农业、林业和野生物部长作了上述回答后又说，海牛在马菲亚和

基尔瓦四周常常可以看见，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人鱼。海牛喜欢在河流入海口附近生活，吃海草，人们为了要它的肉和脂肪而去捕捉它。在坦桑尼亚，法律禁止捕捉它们。

人鱼故事的传说可追溯到古代，可能是海员为了动听而把它们传播的。

——《旗帜报》一九六六年十月

到坦桑尼亚来访问的人，对这里存在着的原始状态和现代文明之间的明显对比总是不能理解。一方面，坦桑尼亚至少在十五年前就有了东非组织得最好的政党；另一方面，很多坦桑尼亚人对他们的部族具有比对国家更深切的感情。坦桑尼亚是一个外国旅行者能任意游览而不会遇到危险或敌视的国家——好奇和猜疑心或许有之，但极少有敌意。当你夜间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内罗毕之间飞行时，会发觉坦桑尼亚在夜间仍是一个漆黑的世界，只偶尔乡村有橘红色的火点刺破夜空，这种原始与现代的情况回忆起来不免感到吃惊。朱利叶斯·尼雷尔几乎经常在人民中间视察，有时一次就是几星期不休息；他直接和同胞的大多数人谈话，其广泛的程度可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元首相比。即使这样，三、四年前，当他访问姆布卢地方僻远村庄时，一位部族的长

老出来欢迎他时仍表示出不相信的样子，这位老人说，“你是导师吗？我们以为他是一位白人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政府公布了一九五七年后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结果。调查表明全国人口已达一千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人，过去十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预计到一九九二年要增加一倍。更重要的是调查表明人口比三个月前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最新估计数字多了一百七十万。通过调查，知道人口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二点七而不是以政府估计的百分之二点二的比率在增长。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表示自从独立以来，国家经济的发展比坦桑尼亚人所知道的要差劲。一九六四年，政府根据估计人口为一千零五十万的国民平均收入每人是十九镑。实际上，那时的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万，因此真正的每人平均收入还要低得多。

一九六九年尼雷尔在坦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中回顾了他的政府在发展中等教育方面情况。那年应有七千一百名儿童进入中学，而前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六四年进入中学的儿童是五千二百名，因此他又说：小学教育系统的发展就一定被忽视了。他对该委员会讲，“这次的人口调查确实反映出现在坦桑尼亚年满七岁的儿童入学的机会比我们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设想的情况要坏。那时我们

常说，我们的儿童约有百分之五十上学了。这次人口调查显示我们有多得多的人口，这表明一九六四年实际入学儿童的百分比接近百分之四十六，即使到计划结束一年的现在，也只百分之四十七的儿童能进小学。”

尼雷尔说：尤其有很大一部分小学生读了四年就辍学了，所学的东西多半会忘记掉；因此，政府决定取消四年级的考试，增加五、六、七年级的班次，使每个上小学的儿童实际上能受满七年小学教育。

代表们欢呼起来，但尼雷尔很快告诉他们实施这一决议的代价：要把国家最期望的一项建设项目进一步推迟。他说，“即使我们把取消四年级考试放在优先地位去做，然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了时，我们还只有约百分之五十二的适龄儿童能够入学。但是今年或以后入学的儿童就不需要那种考试而直接读到七年级。无论如何，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坦桑尼亚是能够普及小学教育的。”

在同一次讲话中，后来他转到他所爱讲的对坦桑尼亚食物的批评。他说，“那些见过正在勘测铁路的中国人或者修建通向赞比亚公路的美国人的人，他们会发觉同中国人和美国人来比起干活来，我们的人很快就累了。其原因不是我们的人懒惰，而是没有吃到足够的肉、蛋、鱼和牛奶或者其他蛋白质食物

来供给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尽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如果你建议我们的人民去养鸡时，他们还会问，‘到哪里去卖呢？’或者‘到哪里去卖鸡蛋呢？’这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水果又怎样呢？我们把水果当作只是欧洲人和儿童才好吃的东西……”

一九六八年坦桑尼亚国民议会第一次拒绝通过尼雷尔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建议给部长、专区和地区两级专员发退職金——该款可作为退休的收入。尼雷尔按法律规定享有养老金，最近他对长期担任过教育部长的所罗门·埃留福中风瘫痪一事颇为震惊。这在那时可能引起他提出颁发退職金的法案。不管怎样，由于该项建议违背阿鲁沙宣言精神，所以遭到议员们的愤怒谴责而否决了。

翌年，当有人问起这项法案时，尼雷尔说他已经决定不坚持了。“议会有看法，在阿鲁沙宣言的气氛中，可能我的主张不合时宜，我必须向国会屈服。但这件事不能提高成为一种原则。一个人能为国家的建设工作五至十年；时间一到，他就得离开。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办得公平合理。国家开发公司的经理到时候能享受养老金或退職金，但当部长的却没有。”除此之外，他还说，“在坦桑尼亚这不是一条原则，因为我就有养老金。我不是国王，承认我为人民服务才给我养老金。这样，你们怎样来区

分我和部长们呢？”

一九六九年末的同一天，尼雷尔说明了政府的新婚姻法案的提议——这一法案在内罗毕和海外被描绘为“每个基督徒可娶两个妻子”的法案。“到现在为止——用美国的措词说——我们承认基督教的婚姻，穆斯林的婚姻，部族婚姻，印度教婚姻。我们一直认为一个穆斯林可讨四个老婆，一个信奉部族习俗的人能讨十个或二十个。部族的一夫多妻，基督教的一夫一妻，两者都是法律所承认的事实。

“现在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世俗国家。某些法律可以作为国家的法律，或上帝的或教会的法律。‘不该杀人’这也是一条国家的法律，谁违犯了，我们就把他抓到法院去。但有些教会法律就不是国家的法律，比如说，‘星期五你不能吃肉’。穆斯林不吃猪肉，但国家不管此事。在坦桑尼亚，婚姻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伊斯兰说，‘你不要娶四个以上的妻子’，基督徒只能要一个。即使一个穆斯林要五个妻子，我们也不告发他。如果基督徒娶两个妻子，我们就要起诉。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实行这种制度。”

尼雷尔继续说，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娶第二个妻子，我要受到控告。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可穆斯林可娶四个妻子，信奉部族习俗的人可娶十个或二十个。逮捕

我的警察他自己可能是个一夫多妻者，检察官以及判处我四年劳役的法官都可能是个一夫多妻者。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按照新法律，他解释说，“我们正在废除重婚的法律。这样以后，每个人的条件就将完全一样了。从法律上说，一个男人不可以另外娶一个妻子；但是他娶了的话，我们也不起诉。这是他自己同他的妻子和他的上帝之间的事。我们并不把道德订为法律。两人结婚是一夫一妻的结婚。但是，我们现在说，他们要成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那他们可以选择——这他们能够同意。”

该法案还规定今后新郎给女家的传统聘金可以按计划分期付款。尼雷尔解释说，“我们说不能因聘金而耽搁结婚，即使没给，也不致使结婚无效。可以日后再付。我们希望消灭这种给聘金的习惯，但是，我们决不硬把它作为非法。”暗示这种传统习惯在部族传统中仍然根深蒂固，他抖一抖又说，“毕竟我们明年要选举了。”

一九七〇年的选举，事实证明同一九六五年的投票结果一样。没有竞选对手的尼雷尔再次以压倒多数当选为任期五年的总统，这次得票达百分之九十七，两个年轻的部长和十二位普通议员都在竞选中被击败。桑给巴尔的议会选举再度推迟。

尼雷尔在非洲事务中最引起争论的行动就是他支持了反对尼日利亚政府的比夫拉叛乱政权。坦桑尼亚是第一个承认比夫拉的非洲国家，接着又有三个国家承认了。尼雷尔的这一立场使他的许多朋友吃惊，因为这一行动似乎标志着同非洲大多数正统的民族主义者的分裂；也似乎同他一贯支持的国家统一的思想（不管是对刚果、德国还是越南的统一问题）相矛盾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比夫拉叛乱失败前几个月，尼雷尔对于他为什么觉得必须站在伊博族人一边来反对尼日利亚这一点曾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一九五六年英国实际上要让伊博人独立时，正是这个伊博族人说：‘我们不能只有东尼日利亚的独立’。现在，伊博族人也不是一群傻瓜。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有生气、聪明而且勤劳。他们决定同联邦合作。他们说：‘我们不会要一个没有北部的尼日利亚。’同时，北部尽力控制西部；西部是被掠夺的地区。

“第一次政变是针对中央政府的。阿布巴卡尔·巴勒瓦^①是个很好的人，但政府是腐败的。当西方常常捧出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民主的典范时，我

^① 当时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总理。——译者

简直想呕。任何事情都可用钱买到。

“第一次政变是一次伊博族人发动的政变。我不喜欢这样做，但是，它发生了。他们杀人，但很有选择；我想到雅库布·戈翁说杀了十二个。第二次政变是反对伊博族的。伊博族人实际上被赶出联邦了。三万人被屠杀，两百万成了尼日利亚逃出的难民。在拉各斯上岸的坦桑尼亚人要被盘问：‘你是个伊博族人吗？’但伊博族人继续寻求统一尼日利亚的方式。甚至在被杀和在尼日利亚其他地方被驱逐之后，他们仍然为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而努力。即使没有别的人能看到这一点，非洲是应当看到的。非洲应当对尼日利亚说，‘瞧，你正在要求什么？’

“非洲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都受到一种思想的灌输，就是认为非洲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比夫拉问题。这是愚蠢的、毫无意义的谬论。它把非洲政府的缺点和非洲国家的缺点混淆了，这完全是两码事。政府垮台了，但是国家还存在。在客观上存在着一种要求在一起的愿望。我了解坦桑尼亚有建立一个东非国家的愿望。苏库马族决心要建立一个苏库马族国家吗？不是。或者我的只有四万人的小部族也决心要建立一个国家吗？不是。我早对非洲讲过了：你们正在向尼日利亚学习错误的教训。

“但是有些国家毕竟分裂了。塞内加尔和马里

分裂了。一九六三年非洲统一组织开会，桑戈尔和凯塔两人拥抱是一个动人的时刻。他们仍可能变成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不互相残杀了。”

然后他谈了他对自己国家的麻烦的联合的看法：“如果桑给巴尔人感到联合对他们毫无用处而想分裂出去，如果这是桑给巴尔人真实的感觉时，那我不可能杀掉桑给巴尔人。如果他们自由地来，他们可以自由地走，我们没有征服桑给巴尔。如果他们留在这里，这也必须出自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坦桑尼亚人时常抱怨说，国外报纸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是严重歪曲了的，而他们经常是做得对的。只有路透社一家西方新闻组织在达累斯萨拉姆驻有一个通讯员；其他通讯社不是从欧洲便是从内罗毕、肯尼亚来报道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人对事实很敏感，以内罗毕为基地的通讯员通常一年只到坦桑尼亚一两次，坦桑尼亚人对这一事实有很多想法；他们也怀疑这些记者深受肯尼亚人，特别是肯尼亚的英国人的影响，这些人倾向于把坦桑尼亚人看成社会主义者、亲华、头脑发热和有一点危险性的人。

上述问题由于桑给巴尔发生的情况变得复杂了。西方读者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例如，当卡鲁姆宣布五十年内桑给巴尔不进行选举，他的声明对理论上他所效忠的联合政府的政策竟会毫无关系。可

是,另外还有一个新闻报道问题,这个问题对世界上每一个被忽视的国家来说是共同的,但在坦桑尼亚特别严重。坦桑尼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尼雷尔政府正在试图以想象的和往往是试验的方式去解决非洲问题——但这是一个在报纸上或电视中难于解释清楚的题材。

另一方面,这儿有人伪装成狮人,而且议会议员在质询时间内竟然询问到底有没有人鱼,显然这里是一个充满着奇怪事情足以编成种种不寻常的故事的地方。往往,一位部长或一位专区的专员或一些更低级的官员会掀起一次运动,常常是他自己发起的——从国外报纸的报道来看,好象整个坦桑尼亚突然疯狂地投入同超短裙、整发用具、漂白粉和其他对“坦桑尼亚文化或阿鲁沙宣言的目标有危害的东西作斗争”;或者强迫高贵的马萨伊族人放弃他们的毯子、赭色的露身的习惯去爱好穿卡其裤子和衬衫。

还有一个颇为合法但是大大夸张的报道是叙述一九六七年内政部长拉维·西乔纳驱逐印度人的运动。这次运动同肯尼亚和乌干达反对亚洲人的运动是一致的,但是更严重一些。大约有三百名亚洲居民接到驱逐令限期离境,但后来大多数驱逐令撤销了。尼雷尔常常撒手不管,这就使事情含糊不清——如

青年团反对超短裙的事情——直到这种现象本身过时为止。

产生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局外人对坦桑尼亚的政治也是极端不了解的，即使在比较接近政界的人士也是如此。一切决议是在党委会上秘密作出的；反对意见要在事实过后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予以公开。保密的一个理由可能是民族的自尊心：家丑不外扬，不让敌方知道内讧。当然，对于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有其民族特色的。一位欧洲朋友有一次向尼雷尔建议说，他应当调换坦桑尼亚政府中两个英国雇员的工作。尼雷尔直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用·一个·白·人·来·换·一个·白·人？”他感到奇怪地滚动一下眼珠，高兴地说，“啊！我的朋友！你对非洲政治了解得太少了！”

一九七〇年末，当爱德华·希思首相的保守党政府看来要作出向南非重新出售武器的决定时，英国同坦桑尼亚的关系发生了另一次危机。坦桑尼亚同赞比亚、乌干达一起，以退出英联邦来威胁，如果英国真的向南非恢复出售武器的话。在伦敦同希思会谈后，尼雷尔描述英国的态度是“几乎是一种心理上的对抗情绪；是你能想到当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类型的最近翻版。”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后，他嘲弄英国人，向他们送了一份总是联系到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近乎

神经过敏的抗议：“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事不能作出决定？难道我们不象别的国家一样独立的吗？难道一定要由坦桑尼亚这样的小国来推动吗？”一九七一年一月在新加坡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这个出售武器的问题提交给一个由八国组成的委员会来进一步研究，因此拖延下去了，但没有解决英联邦的这一纠纷。

美国同坦桑尼亚的关系处于更坏的冷淡状态。尽管事实上在东非的美国游览客人正在显著增加，但美国公众给予坦桑尼亚的注意，并不比对其他尚待弄清楚的问题为多。毫无疑问，这种冷淡情绪是由于非洲自一九六〇年以来失去了它的诱惑力——那儿产生了这么许多野蛮的、生活水平很低的小国家，以及刚果和尼日利亚的破坏性内战。但是这种冷淡关系已被用来强调美国在同独立的非洲的交往中受到了损害——或者至少在同那些不准备永久接受南非白人统治的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恶化。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以下几个不利条件：它在南非有大量的私人投资；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葡萄牙有联系，它同一些前殖民大国有密切关系；它本身的民族问题；——特别在六十年代末它在越南的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不过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完全说明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对非洲问题的忽

视达到这样厉害的程度。举例来说，一九七一年末，美国国会不顾联合国对罗得西亚重要产品的禁运，竟然通过决议废除不进口罗得西亚铬的禁令——从而加强了白人少数派在索尔兹伯里的政权。罗得西亚黑人多数派同白人少数派的人数比例为二十二对一。如果还存在美国对非洲事务的态度会作出重大变更的前景的话，那要等到有一天美国的黑人社会在美国对非洲政策上能施加象犹太人现在对中东政策所施加的同样影响；但是，那一天绝不是眼前的事。

另一方面，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中国人已经牢固地加强了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地位。他们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巨大援助的根本原因仍然弄不清楚。一些西方观察家说中国人看上了赞比亚的铜；他们希望在非洲得到测验从亚洲大陆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线设施地点。可是，尼雷尔的许多西方朋友认为，如果在独立的第一个十年中他用实例来说明过任何事情的话，那就是坦桑尼亚的不结盟政策或任何别的东西，都是不能出卖的，就是以一条铁路为代价也不出卖；中国人多少要认识到这一点。

西方人士也指出，如果坦桑尼亚的军事力量建设起来，最终将导致同葡萄牙人在沿南部毗邻莫桑比克的边界地方发生激烈战斗，特别是如果葡萄牙人以南非军队作后盾的话，坦桑尼亚会发觉自己依

靠中国人是危险的，将被迫接受中国人爱提的任何条件。

虽则可能如此，显然中国人现正处于对非洲承担一个长远目标的义务过程中。中国人通过坦赞铁路正不仅试图显示他们的技术质量，而且表明愿意建造一个曾被富有的西方大国拒绝承担的巨大发展工程。据推测，中国人也正估计到西方国家将继续撤回他们的援助，放弃他们的影响；当南非出现危机时，白人国家必将沆瀣一气；又估计到约束坦桑尼亚及其比邻跟英国、其次跟美国双方人员和机构的无数私人关系，再过二、三十年便不复存在。的确，假如西方国家继续冷淡地和不负责任地处理非洲发展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估计的可怕情景。

一九六一年坦噶尼喀独立时，尼雷尔总是给朋友说：“假如我只能有三年时间”；“假如我正好有五年时间”。一九六九年，他告诉一位记者说，他又想继续执政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想引退以便激励新的领导人，颇感踌躇。一九七〇年，在视察几百个新的乌贾马式合作村中的一个村庄时，他跟当地农民约定说，有一天他退休后将住到这样的地方来过安静的生活并撰写他的回忆录。

尼雷尔所背的包袱——这是他同非洲其他领导人共同背的包袱——就是他已经看到有这么多非洲最

好的人物被刺杀了，或是被国家的敌人或是被自己的敌人所杀。其中他了解并且尊敬的人物有多哥总统奥林匹欧，尼日利亚总理巴勒瓦，另外还有肯尼亚的计划与发展部长汤姆·姆博亚，他于一九六九年在内罗毕街上被枪杀，其真相迄未大白；尼雷尔信任他并在有关东非共同体的每次会议上都依赖他的智慧和合作。还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蒙德拉纳于一九六九年初在达累斯萨拉姆被杀。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非洲领导人，被一再提醒要注意自己易受危害这一点。

那些认为尼雷尔真正愿意退休的人指出，他为了要重建他的党，曾经不事先透露便辞去总理职务。但是不久他继续露面，也许这对他要维持与桑给巴尔的头痛的联合是不可缺少的。虽然难以相处，但已故的卡鲁姆有时对尼雷尔的意见不乐意也得听听。尼雷尔指定阿布德·琼布这位受过相当教育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接替卡鲁姆，在他的领导下，逐步改善桑给巴尔的局面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当一位助手或者一个机构拿不定主意时，尼雷尔的解决办法是同人民谈话：好象他访问的地方越多就能鼓舞越来越多的乌贾马式的合作村和自助工程，越来越高的棉、烟草收获量，并且靠他一个人就能激起人民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他作到了这些。他

常说他的目标是杜绝特权阶层的形成（野心的政治家、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城镇中的富人）并告诉他的政府，根本任务是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生活。

对这种严格的理想主义的计划，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建议。很难相信防止特权阶层成长的斗争不会失败，很难相信工资比农民高出二十到三十倍的大学毕业生最终不致成为特权阶级。尼雷尔大概不会同意上面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他会坚持的。几年以前，他对坦桑尼亚中部的塔波拉的小学生作过一次动人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一再说：“人家走时，我们必须跑”，意思是非洲应该尽量快跑以追上现代的世界。他完全知道——他的阿鲁沙宣言强调这种知识——这种赛跑决非公平的竞争，事实已经输了：发达的世界现在跑得越来越快，而发展中的世界落后得越来越远。尼雷尔今天说，即使千变万化也没关系，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向前。

一位外宾在对达累斯萨拉姆进行一次长时期的参观访问后问尼雷尔，在未来二十年中他希望坦桑尼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尼雷尔和他那时的新闻秘书乔治·罗基都笑了。就当前的危机来说，不管它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看来不可能是理论问题。不过和平常一样，他试图给予回答。“从现在起二十年后，我希望没有一个（单独的）坦桑尼亚。”他说：“如果那

时不是一个(统一的)非洲,我希望至少将有一个(统一的)东非。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用非洲民族主义来摧毁我们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在那个时期不能采取走向泛非主义的其他步骤;我们至少还应该有一个致力于泛非主义的坦桑尼亚。到那时,我们应该有一个人民感到自豪的社会;我们应当真正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从现在起的二十年后如果仍有一个坦桑尼亚的话,我希望它将是一个专心致力于一个统一非洲目标的无阶级的社会。”

几年后的一九六九年末,这位外宾问尼雷尔同样的问题,这次他的回答有点不同。他说:“我仍认为历史把坦桑尼亚交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为非洲所做的工作。非洲人的未来是在非洲。我们可能在坦桑尼亚陷得这样深,以致看不见整个非洲。但是,就是在现在,我们同非洲利益的一致已经超过坦桑尼亚一国的利益了。这种情况是非洲比其他任何洲都更加真实的情况——非洲的问题确实具有显著的非洲特点。作为非洲人,我们只能加入这一人类前进的行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最近我访问了加拿大和瑞典。我所会见的许多有知识的人都晓得我是非洲人。但是即使在他们看来,我恰恰是一位真正的非洲人。事情正是这样。我们必须努力做好的真正革命是非洲的革命。”

第十六章

尼雷尔在一九六六年巡视塔波拉后几个星期，他又在坦桑尼亚东北的乞力马扎罗地区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在前一次巡视时，他常常表扬努力工作的查加族人，他们在乞力马扎罗山坡上种植咖啡致富，尼雷尔曾鼓励塔波拉的人民向查加族人看齐。这次到查加地方来，他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他高兴地责备代表这一地区的议会议员，也是政府中的年轻部长露西·拉梅克女士说：“啊！查加族人是最最保守的，查加族人要我们开拓山区，而开拓山区是很费钱的。”拉梅克女士以辩护的口吻回答说：“他们是保守，不过他们正在改变。”尼雷尔认为查加族人应当开始从人口过密的山区迁到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居住区去。尼雷尔的意见是合理的，但可能不切实际。他在一个接待站说：“我向你们提两点意见：乞力马扎罗地区的人口很多——五十万人，有加蓬那么多，——并以每年一万人的速度在增加，如果我们要供养这么多人，我们必须增加每亩的产量。第二，坦

桑尼亚是个大国，每人都能自由迁移，比如说，鲁菲吉盆地就有英国那么大，而且土地很肥沃。我国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我们的土地属于全体人民。坦桑尼亚人能在本国任何地方居住。”

在雄伟山下有个郁郁葱葱的村庄，一天早上，尼雷尔的车队驶过这个树木茂盛而又阴凉的村子，成千上万的查加族人出来欢迎他，向他投扔花束。尼雷尔笑着对一位来访的客人说：“嘿，这次你可看到我们人口爆炸的情形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查加族人的孩子。”当他在接待站停下来时，人们送给他两只羊，一只给他自己，一只给他妻子。一个人说：“导师，你是牧羊人，所以我们送羊给你。”当尼雷尔要上车时，一位青年走上前去，象一位非常激动的啦啦队队长那样，站在总统前面开始大喊：“中学！中学！你如果答应我们，先生，我们将盖起一所中学！”

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这就是查加族人最关心的事情。“你瞧，”总统的秘书阿克兰德·姆希纳对一个外国客人解释说：“这个地区的问题是要发展，在中央地区，还要书记说服父母送子女上学，而此地的父母已经送子女上学了，要求子女受更高的教育。”

每次开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地方官员都要领导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坦桑尼亚的政治应

答祈祷。

主席：自由！

群众：自由！

主席：自由，尼雷尔！

群众：自由，尼雷尔！

主席：自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群众：自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如此等等。从达累斯萨拉姆来的参观者在向群众介绍后，他要以呼“自由，尼雷尔”或者坦盟的座右铭“自由和工作”来向群众表示祝贺。在这种会上，尼雷尔总是讲清楚，村民们不能希望政府在最近办更多的中学，他说：“想让所有念过七年制的孩子全都上中学，这是做梦。如果我们生产发展了，我们可以办更多的学校，但是，我们大家都呆在乞力马扎罗山区，我们就不能生产更多的东西。”

继而他告诉人们他前两天在武代埃村的情况。这个村子位于乌桑巴拉山区。村民从事于从岩石中开辟一条通向村子的道路的艰苦工作已达三年之久。姆希纳解释道：“他们收集木柴，点起火，把岩石烧热，然后浇上冷水，这样石头就裂开了。”尼雷尔要求查加族人象武代埃村的人民那样辛勤劳动；在武代埃村，他还要求居民象中国人那样艰苦劳动，并答应选派他们中的马里加尼先生到中国去看看中国人

是怎样以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

晚上，在莫希地方总统的住屋里，尼雷尔说：“他们这里需要的是自来水和电，现在如能供应电的话，许多人已经用得起。”当问道要多久才能供应时，他讽刺地抖动一下回答，“可能是来世”，“我们没有钱”，他露齿而笑道：“如果没有越南战争，我也许可以要求来一个马歇尔计划。”

第二天早上，尼雷尔在卡文齐中学举行的两次不同的会上回答了问题。他坐在有点象太师椅的上面，下巴靠着他的乌木手杖。第一个会的参加者是成年人，和几周前在塔波拉开的一次会一样，谈的尽是实际问题。一位农民问：“为什么政府要对铜的喷雾器征税？”尼雷尔说他不知道，要查问一下。

一小时后，尼雷尔对卡文齐学校的学生讲话，会开得很活泼。一个女生问：“罗得西亚人民难道不应当用甘地的消极抵抗办法吗？”尼雷尔说，他对此表示怀疑。“这些办法行不行要看形势。假设我父亲是个医生，他拒绝给病人看病，我可以用绝食来表示抗议。这是可以生效的。在第二或第三天，我父亲会同意给这个病人治病。但是，在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看到非洲人口的减少会感到高兴！”

一个男生问：“先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你跟一些新的政府打交道，可是你不告诉我们是否已经承

认了它们。举例来说，譬如刚果，我们不了解你对刚果的立场，但是我们知道你最近访问了这个国家。”

尼雷尔说：“我承认刚果政府，你还要什么样的进一步证明？”

另一个学生问：“为什么英国议会里没有非洲人当议员，而我们的议会里却有欧洲人当议员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白人议员赶走，把席位给坦桑尼亚人？”尼雷尔恼火地回答：“我们拒绝英国制度的理由之一是他们实行种族歧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一条原则是不分肤色，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这就是我们曾为之努力战斗的。”

一个男生问：“当我们学成回家乡时，我们会碰到什么情况？”尼雷尔严厉地回答道：“要发生的事情正是你所期待的事情！”坦桑尼亚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种地并依靠土地生活。因而，百分之九十六的人要去种地，只有百分之四的人能到城市去。在美国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大多数美国毕业生能够希望到城市去。

那天晚上，尼雷尔在总统住所接见联合国的农业专家，一位矮胖而结实的瑞典人，他邀请尼雷尔去参观联合国的一个万亩实验农场，将来可安置一万名棉农，尼雷尔说：“好呀！我是一个大棉农。我什么时候去参观呢？明天？”他转过来对秘书说，“不行

吧？明天的日程已排满了！什么时候我回达累斯萨拉姆？什么时候我去纳钦格瓦？”回头又对客人说：“不行，你看，兄弟，星期五吧。明天来看我们的人太多了。”

星期五早上，在打算飞回达累斯萨拉姆之后的几小时，尼雷尔在棉花农场会见了联合国的那位客人，他把尼雷尔介绍给一位助手说：“你会见过阿联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吗？”尼雷尔回答说：“我见过穆罕默德，我应当同他做生意。我们五十万人和你们懂得灌溉的五十万人来往。那就行了，是不是？”

当他步行穿过灌溉工程时，尼雷尔心中若有所思的样子，什么也没说。有人谈到时间来不及时，他几乎是低声对自己讲：“有的是时间，问题不在时间，问题是资金。”参观结束时，联合国的这位专家告诉他：“你十月份回来时，这里就一片葱绿了。先生，感谢你对我们的鼓励。”

尼雷尔说：“我要回来的，我要回来的。我不知道谁在鼓励谁。”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